

#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4年第4期(第35卷)

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龙杰

副主任：何文钜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鸿 方素梅 刘菊香 许立坤 李小宁 杨保筠 杨绪强

沈桂萍 张淑瑛 张献生 郑好 祝远娟 覃彩銮 谢茂松

廖国一 潘宏纹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 学报

双月刊

(1996年创刊)

第35卷 第4期

2024年8月18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 编:何文钜

副 主 编:杨绪强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6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http://www.gxsy.org>

电 话:0771-2381657, 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人

发 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10.00元

# 目

## 学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论域中“系统集成”的话语溯源、运行机理及时  
代价值

..... 张文龙,何绍坤(5)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的七大辩证关系论析

..... 吴 激,郭清梅(15)

## 特别策划·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二十二届年会暨 新型政党制度确立75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选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逻辑理路——基于制度效能的  
分析

..... 刘菊香(24)

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制度目标与治理效能研究——基于H市的  
调研分析

..... 崔 珏(34)

“两个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  
践论

..... 杨谨硕(44)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及时代价值

..... 刘迎春,黄 辉(50)

内涵·理路·特征: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代命题探赜

..... 王孔佳(57)

# 录

## 统战理论与实践

我国党外人才培养:特点、机理和规律(下)——中国共产党党外  
人才工作研究系列之三

..... 祝远娟(66)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创新研究

..... 陶贤都(77)

## 民族研究

鼓楼:汉侗建筑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碑——广西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史研究系列之六

..... 覃彩奎(83)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与实践进路

..... 宋家麒(88)

壮族“唐皇调”:缘起、流变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  
教育的启示

..... 滕志朋,黄 瑛(95)

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意义、优  
势与路径

..... 潘宏纹,刘秋妍,韦梦琦(101)

##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越南汉文小说对民心相通建设的作用及启示——以文明交流互  
鉴为视域

..... 范忆澜(107)

本期执行编辑:陆姝彤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5 No.4

Published on Aug. 18th 2024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HE Wen-ju

Deputy Editor-in-Chief: YANG Xu-qiang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XBX@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 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Guangxi Mingyuan Fenghuang  
Printing Co.Ltd

Price: ¥10.00



英文翻译:陆姝彤

#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

---

## Main Contents

- Discourse Origin,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System Inte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 ZHANG Wen-long, HE Shao-kun(5)
- Analysis of Seven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to Grasp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 WU Wei, GUO Qing-mei(15)
- The Logical Path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Type of Party System : Analysis Based on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 LIU Jv-xiang(24)
-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Objectives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 CUI Jue(34)
- "Two Combinations":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raxi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Type of Party System  
..... YANG Jin-shuo(44)
- Generating Logic, Basic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 LIU Ying-chun, Huang Hui(50)
- Connotation, Path, and Characteristics: Exploration of Deng Xiaoping's Proposi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 WANG Kong-jia(57)
-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and Patterns of Non-Party Talent Cultivation in Our Country (Part II) : the Third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Work of Non-Party Talents of the CPC  
..... ZHU Yuan-juan(66)
- Studying on Innov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Work for Internet Celebrity Groups  
..... TAO Xian-du(77)
- Gulou:A Monument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Han and Dong Architectures : the Sixth of a Series of Studies on Ethnic Communication Fusion and Integration in Guangxi  
..... QIN Cai-luan(83)
-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Creating a Stronge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 SONG Jia-qi(88)
- The Tang Huang Tune of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Origin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ropaganda and Educating to Creating a Stronge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TENG Zhi-peng, HUANG Ying(95)
- The Religious Circles in Guangxi to Assist in Constructing of 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nsolidating Ou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Significance,Advantages and Paths  
..... PAN Hong-wen, LIU Qiu-yan, WEI Meng-qi(101)
- The Fun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Vietnamese Sinophone Novels in Building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 a Focus on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 FAN Yi-lan(107)

# 全面深化改革论域中“系统集成”的话语溯源、运行机理及时代价值

张文龙,何绍坤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系统集成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系统集成在不同时代改革语境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其遵循了“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演变逻辑。要按照新的时代要求、新的使命任务、新的战略安排,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把握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加强政策集成、制度集成、组织集成、资源集成、成果集成,形成改革整体效益,推动改革往深往实走。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效规避“合成谬误”,避免了人民权利“空洞化与边缘化”、挫败了西方“政改滞后论”阴谋,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环境库兹涅茨陷阱”,体现了系统集成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的代价值。

**关键词:**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1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05-1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社会不断涌现的新矛盾。时代、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会一劳永逸。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sup>①</sup>。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都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需要正确把握改革与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重大关系,处理好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的,应用系统的、全面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而不是用

零散的、片面的观点将事物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用系统集成的方法把握改革规律,既要用系统思维把握各领域内的改革,也要把握各领域改革之间的协调联动,使各项改革在协同配合中推进;既要总结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经验,也要加强未来发展谋划、未雨绸缪,下好制度建设先行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

收稿日期:2024-07-31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4年社科基金项目(2024CGJ066);新疆师范大学2024年度智库招标课题重点项目(ZK2024B11)。

作者简介:张文龙,男,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何绍坤,男,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变”<sup>[2]</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sup>[2]</sup>。这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当作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敢于突进改革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非凡的决心和信心。

### 一、系统集成在不同时代改革语境中的丰富内涵

系统集成具有丰富的语义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进而客观、系统制定改革发展目标的重要体现。把历史的镜头向前延展开来,把系统集成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加以理解和审视,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政治话语或理论构想形成与发展,均非空中楼阁或凭空捏造,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与逻辑演进之中,其浮现遵循着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出场逻辑和语境。围绕系统集成这一主体自觉意识,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话语表达,与之有关的概念、命题和论断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愈发清晰明确。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中以独立自主的精神状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抑或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以系统集成的方法论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一)系统集成概念的基本内涵

系统集成是指将不同的软件、硬件、通信技术以及其他相关元素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其各部分之间能够相互协调、有机地工作,以达到整体优化和性能最优的目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系统集成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工作方式。系统集成倡导在研究问题、推进工作时要秉持开放思维、广阔视野、前瞻眼光,强调协同合作、顾全大局与整体利益。同时,它引导我们深入理解经济社会体制的系统构建、经济运行机制的构造功能以及社会主体间的相互关系<sup>[3]</sup>。当前,系统集成已成为一种极具鲜明中国特色和无产阶级政党特质的意义表达。一方面,在思想认识层面,系统集成表现为党对改革发展规律和全局脉络的科学把握与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在

实践活动层面,则表现为党以高屋建瓴的战略伟力来把握改革全局的政治定力,实现系统集成这一“舶来品”从“技术术语”到“政治话语”的语义转变,赋予其“政治身份”并进行确认。系统集成不是某一领域内单方面的集合,而是全方位、各领域、多层次的集成,是对现实发展的理性审视和未来规划的全面统筹。党将系统集成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论,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局部试点与整体推进相协调、重点突破与全面深化相衔接的方式,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纵观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我们对系统集成的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就是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简言之,系统集成就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sup>[2]</sup>,以全面整合的视角和方法系统推进改革工作进程。

通过考察、梳理党和国家有关重要文献,能够进一步把握系统集成概念的生成与演进逻辑。系统集成概念经历了从出场、内涵丰富再到政治确认的过程。其一,系统集成概念的首次明确提出。在党的有关重要文献中,明确使用系统集成概念是从1999年开始的。当年8月23日,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指出:“技术创新和实现产业化,重点要解决两头。一头要加强技术研究和开发能力,一头要加强系统集成、总装、检测和行销服务。”<sup>[4]</sup>这是党的文献首次明确提出“系统集成”这一概念。此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胡锦涛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5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等文献中,“系统集成”被多次提及,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系统集成”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其二,系统集成概念的政治确认。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以全党共同意志的形式将系统集成转化为具有政治高度与理论深度的话语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sup>[5]</sup><sup>[30]</sup>

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以系统集成的方法推动产业体系改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指出:“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sup>[6]</sup>在此,以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形式赋予系统集成这一概念权威性,充分彰显了系统集成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 (二)系统集成概念的使用场域

自1999年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系统集成”概念之后,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次重要讲话和会议中提到这一概念。以时间轴为依据,从具体内容来看,使用系统集成概念的场域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特区改革、建设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经验推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基础设施建设、军队及其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等方面。正如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强调:“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sup>[7]</sup>从各项改革所指的发展蓝图来看,本质上是对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8]</sup>,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和期许。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在大历史观中加以审视,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是加强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别具一格的中国式现代化。概言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长期性的战略工程,绝非在于一朝一夕之功,必然要求我们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其一,从技术创新视角看,系统集成概念的使用具有辩证性和政策性的特点。一方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就要“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sup>[9]</sup>。另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不能只把眼睛盯到国内,也“要眼睛向外,注重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sup>[10]</sup>。其二,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改革看,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衔接性和配套性。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以零打碎敲,不以碎片修补,要始终做到系统完备、衔接配套,从制度设计、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层级维度上确保反腐倡廉工作深入有效、持续进行,“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sup>[11]</sup>。其三,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来看,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导向性和现实性。“现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sup>[12]</sup>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盯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权益,解决好老百姓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紧盯制约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其四,从经济特区改革和建设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经验推广来看,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要支持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sup>[13]367</sup>,要率先试、勇敢闯,之后出经验、再推广,始终坚持“一盘棋”思想和增强一体化意识。要坚持党的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制度型开放并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度接轨,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使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其五,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来看,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科学性和连贯性。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着力点放到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系统集成、精准施策上来”<sup>[13]504</sup>,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衔接起来,“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

成、协同高效,打通淤点堵点,激发整体效应”<sup>[14]</sup>,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其六,从军事制度改革上看,这一概念的使用具有创新性和指导性。要想各项改革都要在军事政策制度体系框架下加以推进并发生“化学反应”,就“要把握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特殊复杂性,把系统集成作为一个基本理念和原则牢固确立起来”<sup>[15]</sup>,强化使命担当,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强军战略,不断把新时代强军事业推向前进。2023年2月,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强调要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在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2024年3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更好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sup>[16]</sup>。同年5月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以及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多次强调突出问题导向,加强改革系统集成。综上所述,“系统集成”概念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嬗变和话语意义的整体演进。

## 二、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运行机理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是进一步增强改革主动性,系统把握改革全局的重要方法。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然涉及政策、制度、组织、资源等方面改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sup>[17]</sup><sup>60</sup>,是由多项工作、多种手段、若干要素构成的,要在体制、机制、制度和技术、组织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整体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系统、联系、发展的方法加强整体谋划,“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sup>[18]</sup>。要处理好改革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减少阻力、增加助力。

### (一)政策集成

1.政策制定与协调机制。要推动各项改革落到

实处,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给予各项改革支持,着力分析不同政策间的衔接与互补,确保政策体系的整体性、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制定改革方案坚持了体系设计的原则,实施改革方案也要贯彻体系配套的思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确保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得到充分体现,确保新旧体制顺利对接、平稳过渡。”<sup>[17]</sup><sup>215</sup>要按照政策精准化、措施精细化、协调机制化的要求,落实改革各项发展目标,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反腐败协调机制、知识产权协调机制等。其一,政策精准化。政策制定之初,就必须明确改革目标,细化政策措施,确保每一项政策都能精准对接改革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加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与反馈,及时调整优化,确保政策始终与改革实践相契合。其二,措施精细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重细节管理,将每一项改革任务分解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和预期成果。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改革措施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避免出现偏差或脱节。其三,协调机制化。协调机制是保障政策体系整体性和一致性的重要手段,建立健全各类协调机制,如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等。这些机制应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迅速响应改革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改革合力。

2.政策执行与反馈。出台任何一项政策,初衷无论有多好,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要考虑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情况与政策初衷的差别以及与其他政策所产生的叠加效应或造成不同政策间的冲突。要提高服务水平与管理水平,制定政策的相关配套举措,细化、量化政策执行措施,捕捉和反映方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减少执行偏差,少走改革弯路,消除人民群众对于改革存在的模糊认识,提高人民群众、政府、党三者之间的联动水平。增进人民群众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加强政策执行协调性,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以实际行动推动政策落实、落细和落地,避免“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sup>[19]</sup>。要深刻认识



到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的差距,加强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确保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鼓励公众参与和政策反馈,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民主性,提高政策的可接受性和执行力。同时,根据政策执行的反馈情况,作出及时的、必要的调整,完善基于信息反馈的政策调整机制。

## (二)制度集成

1.制度创新与整合。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科学之智从容应对,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制定改革方案的出发点,改革不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衔接配套。“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sup>[20]</sup>要准确把握改革内在联系,提高改革系统集成。要在坚持和发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及重要制度的基础上,立足国情、践行法治、锐意创新,构建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不断完善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制度体系,突破约束改革的堵点、卡点、脆弱点。加快复制和推广试验点的改革成果,扩大辐射和溢出效应,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制度创新要促进和保证各项制度间融合与协同,精准识别现有制度体系中的瓶颈与摩擦点,通过引入新颖的制度设计或优化既有制度规则,构建更为完善的制度框架,优化制度结构,明确制度边界,强化制度衔接等方式,促进不同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简化流程、统一标准、明确责任等方式来降低新旧制度间运行阻力和成本,减少制度摩擦。

2.制度保障体系。要完善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是完善法治保障。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sup>[21]</sup>。监督机制作为制度的守护者,通过完善监察机构设置,实施透明的信息公开,强化内外部审计与评估,鼓励公众与媒体参与监督,纠正制度执行偏差,精准高效推进统筹协调工作,完善与新体制深度融合的工作运行机制,强化改革配套政策体系与法规

制度保障。二是完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制度活力的源泉,是完善制度的“加速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又严格问责、惩治懈怠,形成“奖优罚劣、优胜劣汰”的奖惩制度,既能促进制度的高效执行,又能推动制度本身的持续优化与创新。

## (三)组织集成

1.组织结构与职能调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部署<sup>[22]</sup>。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组织结构和职能调整,能够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领导,确保组织架构的科学性不断提升,职能分配的合理性持续优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并进,实现运行管理的效率与效能质的飞跃。组织结构与职能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战略规划中的新布局、工作实践中涌现的新需求,按照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政府的执行力、群团组织活力的要求,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群团工作体系。完成组织架构重建、实现机构职能调整,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发生了“物理变化”,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sup>[23]</sup>。要始终保持改革战略定力,深化以往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巩固组织结构与职能调整的改革成果,确保改革举措深度契合并高效服务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全局;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确保其始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确保改革任务推进和机构职能调整的配套联动,打好改革组合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跨部门协作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整体谋划的周密性,深入探究并紧密联结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有效的跨部门沟通与合作机制,在系统性上相辅相成,在可行性上稳健可靠,确保改革任务的相互衔接。其一,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边界与协作领域,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确保各部门在改革进程中能

够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偏差。其二,优化跨部门协作机制的制度设计与流程。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协作规程,明确协作的具体步骤、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和过渡时间,提高协作效率,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sup>[24]</sup>。其三,强化跨部门协作机制监督与评估。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或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协作过程进行监督与定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改进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流程的重要依据,推动跨部门协作机制不断完善与提升。

#### (四)资源集成

1.资源配置与整合。高效配置与整合各类资源的核心在于科学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以全局视野和前瞻性思维,“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人才体制、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sup>[25]</sup>,运用系统思维、系统科学、系统方法准确识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和瓶颈。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重点突破,又要抓当前、谋长远,向重点领域聚焦发力,强化改革创新,强化资源整合。注重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提升,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精准对接供需两侧,减少资源浪费与闲置。同时,构建开放合作的资源共享平台,鼓励跨界融合与协同创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资源配置,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源供给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紧紧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标准的明晰化、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和流程互联互通,形成协同攻关合力,实现资源的科学配置与整合。

2.资源共享与利用。利用系统集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与工具,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sup>[26]</sup>。深化数据治理体系,明

确数据权属与流通规则,在确保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加速数据资产化进程,让数据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生产工具,促进数据资源的高效配置与有序利用,发挥资源共享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打破信息壁垒、信息孤岛,实现资源共享,推动资源在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间的共享与高效利用,确保改革举措在横向上相互关联、在纵向上前后衔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改革新局面。要发挥人才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共享中的“中间件”作用,“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sup>[27]</sup>,优化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打造一支既懂业务又精通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 (五)成果集成

1.持续改进与优化的循环机制。这一机制也称为戴明环,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戴明提出的一种经典的质量管理方法,通常指的是一种系统性的、迭代的、问题导向的管理过程,旨在不断提升组织或系统的性能、效率和质量,通过PDCA循环管理实现持续改进和优化。这一机制也可用在改革的某一领域,对改革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评测,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改进机制,以期为后续改革提供经验借鉴。(1)计划(Plan)。明确改革的目标、方向和具体任务,科学制定改革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包括政策制定、制度设计、技术选型、组织调整等方面的规划。(2)执行(Do)。按照计划实施改革措施,包括政策执行、制度落实、技术应用、组织变革等。在这一阶段,需要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并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以便后续评估。(3)检查(Check)。对改革的执行措施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包括检查实际改革成效与设定目标之间的差距、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评估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和效率等。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收集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以便为后续的政策和制度的改进提供依据。(4)行动(Act)。根据评测出的

数据结果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和改进措施,包括调整计划、优化流程、改进技术、完善制度等。可以采用“试错”思维,先进行小范围试点,之后再推广,通过实践和验证的方式寻找解决改革过程中所遇到问题的最佳方案,提高改进效率和减少“试错”成本。

2.改革成果的巩固与拓展。要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人民需求,勇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要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稳扎稳打,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积极探索新的改革领域和路径,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创新的思维,不断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巩固改革成果,既要对其已实施的各项改革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强化和完善,确保其长期发挥效用,也“要推进改革成果系统集成,做好成果梳理对接,从整体上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sup>[28]</sup>。在做到制度成果有效衔接的同时,也要做好利益成果的合理分配,以改革谋发展、以改革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致力于建设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三、加强改革系统集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既是我们党坚持顶层设计与领导人民摸着石头过河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深走实,就需要我们始终坚持以改革系统集成的重要方法论,深入探赜其时代价值的深层逻辑,使系统集成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强基固本的历史效用。

(一)加强改革系统集成,破除改革“双板效应”,规避了改革“合成谬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向纵深发展,改革任务愈发艰巨,涉及层面愈见广泛,深化程度也更为彻底。在改

革过程中,任何单方面的滞后短板均可能成为掣肘改革整体步伐与综合成效的绊脚石,造成“短板效应”。个别地区一体化进程相对缓慢,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机制性梗阻和制度性堵点。这就需要通过系统集成来解决发展过程中“人、地、钱”的问题,释放生产活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强化改革协同性,促进各领域改革良性互动,汇聚改革合力,以战略眼光对改革的各项政策、制度进行联动设计、系统集成,打通堵点、连好断点,提升改革总体效益和改革举措的有效性。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存在少数事物从单方面看似乎是合理正确的,但合成一体时却又会成为阻碍改革的“合成谬误”。对此类问题,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要增强系统思维,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sup>[29]</sup>,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及时沟通与协调,聚焦多重机制的紧密联动与深度耦合,以及跨部门间战略、规划与政策的无缝对接与协同推进,以改革的系统协同,有效规避重复执行、效益不佳的“合成谬误”风险,确保各项举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避免了人民主体权利的“空洞化与边缘化”

西式民主中人民只有在选举时“在场”,而在选举完成之后,民主就成了付之阙如的“熊彼特式民主”,造成了民主权利的缺位,把“人民的民主”闲置一旁。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通过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把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人民民主,避免了西式民主选举时漫天许诺,事后却又无人过问而造成的人民权利的“离场与虚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在民主权利方面的系统集成改革,聚焦于人民怎样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自己的权利,摒弃“选举出掌握决策权的人”的西式民主观,打破了西方的“伪民主”。当前,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架构维度上,确保了民主根基深植于人民之中;在主体维度

上,更加鲜明地凸显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与“人民福祉”的优先地位,让民主实践成为人民利益最直接、最生动的表达;在实践维度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了人民全过程参与,确保了人民的意志与诉求在国家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尊重。

(三)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挫败了改革“滞后论”等的阴谋

改革“滞后论”是指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革,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匹配。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面对改革“西化论”“滞后论”“怀疑论”等错误思想论断,要警惕西方妄想通过政治自由化,鼓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迫使我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进而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图谋。“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sup>[30]20</sup>,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改革割裂开来,无疑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狭隘视角。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程中,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sup>[30]15</sup>。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不断完善政治制度,要结合当前中国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既不能复古守旧也不能好高骛远,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强系统集成,加强政治制度建设的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协同,坚持正确方向,合理有序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四)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超越了西方现代社会“单向文明”

现代工业化社会催生了大量生产资料,导致只

重视物质生产而忽略人的精神需要,造成主体成为自我异化而缺乏批判性与否定性的单向主体——异化的人。受此影响,整个社会也成为物欲主义膨胀、追求感性世俗的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社会塑造出单向度的人是一种畸形的人,是内心缺乏自由、追求享乐、忽视精神的人。“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旨在用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sup>[31]</sup>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与社会共命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sup>[32]</sup>。一方面,人是现代化实践活动的主体,现代化要依靠人来实现;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可以满足人的需要,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二者呈现出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在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建的逻辑,以系统集成的方法论致力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丰富物质产品,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丰富精神财富,为物质生活找到归依之所。中国式现代化不以追求人的单面发展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强调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的均衡发展,超越了“单向度的人”的“单向文明”,人也不再是“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sup>[33]</sup>,不再是变形与异化的人。

(五)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以共同体理念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共享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分类主义”作出合理的辩护,成为人的不平等、阶级固化、主体间性关系问题的借口。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下,人与人的交互关系走向了自我反面的单向度。同时,自由主义把工具性视为一切事务是否有用的实用主义考量标准,把人当做攫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人”来看待,资本也就成了宰制资本主义世界万物“普照的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奋斗和在改革成果分配中始终坚持“共建、共

治、共享”的原则,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sup>[5]47</sup>。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高低等级之分、尊贵卑贱之别的“分类主义”原则,始终把“人民至上”当作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当作自己的初心使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在于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方法论推进改革深入实施,把财富的“蛋糕”做大做好;另一方面在于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做大做好的基础上,用合理的分配制度分配好财富的“大蛋糕”,用制度保障财富的分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六)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跨越了“环境库兹涅茨陷阱”

“环境库兹涅茨陷阱”是指生态环境质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主要是受经济发展影响,而未能超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顶点的现象。这种现象体现为国家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受到的影响就少;发展水平高,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就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生态环境又逐渐转好。此种理论认为,任何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普遍都会经历这一过程,先污染后治理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西方大多国家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过资源掠夺和污染产业转移,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攫取,走的是生态殖民的老路。在西方传统观念中,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随意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缺乏对自然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奉行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单纯掠夺自然资源的线性生态观。我们历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论。同时,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生态环境恢复能力有限。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决不能走“生态殖民”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发展,强

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系统集成,“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sup>[3]41</sup>,既秉持着辩证思维,又坚持系统思维,坚决不走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道路,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增强持续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做到了追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平衡与协调。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J].求是,2023(11).
-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3]张晖明.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J].红旗文稿,2020(24).
-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8.
-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07-22(1).
- [7]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N].人民日报,2024-05-24(1).
-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8.
- [9]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0.
- [10]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69.
- [11]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

-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64.
-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56.
- [13]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26.
- [15]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凝心聚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 把新时代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9-08-01(1).
- [16]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N].人民日报,2024-03-22(1).
- [1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8]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J].求是,2024(10).
- [1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73.
- [20]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强调 聚集改革资源激发创新活力 更加富有成效抓好改革工作[N].人民日报,2016-06-28(1).
-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00.
- [22]本报评论员.不折不扣把机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N].人民日报,2023-03-02(4).
- [23]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99.
- [2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N]. 人民日报,2019-10-26(1).
- [25]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4-14(2).
- [26]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N].人民日报,2016-10-09(1).
- [27]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求是,2021(24).
- [28]习近平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 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9-07-06(1).
- [29]习近平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N].人民日报,2016-01-08(1).
-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
-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94.
- [33]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15.
- [34]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84.

责任编辑:祝远娟

#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的七大辩证关系论析

吴 激<sup>1</sup>, 郭清梅<sup>2</sup>

(1.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2.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31)

**摘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必须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从改革的性质、必要性、原则、思想方法、布局、实践路径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深入理解和把握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进路,需要把握好党的全面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等七大辩证统一关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辩证关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15-0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sup>[1]</sup>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sup>[2]</sup>这表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新时代新征程从改革的性质、必要性、原则、思想方法、布局、实践路径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深入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握并正确处理党的全面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系统集成与突出重

点、顶层设计与基础探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等七大辩证关系,对于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

性质决定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刻地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属性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把握党的全面领导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深入理解这一辩证统一关系的内在价值要求,是正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要旨所在。

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收稿日期:2024-07-25

作者简介:吴激,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郭清梅,女,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学报副主编,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

《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sup>[1]</sup>在改革的方向层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在改革的立场层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确保改革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依靠人民进行改革、为了人民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效由人民来评判。在改革的原则层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使改革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确保改革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本质属性。《决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sup>[1]</sup>，“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动力、目的等三个层面凸显了鲜明的人民性。从主体角度,人民性体现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使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成为党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的过程。从动力角度,人民性体现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吸纳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以更成熟的经验、更明确的方向推动改革走深走实。从目的角度,人民性体现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在保证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兼顾不同层面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和诉求,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回应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党的全面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sup>[9]38</sup>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其合规律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在阶级社会,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需要先进的政党来领导。这一原理说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的依靠者和推动者,还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辩证统一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需要,体现了其目的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对生产关系以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变革,是对各方面利益的深刻调整。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协调改革实践中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 二、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改革的必要性角度出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善于领导社会革命、敢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正确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全方位的变革。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sup>[14]</sup>从改革的起点上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改革的内容上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思想观念束缚、现有权利分配格局和利益固化藩篱,以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改革的影响上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文明方式以及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造成深刻变化,它是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的变革。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sup>[19]26</sup>，“改革开放是



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sup>[3]35</sup>。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以自身为革命对象,主动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理论创造与实践活动。习近平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sup>[5]</sup>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又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思想的禁锢是改革的最大障碍。推进改革,首先要抓住思想解放这个根本。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冲破思想观念障碍,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回应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之问。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破除不合时宜的僵化体制机制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进一步提高党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如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自身建设制度、监督保障制度等,“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sup>[6]</sup>。《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等一系列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要求<sup>[1]</sup>,涵盖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具体内容,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融入国家治理体系。这表明,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过程。

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先进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体现了其先进性。《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7]411</sup>这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因。党的性质宗旨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作为目标和标准检视自己、要求自己和完善自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能引领社会革命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辩证统一具有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sup>[7]171</sup>。实践证明,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使党在自我革命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才能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正确把握改革大局,从大局出发看待利益关系调整”,“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sup>[8]</sup>。《决定》强调要“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sup>[1]</sup>,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 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

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遵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

解放思想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习近平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sup>[9]87</sup>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解放思想。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了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需要探索更优的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因此,必

须通过解放思想来克服各种陈旧观念、惯性思维的消极影响,让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跟得上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另一方面,不同地区或部门之间利益的掣肘也会导致思想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解放思想。藩篱指的是“边界、屏障”,利益固化的藩篱形象地比喻了某些地区或部门利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手段形成难以逾越的壁垒,阻碍资源与机会公平分配的现象。改革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调整改进利益分配机制的过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攻坚难度大,必须通过解放思想,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促进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实事求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要求。“‘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sup>[10]</sup>,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把握事物所固有的内在规律性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旨在通过机构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为了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决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要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规律,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工作<sup>[11]</sup>。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sup>[11]18-19</sup>。“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人口规模效应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式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致力于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差距;“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促进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既要求实事求是地认清中国整体迈进现代化面临极为艰巨和复杂的形势任务,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又要求改革的方向和举措应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实际,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观为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马克思主义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必须遵循这一原理。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凭主观想象、脱离客观实际的蛮干,而是我们党在深入分析我国国情、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领导的有步骤的改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分析和不断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出的每一项政策、做出的每一个举措都能符合客观实际,顺乎民心。另一方面,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改革实践,以总结实践经验推动理论创新,努力实现思想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改革的使命、方向、目标、策略等方面作出了系统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指出:“面对现代化

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sup>[12]</sup>为了夺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胜利,需要我们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 四、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改革的思想方法角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根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魂脉”,又反映时代诉求、在创新中寻求突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的辩证关系。

坚持培根铸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遵循。坚持“铸魂”,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恩格斯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sup>[13]</sup>由此可见,坚守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充分发挥改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坚持依靠改革来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此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坚持“培根”,就是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习近平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sup>[14]</sup>这表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智慧。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思想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重要原则提供了思想遵循;“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原则提供了思想遵循;“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等系统思维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一重要原则提供了思想遵循;“旧邦新命,其命维新”等革新思想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一重要原则提供了思想遵循;“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等法治思想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要原则提供了思想遵循;“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等制度思想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这一重要原则提供了思想遵循。只有坚持培根铸魂,才能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

坚持守正创新,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准方向。习近平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sup>[11][16-17]</sup>改革只有在守正基础上创新,才不会偏离方向;只有在创新基础上守正,才能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就是恪守正道、创新突破。一方面,坚持守正,就是要守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和源。坚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源,就是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sup>[19][2]</sup>，“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sup>[15]</sup>。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改革坚守的真理和正道。坚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就是要坚守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动摇,坚持贯通和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不偏离,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总目标不放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迷失。另一方面,坚持创新,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sup>[16][536]</sup>。在改革的实践中探索理论创新,用创新理论引领改革实践的发展。在制度创新方面,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为改革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在文化创新方面,着眼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观点为处理好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变化是指事物发生的一切改变,发展则是事物变化中前进、上升的运动。物质世界的发展,其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坚持培根铸魂,不是一味固守中华文明,而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守正创新,不仅要恪守正道,坚守改革的原则和底线,还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推陈出新。培根铸魂是守正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守正创新是培根铸魂的发展和飞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培根铸魂与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要以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和新形式确保各项改革任务顺利落实。

### 五、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改革布局角度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系统部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又更加突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的辩证关系。

改革注重系统集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sup>[17]</sup>系统集成强调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从整体出发,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整体联动的方式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确保改革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解决经济领域的改革难题,也要同时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改革的战略部署具有协同性。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全面深化从架构上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党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来统筹思考、系统谋划和协调推进全面改革,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比作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互贯通、协同推进;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保证;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升为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可见,我们党立足于深化改革全局角度,通过系统全面的战略部署为中国式现代化全方位注入活力。另一方面,改革的战略任务具有系统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18]</sup>《决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sup>[19]</sup>首要任务与重大任务构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双重战略任务”,抓住了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前者强调的是经济领域,解决的是供给问题,后者强调的是社会领域,解决的是需求和分配问题,从战略任务层面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

改革突出重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sup>[20]</sup>突出重点要求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以重点领域和中心任务为具体抓手,以“点”的突破带动“面”的跃迁,形成改革合力。一方面,我们党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支持全面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sup>[21]</sup>。经济体制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抓住了破解增强发展动力难题的主要矛盾,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聚焦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习近平指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sup>[22]</sup>我们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作出进

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等举措,不断找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此外,在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党还主动统筹谋划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法治、教育科技人才、国家安全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着力解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卡点堵点问题,不断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其他领域改革也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sup>[2]</sup>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关系的原理,为处理好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事物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要全面地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重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解决。要在两点中抓住重点,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这一原理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处理好系统集成和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一方面,要统筹全局部署改革,兼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改革要分清主次,找准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点,注重各个击破。

#### 六、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辩证统一关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改革的实践路径角度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对目标、方向、任务、行动纲领等进行顶层设计,又需要通过基层探索为顶层设计提供实践基础与成效验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辩证关系。

科学的顶层设计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层探索。习近平指出:“进行顶层设计,需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sup>[18]</sup>顶层设计就是在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人民群众共同愿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全面深化改革设定合理可行的宏观目标与行动方向,统筹改革各要

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体性规划和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进程。一方面,从宏观上看,为确保改革目标的接续递进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我们党先后将全面依法治国改革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改革任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建设改革要求、新发展阶段改革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改革要求纳入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推动改革顶层设计梯次衔接。另一方面,从微观上看,为确保改革内容的贯通协调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1][18]</sup>因此,要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十四亿多人口整体带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改革的决策要从国情出发,考虑人口规模巨大的实际。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改革的目标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发展愿景,改革要统筹考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的关系。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改革的举措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系统观念出发,坚持从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改革要以中国发展有力推进世界秩序更加公平发展的格局出发,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人类进步。

深入的基层探索能够不断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基层探索就是通过大胆的实践更好地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诉求和愿望,深入探索并运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更能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各自具体实际开拓创新,特别是在前沿实践、未知领域,鼓励大胆探索、敢为人先,寻求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创

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sup>[19]</sup>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边摸索边前进,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认真谋划好各项分类改革试点,凝练出典型经验与有效做法,不断发挥改革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带动和突破作用,在试点探路的基础上完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难点中寻找改革实践的切入点用力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推出的改革方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始终从人民群众实际诉求出发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完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遵循。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认识是实践的指导和推动力。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认识和实践相互依存又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一原理为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提供了遵循。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做好政策出台、战略安排、统筹发展等方面的顶层设计,确保从中央到地方全面贯彻,决不能出现动摇和偏颇。另一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鼓励和支持基层大胆探索,从生动鲜活的基层实践中探索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新鲜经验,从而为顶层设计的制定提供坚实基础。此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为人民谋利益、谋福祉,在基层探索中必须注重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改革和现代化事业注入强劲力量。

### 七、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

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系。

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创造条件。一方面,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提供制度保障。《决定》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等目标要求<sup>[1]</sup>,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决破除一切阻碍扩大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深化改革优化了对外开放的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构建和完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sup>[16]530</sup>;《决定》强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sup>[1]</sup>,对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提出符合各地发展实际和比较优势的要求,加快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深层次的改革优化对外开放的布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重要的遵循。

扩大开放是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决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sup>[1]</sup>。对外开放是由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现代化大生产推进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其一,开放能为改革提供丰富的资源。扩大开放能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其二,开放促进改革意识的觉醒。开放促进了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交汇交融,不断冲击并改变传统观念,激发创新精神,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解放思想。其三,开放推动改革成果的巩固、拓展和共享。当前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寻求与其他国家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公约数,对外能够使改革成果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持续深化平等互利的交流合作;对内则能够增强我

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动力,持续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为处理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是关于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一对基本范畴。矛盾的同一体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性质,体现了矛盾双方的差别性和对立性。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一原理为处理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遵循。一方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同一性。深化改革为扩大开放解决内部体制性障碍,扩大开放为深化改革增强动力、拓展空间。另一方面,深化改革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存在一定的斗争性。同时,扩大开放会带来国际关系之间、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这同样也是矛盾斗争性的体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坚持扩大开放。既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又要通过扩大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2]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 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N].人民日报,2024-05-24(1).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75.
-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43.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04.
-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1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2]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
-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738.
- [15]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6.
- [1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828.
- [18]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 [19]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J].求是,2023(19).

责任编辑:刘菊香

#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逻辑理路

## ——基于制度效能的分析

刘菊香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焦提升制度效能,从制度特色、制度实效、制度影响三个维度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不断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特色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与基石,具体涵盖性质特色、特征特色、属性特色、优势特色和共识特色。制度实效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关键与动力,制度效能的发挥体现在主体力量、形式载体、着力方向上。制度影响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保障与方向,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制度效能为主线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制度特色是提升制度效能的前提基础,制度实效是制度保持生命力之关键点,制度影响是制度效能作用的必然结果,三者共同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体现出强大的制度效能。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制度效能;逻辑理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3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24-10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普遍政治形态。“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sup>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智慧、体现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展示出显著效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国土壤,适合中国国情,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sup>[2]</sup>。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

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的”的新形势<sup>[3]</sup>,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等重大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要求。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从概念内涵、生成逻辑、制度机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等维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注重研究中国新型

收稿日期:2024-06-07

基金项目:2022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2BZZ001)

作者简介:刘菊香,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与参政党建设。



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印发一系列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为新时代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75周年之际,本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从制度效能的维度探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逻辑理路,以资借鉴。

### 一、制度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与基石

“特色”是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sup>[4]</sup>。政党制度特色则是指某一政党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质、特征等,是辨别政党制度的根本。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党制度,每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和旧式政党制度的显著特色,具体体现为性质特色、特征特色、属性特色、优势特色、共识特色等五个方面的“制度特色”,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也是发挥其制度效能的基石。

####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特色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特色。1905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全国性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我国开始探索实行政党政治,先后尝试过议会制、多党制、一党制等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制度,但都没有成功。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鲜明的性质特色:从社会意识形态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制度;从政党关系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合作型政党制度;从制度功能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两大明显特征的政党制度。虽如此,在当时并未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也未明确其丰富的性质内涵。1987年中共十

三大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sup>[5]</sup>;198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sup>[6]</sup>。2005年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sup>[7]</sup>。由此可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特性及其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愈加深入。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首次将我国政党制度概括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公开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sup>[8]</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性质特色的概括已突破自身原本的功能特性与社会属性,从比较的视野将其放在与旧式政党制度以及世界政党制度中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从利益代表、党际关系、决策施政、制度效能等方面概括出比较优势。可见,这一性质判断能让全社会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把握我国政党制度。

####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特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领导关系,有集体行动就会存在领导行为。在世界政党制度中,实行一党制的国家一党独揽国家权力;实行两党制、多党制的国家中的各政党虽是独立的竞争关系,未公开也不承认政党之间有领导关系,但竞争获胜的政党上台后通常会成为被其他政党接受的执政者。在我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sup>[9]</sup>。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实践中的选择,是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确立伊始就具有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根本标识。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系统阐述了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何种性质的领导、谁来领导、领导什么、怎样领导等重要问题。第一,从领导性质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sup>[9]303</sup>,不是组织或行政领导,既不能“不重视思想引导,对党外人士思想活动不关注”<sup>[10]560</sup>,也不能“把民主党派组织当成下属单位,对民主党派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包办代替”<sup>[10]560</sup>,而应“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sup>[11]</sup>。第二,从谁来领导来看,习近平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sup>[9]303</sup>。如2022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强调“党中央对政治协商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明确了地方党委、党委统战部、政协党组各自在政治协商中的主要职责。第三,从领导什么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通过制定《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sup>[12]</sup>,如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纳入议事日程、统筹安排、纳入决策程序等。第四,从怎样领导来看,党中央在把握多党合作规律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联谊交友、照顾利益、民主协商、教育引导等方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更能体现制度效能。如中国共产党既要尊重同盟者利益,也要帮助其排忧解难;又如联谊交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sup>[9]305</sup>。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各政党是共存共亡的关系,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共谱多党合作同心曲。

###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属性特色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属性特色。古今中外,民主理论形形色色,民主形式多种

多样,但不管哪种形式的“民主”都与“人民”紧密相连,是“由人所进行的统治”和“人民当权的”<sup>[13]</sup>。只不过不同形式的“民主”中的“人民”的范围是不同的,如西方民主中的“人民”声称是指公民、国民,但实际“是有钱人的‘民主’,不是真民主”<sup>[14]</sup>。同样,一个国家的制度也与“人民”紧密关联,是“人民的自我规定”<sup>[15]</sup>。现代民主政治与政党制度密不可分,政党制度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载体。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人民是民主制国家的主体,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立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民当家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sup>[16]</sup>。我国人民民主的“人民”是14多亿中国人民,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sup>[17]</sup>,是迄今为止各类民主形态中“人民”范围最广、享受权利最真实的民主。“在中国,国家各项制度都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的。”<sup>[18]</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民主实现形式和制度载体,它“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sup>[11]8</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有九个政党,其中中国共产党有9800多万党员,代表和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八个民主党派有140多万成员,代表反映着各自联系的群众的利益诉求,如农工党代表和反映的是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及相关科技教育领域群众的利益,致公党代表和反映的是归侨、侨眷及有海外关系群众的利益诉求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政党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诉求纳入民主实践过程。尤其是通过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作用,“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sup>[16]15</sup>,避免了只代表和反映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诉求的旧式政党制度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

###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特色

在世界政党制度大家庭中,各个国家立足自身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实际,所选择的政党制度各有

特色、各不相同。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sup>[19]286</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和旧式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即“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sup>[12]</sup>,这是符合我国历史文化、发展实际且能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制度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期,这种制度优势特色带来的制度效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同,“言必称希腊”“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自家肉不香,人家的肉有味”等就是误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如“讲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sup>[17]</sup>。关于如何衡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特色,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过重要论述。比如,毛泽东曾提出以是否对生产力发展有帮助及帮助大小为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与特色。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以“五个有效克服”阐述了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优势特色<sup>[10]76</sup>。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两会”的联组会上提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并从利益代表、结构功能、治理效能的角度阐述了这一制度的独特比较优势。2021年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进一步从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决策施策的科学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等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

####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共识特色

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都是因共识而立、应共识而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公开发布的“五一口号”提出的政治主张,得到各政党、各界人士的认可和拥护,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共同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同纲领》成为当时多党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提出必须坚持“七条准则”<sup>[18]</sup>。这七条准则,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有一条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六条标准也是当时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sup>[19]</sup>。198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了人民政协政治基础是“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2006年7月,胡锦涛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重要命题。2013年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迎春座谈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力量。”<sup>[20]</sup>此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不断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长期的多党合作实践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各政党正是因为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才能始终做到同心同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也是各政党团结奋斗的旗帜;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容性极强,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统一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行动指南,也是根本制度保障;三是这一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进而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 二、制度实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关键与动力

“实效”是指“效力、贡献的才能与发挥出来的效

果,事物的效率,事物所蕴藏的功效”<sup>[21]</sup>。制度实效是指制度实践达成预期结果或影响的程度,是衡量制度实践的尺度,“是制度的运转状态、执行程度、作用效果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反映,制度效能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政党成熟程度和现代水平的重要标志”<sup>[22]</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既要讲究、突显其特色,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其优势产生的实效,只有产生好的实效才是好的制度。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效具体体现为主体力量、形式载体、着力方向等三个方面,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关键与动力。

#### (一)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效的主体力量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参政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之时就明确了多党合作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何种身份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发挥作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参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这一提法有了反复,仍被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sup>[23]</sup>。1962年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后调整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但是仅过了半年,又回到“资产阶级性质政党”的提法上,并延续到“文化大革命”。1979年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正式明确民主党派是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治联盟,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主体的性质定位。1989年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提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概念,并强调要发挥无党派人士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200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sup>[7]</sup>,并强调“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sup>[7]</sup>。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主体力量的政治地位、性质定位进一步明确与深化。2012年,习近平提出“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参政党”的重要论述<sup>[24]</sup>,并在2013年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将其表述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sup>[20]</sup>。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这一新表述进一步完善并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条文的形式进行规范,同时还明确“无党派人士可以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sup>[25]</sup>。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进一步确立。2018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提出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重要论述,形象地描述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亲密友党关系。这更有利于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发挥,各政党共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重申了多党合作主体这一性质定位,并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多党合作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参政力量的政治地位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

#### (二)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效的形式载体

人民政协是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在实现多党合作的形式载体中,人民政协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点鲜明的形式载体,也是与多党合作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形式载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1954年人民政协结束代行人大职权的职权后,毛泽东就明确了人民政协与多党合作之间的关系,即“政协不仅是人

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sup>[26]</sup>。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党合作实践范围和程度的拓展,人民政协与多党合作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邓小平强调“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sup>[26]</sup>。1989年中共中央以党内文件的形式明确人民政协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应成为各党派、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团结合作、参政议政的重要场所”<sup>[6]</sup>。2004年人民政协章程明确人民政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党的十八大以后,人民政协性质作用有了新的定位。2018年政协章程和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都强调人民政协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强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sup>[13]</sup>在人民政协组织构成中,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政协中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协领导班子中党外副主席不少于50%。如2023年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时,2169名委员中党外代表人士的比例达60.8%<sup>[27]</sup>。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实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的作用。人民政协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广泛协商、监督,提出意见、建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依托人民政协这一组织和载体在新时代迸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 (三)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效的着力方向

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是更好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着力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发挥离不开政党主体,各主体如何发挥作用影响制度效能发挥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的是领导作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参政党发挥的是辅助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能否最大化就看主体形成合力能否达到最大化,即执政党能否最大限度地创造条件发挥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sup>[28]</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一系列法规、文件都有效地保障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提升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具体体现在自身职能的履行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职能作用被概括为“参、代、监、改”四个字。改革开放后,在中共中央规范性文件中开始强调“充分发挥和加强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的作用”<sup>[29]</sup>,并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概括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基本职能。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将以上两项基本职能拓展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三项基本职能<sup>[25]</sup>。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总结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政党协商、民主监督、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议政建言、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实践成效,极大地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重要论述一方面强调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提高领导能力,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创造更好条件,在开展民主监督时容得下尖锐批评,在提高协商水平中担负首要责任等,推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制度化和规范化。

### 三、制度影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保障与方向

“影响”一般是指对人或事物所起的作用。政党制度影响是指某一政党制度通过其模式、运行、程序、实效等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的影响力。西方政党制度对整个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且极大地影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政党制度的认识与选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体现出较强的制度影响力,这是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保障和方向,也是制度效能发挥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首先是政治的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是经历长期的历史选择稳定下来的,又在面临各种考验的实践中努力维护国家政治格局稳定和社会稳定。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的。”<sup>[30]353</sup>他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对世界政党秩序做了一个定量分析:1945年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80个,其中一党制26个,发生政变的6个,占25%;一党居优制的16个,政变的7个,占44%;多党制的20个,发生政变的17个,占85%<sup>[30]359</sup>。邓小平也曾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sup>[31]</sup>我国在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多党纷争后自然选择了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不同于旧式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江泽民在提出衡量政党制度的好坏时提出的“四条标准”之一就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sup>[32]</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的实践证明,它是符合我国国情和能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党制度。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分析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五大价值功能,其中对“维护稳定”的分析是这一制度“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sup>[33]</sup>。2018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时强调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政治格局稳定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作用。2021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功能总结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sup>[1]18</sup>。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面向国外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样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

献。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启政党政治模式至今,政党政治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实行范围也已扩展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除十多个采取的是一党制外,绝大多数实行的是以政党竞争选举为突出特征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文明。在世界政党制度这座百花园中,“由于不同文明各有千秋”<sup>[1]653</sup>,各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也各具特色,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分子。由于西方政党政治探索较早,在3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构建起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话语体系,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和构建国家制度时移植了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模式,带来的不是繁荣稳定而是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我国在尝试西方多党制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探索出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文化特性的新型政党政治模式,打破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强势输出与话语霸权,“为发展中国家从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陷阱中跳出来,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sup>[34]</sup>,为人类政治文明增添一抹新亮色。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sup>[35]</sup>。欧洲左翼政党的领导人曾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左翼力量、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发展方向。”<sup>[2]</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展现出的参与广泛、决策科学、民主高效等独特优势,为人类社会提供处理政党关系、提升民主实效、解决国际社会问题的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民主事业发展探索新的路径”<sup>[1]649</sup>,使人类政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提升。

####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

一项制度是否能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这项制度能否取得成效、能否发挥作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sup>[28]16</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制度效能为主线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制度特色是提升制度效能的前

提基础,制度实效是制度保持生命力之关键点,制度影响是制度效能作用的必然结果,即制度特色——制度实效——制度影响,三者共同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发展,展现出强大的制度效能。

#### (一)制度特色是提升制度效能之前提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各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之所以各具特色是因为各个国家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不同。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未建立如英国一样的两党制,这较大程度上就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较为彻底、启蒙思想带来的民主思想较为浓厚等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sup>[110]</sup>。当前,对比“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两者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国家治理路径上,更在于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的不同,这一对比很好地诠释了制度特色与制度效能的关系。“制度优势是制度效能的重要保障,制度效能是制度优势的有力佐证和实践彰显,制度优势要借助制度的实际效能来展现。”<sup>[136]</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特色包括了“新”类型政党制度的性质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特征,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本质属性特色,具有在利益代表、奋斗目标、决策施策、国家治理方面的独特优势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共识特色,等等。这些特色超越了西方和旧式政党制度的固有标准,在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关系模式,使制度运行较好地实现制度预设目标,具有全新的价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特色是制度效能得以发挥的前提基础,制度效能是制度特色的外在表现,是具有特色的制度机制有序运行的最终结果,具体体现在共识达成、决策优化、行政高效、社会稳定等方面,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的本质逻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创新发展就要探索如何将制度特色优势转化为制度实效、国家治理效能。

#### (二)制度实效是制度保持生命力之关键点

制度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其执行与运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政治实践中持续释放和发挥现实作用,这是实现制度效能的内在需求和客观保障。从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不在于是竞争性还是合作性,而在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彰显出的实际效能”<sup>[137]</sup>。进而言之,政党制度生命力与制度实效、效能存在正比关系。如西方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都是根据这个国家实际情况设计的,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群体之间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持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强大效能,为我国改革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sup>[138]</sup>近代以来我国政党实践探索说明,我国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立足国情、顺应民意,既未照搬西方政党制度,也没有采用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选择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制度效能带来的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顺应时代发展,顶层制度设计更加明晰、政治共识更加巩固、制度效能更加彰显:如新时代十年中央层面召开政党协商会议 185 次,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提出意见建议 1 000 余件,民主监督助力脱贫攻坚取得“实打实”成效,同心战“疫”提出意见建议近 4 000 件、捐款捐物 51.08 亿元等<sup>[139]</sup>。这些成果彰显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展示着这一制度的旺盛生命力。

#### (三)制度影响是制度效能作用之必然结果

制度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起着激励或惩罚的作用,对一个国家兴衰产生或正面或反面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思说的:“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

解历史变迁的关键。”<sup>[40]49</sup> 西方话语中的“国家兴衰探源”和中国话语中的“王朝更替周期律”都反映了制度对国家带来的影响。一个国家政党制度对这个国家以至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这一制度效能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影响可以说是检验制度效能的重要标准。制度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比拼的实际上是制度影响正面效应的比拼。“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sup>[40]47</sup> 西方政党制度对内在西方国家政治权力更迭、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外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但对内也存在裹挟民意、绑架国家利益、加速国家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种种弊端,对外尤其是使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动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中产生了广泛的制度影响,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彰显出强大生命力。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的贺词就生动地彰显了我国和谐的政党关系。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的公开发布让国内外民众能更加准确和充分地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让其他国家更能体会一个国家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要努力做到与该国的国情和文化相适应。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地创新发展,制度优势特色产生的制度效能日益彰显,制度效能带来的制度影响在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一朵毫不逊色于西方政党制度的绚丽花朵。当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仍有改进完善的空间,在实践中仍存在不足,但我们对这一制度是自信的。只要既坚持“两个结合”,又学习借鉴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更加光彩夺目、影响深远。

####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光明日报,2018-10-19(16).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0.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8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N].人民日报,1990-02-08(1).

[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5-02-18(1).

[8]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16.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72.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1.

[14]中共中央发布会答凤凰卫视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问[EB/OL].(2021-11-12)[2024-04-17].[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43971635\\_61fd043300100vgye.html](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43971635_61fd043300100vgye.html).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



-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74.
-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N].人民日报,1954-12-26(2).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83.
- [20]习近平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3-02-08(1).
- [2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22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85.
- [22]董瑛.党内干部监督制度建设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9.
- [2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90.
- [24]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为实现中共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2-26(1).
- [25]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 [26]朱训,郑万通.中国人民政协全书:上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 [27]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现有2169名,具有四个特点[N].新京报,2023-03-03(1).
- [28]中共中央统战部.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 [29]付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的新表述[J].中国统一战线,2015(7).
- [30][美]塞缪斯·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4.
- [32]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开幕 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0-12-05(1).
-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EB/OL].(2015-01-05)[2024-04-16].<http://tzb.cumt.edu.cn/98/f0/c2441a170224/page.htm>.
- [34]邵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N].团结报,2018-07-10(8).
- [35]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 [36]田旭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效能的现实境遇与实践要求[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2).
- [37]张献生.我国政党制度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J].红旗文稿,2017(5).
- [3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63.
- [39]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与成就[EB/OL].(2022-08-16)[2024-01-25].<https://m.gmw.cn/baijia/2022-08/16/35957589.html>.
- [40][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北京:格致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张淑瑛

# 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制度目标与治理效能研究

——基于H市的调研分析

崔 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制度目标主要有人民民主、社会整合、国家治理三大指向。将多党合作更好地嵌入政府决策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发挥其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是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使命。本文从地方治理政策议题视角分析多党合作的运行情况及其作用,认为新时代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治理效能,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民主党派组织化参与水平,更加重视政治技术与参政方法,不断提升民主党派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多党合作;制度目标;治理效能;政策议题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4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34-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强调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由“领导—合作”“执政—参政”构成的复合模式,集价值引领、制度支撑和功能实现于一体,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sup>[1]</sup>2024年初,习近平强调:“要切实提高政党协商质量,不断健全议政建言机制,有序开展民主监督,拓展发挥优势作用的平台载体,着力提升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效能。”<sup>[2]</sup>这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的制度目标与治理效能。本课题以H市的调研为基础,从地方治理政策议题视角分析多党合作的运行情况及其作用,并提出进一步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治理效能的对策,以资借鉴。

## 一、分析框架与分析样本

关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学界有各种观点和归纳。有学者提出多党合作制度的效能是指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体现出的优越性,具体表现为共识达成、决策优化、执行高效、维护稳定等<sup>[3]</sup>。有学者从某一角度着重探讨制度的团结效能,如政党合作角度<sup>[4]</sup>。也有学者对多党合作如何通过“有效的

收稿日期:2024-06-07

作者简介:崔珏,女,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制度、统一战线理论。

运行机制”生成制度效能进行了研究<sup>[9]</sup>。但总的来说,学界从如何衡量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出发开展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笔者较认同的观点是:“政党制度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着的系统,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的目标。效能就是政党制度这一特定结构功能的目标设定和实现程度。”<sup>[10]</sup>这为深入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供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分析框架。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将多党合作更好地嵌入政府决策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发挥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成为多党合作制度在新时代的重要使命。

从地方治理政策议题视角分析多党合作的运行情况和制度效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数据来源形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 H 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专题问卷调查,收到有效问卷 684 份;二是收集 2018—2023 年 H 市委推进多党合作事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H 市政府工作报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案情况及重点提案办理情况等材料;三是召开调研座谈会等。H 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统战历史渊源深厚,多党合作历史悠久,产生了多位民主党派早期领导人,以 H 市为分析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目前,H 市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 7 个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台盟成立了支部。截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H 市有民主党派成员 2 600 多人,基层组织 112 个;无党派人士经认定可参加知识分子联谊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H 市委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及时传达中共中央及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和方针政策,有针对性地组织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各类学习教育和培训,持续深化政治认同。二是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加强人才政治吸纳,推荐政治可靠、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好和具

有较高素质和较强能力的人员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推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纪检、司法等部门的特邀纪检监察员、行风评议员、人民陪审员等,履行民主党派职能。三是重视开展政党协商。H 市委每年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暑期座谈会,通报经济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深入调研、资政建言,开展社会服务,助力民生改善。

同时,党外人士普遍认可多党合作的功能和作用。在对 H 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展的专题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包括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人员等 156 人,在 684 位受访者中约占 22.8%。从基数和构成看,他们是当地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反映的情况具有代表性。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功能,84.06%的受访者选择“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普遍了解目前党外人士政治参与的方式包含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部门实职,参加协商活动、党派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以及通过网络新媒体发表意见等。关于“对目前党外人士政治参与程度的总体看法”,选择“参与充分”的 117 人,选择“比较充分”的 339 人,共占 66.67%。可见,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我国政治制度框架下党外人士政治参与程度比较充分。对于多党合作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684 位受访者中,认为多党合作在扩大政治参与、优化政府决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作用的占比均超过 73%。

## 二、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制度目标

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党合作的具体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始终围绕团结和发展展开。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多党合作共同目标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多党合作的共同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多党合作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多党合作的共同目标。《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sup>[7]</sup>。习近平对这一制度优势的阐述,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一是利益代表维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利益代表的广泛性,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超越了政党组织与利益集团、特殊阶层传统意义上的内在关联。二是社会整合维度。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合作、协商机制,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共同目标而奋斗,克服了政党政治中的恶性竞争与施政低效。三是政治参与维度。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了参与无序和否决政治。这是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三者有机结合所造就的多党合作制度特色和优势。

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制度目标有人民民主、社会整合、国家治理三大指向:通过统一战线实现各政党组织和政治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为实现共同目标凝心聚力;通过协商民主方式,引导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着眼治理现代化要求,形成各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 (一)政治协商,彰显人民民主

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多党合作制度以其独特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多党合作制度主要以协商民主形式运行,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传统和长期政治实践基础。政治协商作为比较成熟的政治参与形式已嵌入中国政治体系运行过程当中,在实践中展现了明显的增量轨迹,是具有中国民主特色的标识性概念。2022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提出了政治协商的两种形式:政党协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这正是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主要协商方式。多党合作制度运行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在性质上都属

于协商民主的范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制度化渠道,满足各方面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要求。要把政治协商活动作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中的重要环节,把政治协商成果转化为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不可替代的重要依据。协商的目标不限于此,政治协商本身是一个理念,是一个过程。围绕公共问题,通过平等对话,交换意见,表达诉求,形成共识,不仅对培育公民有序表达、包容的公共意识以及提高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有积极意义,而且协商讨论中政治信息的传播,有助于公众接受、学习和内化政治信念和价值规范,增进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 (二)团结合作,促进社会整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党的统一战线有着紧密的关联性,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多党合作的中心一元和结构多元特征与统一战线同心圆结构特征有着极强的相似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致力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结果。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条件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制度不可能是竞争性的,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有效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吸纳政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主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增进政治共识,以共同目标引导多样性。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扩大各政党组织对各界代表人士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社会群体的吸纳能力,增强多党合作的包容性,有效整合社会,形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

#### (三)议政建言,提升治理能力

从我国治国理政实践看,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主

体格局,围绕国家和社会治理搭建民主协商、合作共治的制度平台,保障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秩序与效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参与、合作共治等价值,以独特的政党治理逻辑丰富了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主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此,多党合作的发展更强调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国家治理的关键在决策。在协商民主与合作治理的实践中,遵循政治共识和价值导向,将各方面利益诉求有效吸纳进政策议程,成为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根本作用。在推动多党合作服务国家治理的进程中,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规范政党协商,严格执行协商程序,营造良好的协商环境。要健全知情明政机制,定期召开专题通报会、情况报告会,加强对民主党派调研考察的保障力度,支持民主党派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进一步发挥好多党合作的合作优势与整合功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不是直接决策者,但作为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主体,他们涵盖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界别,能够综合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汇聚了大批专家学者,能从协商、参与角度扩展国家治理能力的外延,从建言、监督角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民主党派和党派成员通过社情民意信息、提案、书面意见和议案、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形式参政建言和表达利益诉求,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集中体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公共决策影响力。一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直接开展协商,广泛收集的意见、建议,对重大方针政策进行修改、完善;二是民主党派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提案或政策建议,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这些活动的主要价值在于将问题输入政策议程,为优化政策方案提供

参考,发挥政策咨询作用。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畅通意见表达的重要渠道。比如,政协协商中的提案、信息、建议等工作的参与范围广,其中比较容易衡量成效的是提案工作。提案是政协委员和参加政协的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政协专门委员会,向政协全体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的、经提案审查委员会或者提案委员会审查立案后,交承办单位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虽然这些意见和建议不是必须采纳和执行的决议,但政协提案必须按照相关制度办理,保证件件有答复,凡事有交代。目前提案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对党委政府重要决策,发挥政策咨询作用;对社会各项建设,发挥推进补充完善作用;对关系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发挥利益表达和信息反馈作用;对社会利益矛盾问题,发挥协调关系作用。提案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的一种最直接、最有成效的方式。

### 三、地方治理视角中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分析

制度效能可以理解为制度在落实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及对其产生的效益、效果的客观评价。从推进治理现代化视角来分析,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创造政治共识和提供智力支持。在多党合作制度框架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影响公共政策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其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活动主要体现在调研考察、提案工作、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等,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其参政议政过程具体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 (一)党派提案更加注重质量

政协提案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过程的重要形式。从 H 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提案目录看,2018—2023 年提案件数和集体提案件数明显下降,呈现更加注重质量的趋势。在调研中收集到 H 市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联谊会近年的提案情况(不完全统计),2018、2019、2020、2021、2022、2023 年提案数量分别为 238、143、106、67、59、73 件,提案“注重质量、不比数量”的新要求得到

较好落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发展更加重视健全制度和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着眼于提高制度效能,将“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转向“做出成效”。以九三学社 H 市委会为例,2018 年提案达 135 件,2021、2022 年提案数量虽减少为 15 件、10 件,但从问题提出到对策建议,对提案质量的要求更高了。近年民革和九三学社均有多个提案被市领导重点督办。这些优秀提案呈现出如下突出特点:一是全面性,紧扣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着力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政府决策服务;二是问题意识强,基于对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持续研究,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及时发现有价值的选题;三是可行性,提案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既提出问题,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提案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紧扣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反映群众切身利益,成为重点督办提案,取得较好效果。

## (二)推动公共问题成为政策议题

社会公共问题要成为政策议题,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该问题已经被社会大多人所感知和察觉;二是该问题使人们感到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需求;三是该问题必须由有关政府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加以解决。”<sup>[8]</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有效政治参与,从提案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提案反映的问题及建议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有望得到解决。具体来说,一是表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提案获得立案,得到政府职能部门的答复和社会关注;二是成为重点提案、领导督办提案,进入政策议程并推动问题解决。提案工作是党外人士影响公共政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提案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使社会关注的“问题”成为公共政策的“议题”。

对地方治理中的政策议题,一般可以通过诸如政府工作报告、规范性政策文件、重要会议、领导相关批示等进行观察分析。2018—2023 年 H 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从宏观上展示了政府工作重点以及政策注意力变化情况(见表 1)。

表 1 2018—2023 年 H 市政府重点工作一览表

年份	政府重点工作
2018	十个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体制改革、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风险隐患排查、社会民生事业、政府自身建设。
2019	七个方面:打造“2+1”产业集群、建设高水平开放创新平台、建设现代化品质城市、厚植城市生态优势、乡村振兴、惠民之州品牌建设、引领发展的战略性战役性改革。
2020	八个方面: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建设大湾区能源科技创新中心、构建“丰字”开放交通体系、提升现代化城市品质、乡村振兴、筑牢绿色生态优势、发展成果惠及于民、“营商环境改善年”。
2021	八个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产业集群、新型城市建设新动力、建设“丰字”交通体系、构建现代城市特质、城市发展韧性、乡村振兴、提升群众幸福感。
2022	八大提升工程:产业竞争力提升工程、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交通互联互通提升工程、城市现代品质提升工程、兴村惠农提升工程、惠民之州品牌提升工程、平安惠州提升工程、惠企便民提升工程。
2023	九个方面:坚持制造业当家、扩大内需战略、科教兴市战略、推动湾区协同发展、推动城乡区域协调、打造优美花园城市、擦亮惠民之州品牌、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从 2018—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看,H 市政府这五年的工作重点是比较清晰的,既有一以贯之的问题,如产业结构、新型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优势、民生实事等,也有体现贯彻国家和地方发展部署而提出的新理念、新规划,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集群打造、大湾区建设、科技创新、建设开放型交通体系、改善营商环境等。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多党合作的重要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民主党派围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形成意见建议,并以各种渠道输入决策层,最终的目的是期待这些意见建议能被关注、被采纳。”<sup>[9]</sup>民主党派调研选题的来源,包括政府当前中心工作、长期关注领域问题、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调研中发现的新情况等。每年的提案中有不少因视角独到、建议可行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关注,其中的重点提案、督办提案成为政策议题的概率高,是成功推动公共问题进入议程的代表。2018—2023 年期间 H 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重点督办提案,主要是集体提案(也有委员提案)。集体提案作为一年调研成果的总结提炼与升华,往往代表着民主党派参政

议政成果的精华,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能重要的方式之一。这些提案内容紧扣政府重点工作,大多体现党派特色,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见表 2)。

表 2 2018—2023 年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交的提案被 H 市政协列为重点督办提案一览表

年份	党派	重点督办提案
2018	民革	率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民盟	科学治理河涌黑臭水体,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
	农工党	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推动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市建设
	致公党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九三学社	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助推我市开放型经济发展
2019	民革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民盟	关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东岸交通枢纽助推创建一流城市的建议
	农工党	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推动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市建设
	九三学社	关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建议
2020	民革	关于在我市公共场所设置自动除颤仪(AED)装备的建议
	民进	大力发展沉香产业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知联会	关于推动惠州新材料产业园区建设的建议
2021	民进	大力发展蜂蜜产业助力惠州乡村振兴
	民进	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解决年轻父母托育痛点问题(委员提案)
	农工党	关于构建“能级匹配”分层培训模式,提升养老护理员队伍整体素质的建议
	致公党	以数据产业园建设为契机,力促我市数据产业大发展(委员提案)
	九三学社	关于抢救“惠州革命老兵”红色声像资料文化资源的建议
2022	民革	关于加强小型水库运行管护的建议
	农工党	关于构建“能级匹配”分层培训模式,提升养老护理员队伍整体素质的建议
	九三学社	关于建设群众身边的“口袋公园”提高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的建议
2023	民盟	关于深化我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民建	关于支持惠州动漫产业做大做强的建议
	农工党	关于试点建设我市社区普惠托育服务中心的建议
	九三学社	关于加快我市“数智工匠”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建议

提案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从不同视角,发现并阐述公共问题,向党委政府表达意见主张和提出政策建议,影响政策议程设置,帮助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有效资源输入。提案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提案是否会促使某个问题成为公共政策的议程,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否在政府作公共决策时成为备选方案或参考。当然,参政议政过程本身的团结和民主价值也不应忽视。

### (三)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实施产生影响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对政策运行全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公共政策过程的根本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议程是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关键环节,是公共利益表达与整合的平台。有学者提出:“政策议程就是将政策问题纳入政治或政策机构进行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它提供了一条政策问题进入政策过程的渠道和一些需要给予考虑的事项。”<sup>[10]</sup>有的学者更直接明了地指出:“政策议程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组织尤其是党政机关确定政策问题的轻重缓急。”<sup>[11]</sup>

对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效政治参与或者说参政议政的影响力问题,最集中的体现是其意见建议“引起政府部门关注”和“对政策议题设置产生了影响”。在问卷调查中,选择这两项的受访者占 63%。(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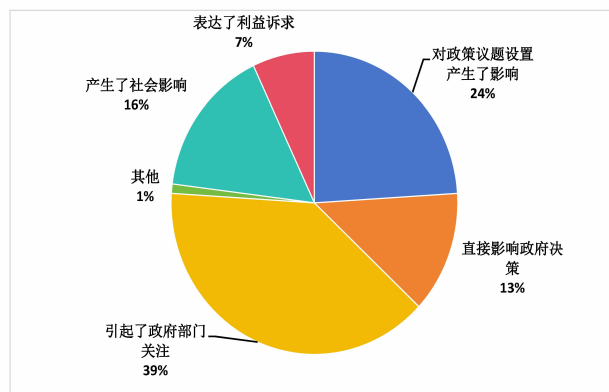


图 1 关于“有效政治参与的主要表现”问卷情况

在 H 市各民主党派提案中,2018 年民盟 H 市

委会提出的集体提案《科学治理河涌黑臭水体,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全面完成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和镇级河涌整治”的要求。该提案被 H 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列为重点提案,由副市长领衔督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市环保局、水务局、各县(区)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会办,推动 27 条黑臭水体河涌的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2 年 H 市政府部署“八大提升工程”,其中之一是“聚焦优美花园城市,实施城市现代品质提升工程”。围绕这一重点工作,2022 年九三学社 H 市委会提出的集体提案《关于建设群众身边的“口袋公园”提高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的建议》,由副市长领衔督办,市政园林事务中心主办,市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及所属区政府会办。根据重点提案办理工作要求,H 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印发实施《关于建设群众身边的“口袋公园”,提高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的建议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方案》,明确各承办单位的工作职责,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及筹措模式。提案的主要成效是推动中心城区“口袋公园”建设,目前已建成 5 个。这一提案的提出和办理体现了 H 市政府提出的“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化”的要求。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提案体现民主党派专业优势和对问题的长期关注,对政策议题设置有积极影响。《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推动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市建设》是 2018 年农工党 H 市委会的一项集体提案。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尚未突出这一议题,但提案内容符合地方特色并具有长远价值,一经提出便受到重视并由市政协主席督办、卫健部门主办,出台了《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推动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市建设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方案》,推动了 H 市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共建工作。2019 年 H 市政府工

作报告在重点工作“集中力量打造‘2+1’产业集群”中,明确提出“建设全省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目标。2019 年农工党 H 市委会继续提出的《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推动中医事业创新示范城市建设》,再次被列为重点提案。当然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节的有效性,即提案中的问题能否解决、提出的方案是否被采纳及其社会影响力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还涉及参政环境、资源供给、机制完善、特色发挥、能力提升、提案质量以及媒体助推等。

总体上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参与提供了保障,其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参政议政对政策的过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促进了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 四、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治理效能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各种渠道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助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不仅是政策制定科学性的需要,而且是整合消解派别政治、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sup>[12]</sup>在实践中,多党合作制度运行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体现在机制健全与能力建设两方面。一是多党合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在问卷调查中,回答“您就目前党外人士政治参与程度的总体感觉”一项时,虽然选择“参与充分”和“比较充分”的占 66.67%,但也不能忽视选择“不清楚”“参与不足”“缺少渠道”三个选项的仍占 33%。这说明多党合作为党外人士提供的参与平台和渠道还不够丰富,参与面不够广泛。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背景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要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广泛、真实的民主形式,并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积极影响,其发展和完善还有很大空间。二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需进一步提高。调研座谈中部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谈到目前参政议政仍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知情不充



分。对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不够了解,对政府工作实际运转情况、未来规划了解较少,以致只看到问题而难以提出高质量的建议。其二,选题不够精准。选题方向多,有些提案建议不清楚以前是否提过,各党派之间缺少统筹安排和沟通,容易出现选题找不准切口或重复提出等情况。三是调研不够深入。确定选题后一般仅能组织一至两次调研活动,存在调研不深入、不充分的情况。专业人才缺乏,对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四是文稿撰写不精。没有掌握提案、建议、社情民意撰写的方法和要求,成果文本不规范。这些问题影响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实效。

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广泛凝聚共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大有可为。”<sup>[13]</sup>这一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助力地方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具有统领性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sup>[14]</sup>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引领力、动员力和凝聚力,团结、联合各民主党派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有机统一,这决定了参政党建设既是民主党派自身的任务,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关于党外代表

人士队伍建设的章节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在优秀年轻干部队伍中统筹考虑党外干部”,“建立健全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在动议和讨论决定党外干部的任免、调动、交流前,应当征求统战部门的意见”<sup>[15]</sup>。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党外干部培养和使用政策。在党外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部门、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应以制度性的要求安排一定数量的党外干部,扩大其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引领、对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制度建设的支持,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的发展。民主党派自身建设除了宪法法律和基本政治制度保障外,还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地方党委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党内法规和政策性文件,需要进一步细化为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民主党派工作举措,积极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由统战部牵头组织开展党派联合调研,对于民主党派组织规模有限的城市尤其必要。这不仅是一种政治性的形象展示,还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精英汇集在一起,提升民主党派在社会公众、政府部门间的影响力,从而提升民主党派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

#### (二)提高民主党派组织化参与水平

一种民主制度运转能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政治意愿、素质和能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对其履职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突出政治引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要求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充分认识新时代参政党的使命、任务和要求,不断提高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秉持合作初心,勇担历史使命,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

政治参与组织化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能够通过制度机制将公众的意志输入政府系统中去,增加参与的

有效性。在秩序化的政治参与中,公民的合理利益表达能够更好地输入政治系统而影响公共政策。鉴于民主党派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并存的现状,各民主党派可从建立和完善参政议政工作机制入手,提高参政议政工作绩效。比如,H市政协通过民盟界别工作室,把民盟政协委员联系在一起,此外还通过与地方高校建立合作机制,整合盟内盟外力量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研究,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有的民主党派探索建立了参政议政工作机制:主委牵头组织——课题招标——联合调研——走访相关政府部门——推动调研成果转化。通过落实参政议政工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的组织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成为该党派提案工作规范、参与度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 (三)重视政治技术与参政方法

在充分认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价值、全面看待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成效的同时,也要重视政治技术、政治沟通对于提高参政议政效力的影响。社会问题复杂繁多,为什么有的问题亟需解决却迟迟提不上议程;为什么有的问题提出后未见落实,而有的问题一经提出便很快进入议程?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智库研究中有个“政策窗口”理论,是指“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方案得以进入决策议程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得到关注的机会”<sup>[16]</sup>。当政策方案、政策问题与政治紧迫性结合时,政策之窗才被打开。“政策窗口”开启的时间有时会比较短暂,需要特定条件,政策建议者要把握机会。一旦没能抓住时机,窗口关闭,又没有可行的备选方案等,即便是有价值的问题也可能从公众视野中淡化乃至消失。

调研发现,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参政议政技术层面的问题重视不足。在问及“提案、建议或其他议政建言获得采纳的重要条件”,684位受访者中选择“深入调研”的占35.96%,选择“社会广泛关注”的

占26.32%,新增“围绕中心工作”的占22.08%,而选择“提出时机恰当”的仅占5.56%。

智库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提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质量和效果。民主党派应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保持对公共问题的敏感性、敏锐观察力,对某些公共问题保持长期关注并深入研究,备好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旦时机成熟,“政策窗口”开启,要及时提出并通过制度化途径推动政策建议进入决策议程,形成政策影响力。

### (四)提升民主党派的社会影响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支撑,体现了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党协商、议政建言、民主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不断拓展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平台载体,提升社会影响力,充分彰显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优势。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是参政党履行职能的一个重要平台。社会服务能增进民主党派成员对国情民情的了解,扩大民主党派的社会影响,从而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新时代新征程应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教育医疗服务、公益慈善事业开展社会服务,打造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品牌。在推进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深化同港澳台同胞的团结联谊。比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民主党派与港澳台的历史渊源深厚,民主党派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港澳台同胞沟通联系,在促进港澳台与内地的经济、教育、文化交流

与合作中发挥独特作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可围绕港澳台问题议政建言,对“一国两制”、港澳工作、两岸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大湾区发展等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需要适应新时代新征程的要求,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能力水平和社会影响力,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EB/OL].(2015-05-20)[2024-05-01].<https://news.12371.cn/2015/05/20/VIDE1432125002946373.shtml>.
- [2]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24-02-08(1).
- [3]李军刚.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三重维度:结构、机制和效能[J].学习与探索,2022(10).
- [4]周虎.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团结效能[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2).
- [5]钟世红.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生成机理与提升路径[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4).
- [6]杨爱珍,王俊华.政党制度研究的视角转移:基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和效能的讨论[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
-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10.
- [8]钱再见.论多维理论视角中的政策问题构建[J].学术界,2013(6).
- [9]李春生.民主党派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问题如何变成议程[J].观察与思考,2013(11).
- [10]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46.
- [1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2:66.

- [12]张惠康.参政党功能与落实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101.
- [1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9-11-02(1).
- [1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1).
- [15]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相关党内法规学习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60.
- [16][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55.

责任编辑:刘菊香

# “两个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

杨谨硕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科学运用、积极践行“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物和政治文明成果。从认识论看,“两个结合”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底蕴,汇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积淀,充实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哲学内蕴。从方法论看,“两个结合”内塑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为内核的重要原则。从实践论看,“两个结合”正确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政党理论新范式、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而言之,“两个结合”为诠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发逻辑提供新视野,有效回答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因何而来、凭何而立、向何而去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两个结合”;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5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44-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sup>①</sup>“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奋斗史中得出的经验性总结、规律性认识,不仅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既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要求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 75 周年之际,思考、审视、把握“两个结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意义,对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一、认识论:“两个结合”厚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意蕴

“两个结合”从文化、理论、哲学层面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的道理、学理和哲理,以强大的思想力量厚实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意蕴。

### (一)“两个结合”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底蕴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发展史。古老的治国理政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二者的结合对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在中国土壤中孕育了以“和合”文化、“大一统”思想、“公天下”思想等为文化底蕴的中

收稿日期:2024-06-03

作者简介:杨谨硕,女,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国新型政党制度。

一是“和合”文化孕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谐共生的政党关系。无论是《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强调的以和为贵、调和折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书》中“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所突出的和睦友善、天下一家的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包容共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彰显出“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追求。“和合”文化的处世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等思想相契合，在中国创造性地构建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塑造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政治气质和政治秉性。在长期的多党合作生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十六字方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二是“大一统”思想孕育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领导—合作”的政治秩序。“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宝贵政治遗产，自汉代儒家董仲舒之后成为显学，在中国人的血脉中形成“百代都行秦政法”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指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sup>[2]</sup>也就是说“大一统”思想融入了中华民族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既突出“一体”，又强调“多元”，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时至今日，“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文化支撑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大一统”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文化基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实现了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有机结合与深度融合。

三是“公天下”思想催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底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天下”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公天下”思想是中国人的精神渊源与文化根性。早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sup>[3]</sup>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多次题写“天下为公”，并将构建大同社会作为政治理想。基于“天下为公”的信仰追求，“公天下”思想又衍生出了以民为贵的民本取向，正如《孟子·离娄上》提到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sup>[4]</sup>。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之树上结出的硕果，但对于远在东方的中国人而言，它与自己的千年理想——天下大同是不谋而合的<sup>[5]</sup>。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思想，还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国际共产主义追求，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思想内在相通、精神相合。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亦是对“公天下”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时刻彰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立场。

(二)“两个结合”汇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积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精炼概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理论来源，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生成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多党合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蕴含丰富的学理。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努力争取与其他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协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多党合作思想，指出为了壮大力量，“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sup>[6]</sup>，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待其他民主政党的基本态度。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处理政党关系要掌握领导权、保持独立性。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和其他政党采取一致行动时，“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sup>[7]</sup>。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自身的阶级属性和先进性质决定了无

产阶级革命政党在与其他政党的联盟中必须坚持自身的领导权，这也是处理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其他政党关系的本质要求与根本保证。三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处理政党关系。列宁指出：“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sup>[9]</sup>在此，列宁强调了处理政党关系要寻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之间平衡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对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参政党”概念，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为正确认识我国政党制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显著特征，即“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概括了我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准则、具体形式，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不断推动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超越了以往西方传统的政党分类体系，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sup>[9]</sup>，是马克思主义多党合作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两个结合”充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哲学内蕴

“两个结合”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意蕴，在政治文明领域结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丰硕理论成果。

其一，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两个结合”建立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辩证关系上，其中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真理看作是矛

盾的普遍性，将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矛盾的特殊性。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普遍的理论，是从各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孕育而生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由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习近平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sup>[10]</sup>这句话充分阐明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作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政党制度的共性，赋有利益聚合、政治动员、政治社会化等基本功能，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此同时，作为政党制度的新范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是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党制度，体现出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决策实施的科学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等显著优势。

其二，体现了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科学认识，是对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观点的准确把握。一方面，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党的一百多年奋斗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复兴中国。另一方面，普遍联系引起事物的运动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中国化时代

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 75 年来的多党合作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两个结合”的生动历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事物之间，即中国的政党制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各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即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相互影响的结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两个结合”为内在逻辑和根本遵循，推动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实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 二、方法论：“两个结合”内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sup>[1]</sup>。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协商民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独特优势，也是“两个结合”方法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领域的重要成果。

### （一）坚持党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阶级斗争、人类解放中的领导地位。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普遍经历的先有国家政权后有现代政党的建设路径不同，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先有政党再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起到定海神针与中心支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多党合作事业的前提基础和根本保证。面对中国近代以后一盘散沙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勇担政治责任，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合作实践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政党关系。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郑重选择与必然选择。作为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带领全国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主心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与

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其领导关系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领导。具体到领导方式的实现层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各民主党派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二是照顾同盟者的政治、经济、精神利益，帮助同盟者排忧解难，深化多党合作事业的广度和深度；三是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各民主党派虽然是各有其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但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目标、政治追求、政治使命方面高度契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历史经验也证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的政治秩序范式，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政治共识，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向前发展。

### （二）坚持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恩格斯处理政党关系思想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统一战线”概念最早由恩格斯在《唯物论和虔诚主义》中提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sup>[10]</sup>。随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使用“团结”“同盟”“联合”等术语来阐述统一战线思想，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争取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胜利的过程中要团结包括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指出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我国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相结合，相继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作为历史经验的总结，统一战线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利益整合的强大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2021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2015）施行经验的基础上，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定位，规范了民主党派履职程序等。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一战线从“重要法宝”提升为“强大法宝”，昭示着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特色与政治优势，凝聚起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正如习近平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sup>[10]</sup>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统战工作的首要原则和最根本的问题。

### （三）坚持协商民主

从理论起源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但中国的协商民主并非是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依样画瓢，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着生动的实践，如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等。此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协商民主进行直接论述，但其民主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协商民主观点。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的精神本意和真实内涵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协商民主，“商量政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实践探索出的民主实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路径。

中国有着长期而丰富的协商民主治理实践，对协商民主的实践形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七大渠道，即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构建起内容全面、层次多样、形式完整的协商治理体系。其中，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极为重要的协商渠道和运行机制。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专门协商机构，形成了多方参与治理的政治格局，成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平台，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推动了民主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直接进行民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主要表现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重大决策前和决策实施

之中，通过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形式征求、听取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各党派领导人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展开政治协商并形成共识。可以说，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全过程。

### 三、实践论：“两个结合”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路径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sup>[12]</sup>可以说，“两个结合”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实践指向，引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制度。

#### （一）面向现代化：“两个结合”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外生性、后发性，面对“西方模式”被“神圣化、绝对化”的不利环境，“两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发展之间搭建起桥梁，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指明现代化并非西方的独有专利和唯一形式，在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作用。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指出：“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sup>[13]</sup>这就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命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需求，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向心力和凝聚力”<sup>[14]</sup>，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治制度保障。具体而言，在政党与国家



关系方面，有别于西方先有国家政权后有现代政党的经验模式。中国是先有现代政党后有国家政权，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各民主党派顽强拼搏，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了团结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在政党与社会关系方面，面对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各阶层人民具体利益的多样性之间的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了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政党与政党关系方面，与西方以政治倾轧为特征的竞争性政党关系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基于协商成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和荣辱与共的历史记忆，以合作共赢为基本价值取向，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通力合作、相辅相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强大合力。

（二）面向世界：“两个结合”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政党理论新范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兼具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不论是《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价值取向，都深度突显出“世界性”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特质，同时闪耀着“两个结合”的理论光芒。在这一内生动力的驱动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应运而生，成为政党制度新的理论范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在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大潮中积极学习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由于西方在政党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首创性，目前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仍面临一定的话语困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是对西方政党理论的突围，打破了政党制度的刻板印象，并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产生新的鲜明特质和理论优势。首先，从价值维度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点，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其

次，从目标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继承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在实践中凝聚起国家治理的“实质性共识”，熔铸成“政党命运共同体”，充分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最后，从内涵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中国式商量”提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有效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三）面向未来：“两个结合”指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鲜明标识之一。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但近代中国文明蒙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深厚根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浸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国国情、文化、历史独特性的深刻认识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与此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制度载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政治制度文明领域的重要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各政党致力于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建设者、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实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共同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一方面，在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制定和执行之前，中国共产党积极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下转第106页）

#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及时代价值

刘迎春, 黄辉

(郑州大学,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基于特定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而生成,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从生成逻辑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观点,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作了科学论述。从理论内涵上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根本要求是坚持“两个结合”,基本路径是“三个坚持”,并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从时代价值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武器,也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6

[中图分类号]D6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5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启新篇章,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在党的工作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

##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 (一)理论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又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推动新时代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和成就。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的解放思想学说,批判性地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并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

收稿日期:2024-03-09

作者简介:刘迎春,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黄辉,男,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sup>[1]</sup>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其本质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由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阐明了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即“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sup>[2]</sup>。上层建筑各组成部分以经济发展为发展基础,同时它们本身也互相作用并深刻影响经济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文化的基本特质。马克思主义指出,文化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和继承性等特点。文化是在特定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与特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民族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相关联,必然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另外,文化总是反映其代表的阶级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3]</sup>统治阶级不仅统治着社会物质生产,同时支配着社会精神生产资料,使无产阶级的思想也隶属自己。同时,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相联系,是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反映,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尽管时代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同步的,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这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探析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从来将事物看作一成不变的,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用发展、辩证的眼光进行探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亦是如此,它用历史 and 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认为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因而一个民族不能抛开本民族的历史进行文化建设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sup>[4]</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基本遵循,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不

断推陈出新,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出我国在文化建设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 (二)历史逻辑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光辉发展历程,在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思想文化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尽管不同时期的关注重点和具体任务各有侧重,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和当时实践相结合,以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文化建设工作。同时,始终将人民置于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结合实际,面向人民,建设符合人民期望、满足人民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阐明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基本内涵。毛泽东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sup>[5]</sup><sup>[105]</sup>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注重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使知识阶级也能参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sup>[6]</sup>。随着革命进程的不断深入,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也愈加深刻。在正确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指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民族的”即要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科学的”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结合革命实际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即所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要具有人民性,面向大众、服务人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提升文化建设的科学性,使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和深入。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建设上,毛泽东提出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针”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指出要实行“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sup>[7]</sup>,始终坚持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对“双百方针”作了进一步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sup>[5158]</sup>该时期对文化建设的探索虽然历经波折,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人民至上的立场,推动文化建设事业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接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事业,将文化建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sup>[8]</sup>,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迈向新的台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吸收党在不同时期文化建设的经验,融古贯今,结合实际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 (三)实践逻辑

思想文化作为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不仅受生产实践的影响和制约,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生产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形成的,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相关实践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放眼全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互联网、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文化进一步加强交流,同时国家冲突、地缘政治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也不断冲击着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着眼国内,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文化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内容,其发展也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sup>[932]</sup>,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

文化影响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sup>[10]</sup>,对思想文化理解进一步深化。同时,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等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布局,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1123]</sup>,坚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sup>[9315]</sup>。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领域出现的新挑战、新任务、新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方法,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总结文化建设现实经验,凝结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结晶。

##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

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基本原则,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 (一)“两个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两个结合”,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sup>[12]</sup>,并对“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进行了阐释。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党始终将“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原则,并取得一系列光辉成就。“第二个结合”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崭新境界。结合的前提是契合,习近平强调指出:“‘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sup>[12]</sup>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动了新时代文化建设。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排列组合或内容上的生搬硬套,而是二者在指向一致的基础上,本质上的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彼此成就,实现对自身的超越,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sup>[12]</sup>。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提供强大动力机制,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人民的高度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资源宝库。“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sup>[12]</sup>“第一个结合”是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贯实践路径,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第二个结合”是党在深入理解和深刻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蕴下,所彰显出的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文化兴则国运兴。”<sup>[13]</sup>在党的百余年发展和变革的进程中,始终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根铸魂的作用,“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sup>[14]</sup>。

## (二)三个坚持: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sup>[14]</sup>。“三个坚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文化“为什么人发展、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方向以及基本路径。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将“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文化建设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彰显出人民性和主体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坚持文化建设的人民性就是要坚持以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实现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挥文化育人、化人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并赋予了“双百方针”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仅为当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理论指导,并且进一步指明了世界变局下对待世界其他文化的方法态度,即坚持中华文明的民族性和开放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沃土滋养中发展起来的,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平等对待其他文明,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坚决摒弃“文明冲突论”“文化中心论”等文化霸权行径。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sup>[15]</sup>守正彰显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定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则反映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现实的把握和理解,实现历史经验、现实实践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不断推陈出新,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提供不竭动力。

### (三)时代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sup>[14]</sup>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着五千年的光辉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和平性的突出特点。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下,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开拓创新,以“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奋勇前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推进建设文化强国伟大事业不断拓展,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断向前。

同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举措。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华文明一方面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提升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外来文明,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另一方面,在兼收并蓄的同时不能忘本,本固方丰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和平性的有机统一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在新时代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是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文化激荡变革中站稳脚跟的重要保障。

###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刻总结新时代党领导和依靠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现实经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实现了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并对文化布局作出系统部署,体用贯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与重大价值,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实践层面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针对文化体系建设,提出了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系统全面地推动文

化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与具体部署。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sup>[16]</sup>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文化领域的映射和体现,具有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等特点。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领域实践的基本遵循,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理论性与实践性、党性与人民性、历史性与发展性的有机统一。

202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作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高度评价。在中国传统释义中,“体”指形体、实体,“用”是方法、手段。“体用贯通”,体现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理论为实践服务,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具体实践,对文化建设工作作出系统规划和部署,并在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等领域达成一系列新成就,中华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总结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经验,提出坚持“两个结合”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sup>[17]</sup>,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彰显,也是人民性的体现。习近平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sup>[18][54]</sup>因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坚持党性的本质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内涵。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sup>[12]</sup>五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历史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续向前发展提供源源动力和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和丰富。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重视文化传承,同时强调开拓创新,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具体实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谋篇布局,在坚持历史连续性的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发展创新,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开创新局。

## (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思想武器

文化兴盛是国家民族强盛的支撑,中华文化繁荣发展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sup>[19]</sup>。文化兴衰事关国运,文化繁荣是国家昌盛的基石。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石,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结晶,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

从国内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增强文化主体意识、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建设上谋篇布局,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并发表意义重大的讲话,对文化建设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和全局谋划。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从全局来看,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体要求,并指明了“两个结合”“两创方针”等具体路径;从各领域来讲,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在宣传思想工作文化工作上提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中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sup>[20]</sup>,在信息化建设上提出要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建设”<sup>[19]305</sup>,等

等。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倡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融合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文化、思想、社科及舆论等各个领域,打造了一个从容自信的文化主体。

从国际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将“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2035年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了重要任务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sup>[11]44</sup>。在世界文明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化为核心和基础的“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路径,构建中国式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开辟的崭新局面。

## (三)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使不同文明自身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品格,并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为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平共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力抨击了西方世界关于文明的歪曲观点,强调平等和尊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反映在文化发展和文明交流领域,则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国文明、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在处理世界多元文明共存的问题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秉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平精神,以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文化胸怀,强调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历史,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sup>[18]259</sup>。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歪曲理论进行了明确批驳,为营造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氛围贡献了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新道路,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了具

体实施路径和典型范式。“一带一路”、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在各国之间建立起跨文化交流机制,有力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自身强大的创新创造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宏伟蓝图,展现了一个从容自信的大国文化格局。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8.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4.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4.
-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62.
-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0]习近平.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40.
-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12]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13]中共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165.
- [14]张晓松,林晖,杜尚泽,等.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纪实[N].人民日报,2023-06-05(1).
-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22(11).
- [1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9.
- [17]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9]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人民日报,2013-11-29(1).
- [20]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J].紫光阁,2018(9).

责任编辑:许立坤



# 内涵·理路·特征: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代命题探赜

王孔佳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邓小平吸收借鉴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 and 实践中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化之路。他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并对蕴含其中之基本内涵、前进理路和重要特征作出了科学阐释和规划,厘清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项关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新时代新征程,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构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内涵;理路;特征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7

[中图分类号]A849;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57-09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站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理解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进一步明晰其中关于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坚守现代化发展方向、及时调整前进步骤的时代价值,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出场逻辑与基本内涵

邓小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借鉴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情,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并不断丰富其理论内涵,正确回答了“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这一时代之问。

###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方向,其实现路径可以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范式。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价值增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24-05-05

作者简介:王孔佳,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全面性的超越。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使马克思晚年超越了以“纯粹形式”来考察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方法,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可能性”形成了新的认识。他否定了“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思路<sup>[2]</sup>,肯定了落后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可能性存在<sup>[3]</sup>。这一认识从根本上破解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道路迷思,为我国开辟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2.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原则。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党的早期现代化建设思想,为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代命题的出场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一,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党在扫清反动残余、修复战争创伤的基础上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变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sup>[4]</sup>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内在要求了现代化建设要依照各国具体情况来规划实施,“中国式的现代化”必然要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貌。其三,坚持发展生产力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早期共产党人意识到革命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sup>[5]</sup>,而“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sup>[6]</sup>。因此,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党既始终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优先位置,又强调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人民群众对国家富强、生

活幸福的期盼更加强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推进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责任。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代命题是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实践逻辑表达,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的继承发扬。

##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历史逻辑

1.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党在领导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现代化事业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有机体,必须理清其中的重难点、优先点。1951年,毛泽东对现代化建设的优先性进行了探索。他认为:“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sup>[7]</sup><sup>[26]</sup>1953年,在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提出,工业化“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能够推动“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sup>[8]</sup><sup>[26]</sup>。可见,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包括了重工业、国防工业、农业和国防工业等方面,将工业化视为国防、农业、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现代化的基础准备,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作为中国现代化开启和发展的战略基点。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党基本实现了过渡时期的预定目标。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8]</sup><sup>[20]</sup>,形成了“三个现代化”的目标追求。1959年,党和国家进一步意识到国防对于现代化建设的不可或缺性。对此,毛泽东提出“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的论断<sup>[8]</sup><sup>[38]</sup>,并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使用“四个现代化”的提法。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sup>[9]</sup>自此,“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已基本达成共识,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指导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显著成就。

2.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党在长期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实

践中作出的必然选择。“四个现代化”是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理论总结,为后续现代化建设指明了重点和方向。同一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把握机遇,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革,现代化水平得到飞跃式提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情世情的急剧转变迫切需要中国重新审视自身发展方位,明确发展方向,调整发展战略。邓小平对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后,结合我国客观现实,重新对“四个现代化”进行思考和审视,坚定了加快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决心。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们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sup>[10]496</sup>两天以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命题。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sup>[10]497</sup>“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顺应了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具体国情,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快速发展的美好期盼,赋予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称谓。

### (三)“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基本内涵

1.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11]63</sup>他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12]3</sup>而对于什么是中国的具体实际和突出特点,邓小平用“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来精炼概括。“人口多”意味着中国式的现代化可以依靠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够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首创精神。同时,意味着人口体量巨大,许

多发展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党在全局上统筹协调。“底子薄”这一特点说明了,相较世界其他先发现代化国家在科学技术、工业基础、经济总量、文化生活上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仍处于落后地位,必须时刻重视这一客观差距,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考虑现阶段的实情,不能急于求成、大胆冒进。

邓小平赋予了“小康”概念新的时代内容,用“小康”来进一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使现代化进程更加真切和务实。“小康”出自《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表达了中华先辈对安宁生活的向往。1979年,邓小平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含义时,用1000美金的人均收入作为指标量化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水平。他认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sup>[12]61</sup>后来,他又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将1000美元调整到800美元,使小康之家成为更容易达到的目标,激励人民大步迈进;指出小康水平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阶段目标,此后还要继续奋斗,逐步达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经此,“小康”这个独具民族特色的语言概念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密切联系,衍生出“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话语表达,使中国式现代化因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而深入人心。

2.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sup>[13]1075</sup>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根本的性质和方向,这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党领导的现代化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经常讲四个现代化,往往容易忽略了主语:社会主义。”<sup>[10]1035</sup>可见,邓小平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根本规

范,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迫切需要对此问题予以明确回答。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12]373</sup>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条件和目的,明确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的。邓小平高度重视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强调生产力发展“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sup>[11]311</sup>,而共同富裕作为结果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sup>[12]64</sup>。邓小平的回答廓清了人们的思想迷雾,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为推进现代化事业明晰了前进方向。“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依据当时现代化建设实际,充分对比当时中西方经济发展差距而得出的现实结论,为现代化之路定下了“适合中国情况”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规范。

##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前进理路

邓小平基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洞察,围绕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和步骤安排,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谋划了进程单。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背景下,邓小平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廓清了改革领域的疑虑和误区,回答了“发展为了什么”这一价值问题。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前进道路提供科学定位

邓小平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与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是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但对于第一阶段的历史进程将会面临几个发展时期并未详细说明。列宁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并指出社会主义

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考察,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sup>[7]336</sup>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阶段划分的思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sup>[12]252</sup>这一论述既肯定了我国现代化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偏,又指明了当时处于初级的、不发达的阶段,还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党制定基本路线提供了明确的历史方位。

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将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的观点,并首次概括出“四项基本原则”。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sup>[12]248</sup>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并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话语科学概括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之后的讲话中又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精炼概括,并指出“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sup>[12]345</sup>。至此,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完全形成,并随着现代化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科学方位和前进路线。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为前进道路提供步骤安排

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二者皆是以实现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阶段性过程,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的论和发展过程论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精神意蕴。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与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谈话时完整地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sup>[12]226</sup>“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每一步既包含了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又奠定了开启下一阶段的物质基础;既在坚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指明了国民生产总值目标,又彰显了对个人收入和经济生活的合理关切,是一个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过程。

“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开辟了一条从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了更为明晰的历史进程单,激发了人民群众向着下一阶段大步迈进和改善生活质量的主动性,让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有了更为切实的实施步骤。

(三)“三个有利于”为现代化过程中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提供判断标准

1.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20世纪中叶,第三次科技革命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并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地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sup>[11]87</sup>1978年,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论断<sup>[11]86</sup>。1988年,邓小平在考量了改革开放十年中科学技术巨大的推动作用后,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sup>[12]274</sup>,明确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为知识分子参与科技创新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包

括重视改革不合时宜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恢复和完善高考制度,明确将“德才兼备”“选贤任能”作为官员选拔和晋升标准;强调发展自然科学,积极通过商业和外交手段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作出“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重要论断<sup>[11]86</sup>,让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平等参与现代化建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增强。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sup>[11]250</sup>他所描述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领域,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sup>[12]194</sup>,要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抓手和必然要求。在政治领域,他认为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sup>[11]336</sup>。“文明”就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sup>[11]367</sup>他把先进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作为推动政治经济发展的思想武器,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可见,邓小平所设计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是一个内在联系、密切统一的综合体。

3.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4]</sup>。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将国民

生产总值和群众生活水平作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指标,实现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价值回归。同时,邓小平重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改善和创造美好生活的社会实践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源泉。譬如,改革开放后,有些人片面照搬马克思的文本,将雇工超过8人的个体户划为资本家范畴予以抵制,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坚持“不争论”原则,使民营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快速发展,极大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

事实证明,“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势,厘清了许多发展中的复杂关系,理顺了姓“资”还是姓“社”这一争论的认识误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衡量标准。

### 三、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

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所指明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应有之义,体现了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sup>[12]111</sup>这一论述阐明了共同富裕与分配制度的重要关系:一是要通过生产力快速发展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满足,这是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二是要建立健全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确保每个劳动者都能平等分享生产资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统筹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经济制度保障,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邓小平为实现共同富裕明确了工作方法,阐释了党在其中的关键责任。一方面,邓小平提出先富帮后富发展策略,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sup>[12]152</sup>;强调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联系,先富和后富是时间上的先后,“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sup>[12]155</sup>。另一方面,党发挥着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他把党的领导作为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关

键。在这项工作中,党要允许、鼓励一部分人在富裕之路上领跑,促使他们在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同时推动国家发展全局进步。站在全局高度,党还要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让后富群体平等共享发展成果。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生动诠释了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关键在党,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 (二)物质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制度、理想信念的发展水平,而先进的上层建筑能够推动经济基础向前运动。奠定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创造出更丰富的社会财富。邓小平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sup>[12]250</sup>，“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建设物质文明”<sup>[12]28</sup>。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我国在物质文明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党和人民对物质文明的重要性形成基本共识。然而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相对滞后的情况,党风党纪、社会风气存在不少问题,阻碍了现代化建设进程。鉴于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sup>[12]144</sup>他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追求。同时,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动态前进、由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要综合采用各种手段措施来培养和维持。邓小平认为,教育和法律是维系精神文明健康发展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软一硬、软硬兼施,“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sup>[12]156</sup>。总之,邓小平及时洞察到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不协调的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推动了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 (三)和平稳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的建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邓小平在深刻洞察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邓小平指出:“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sup>[12]116-117</sup>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在确保外部环境处于和平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才能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将追求和平作为内政外交的基本目标,努力向世界展示一个包容、开放、和平的大国形象,与许多国家建立和恢复了友好外交关系。邓小平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sup>[13]112</sup>“不称霸”的宣言和践行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倡导者,这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必然会壮大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中国在探索现代化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也可以为世界其他谋求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sup>[14]112</sup>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大局的深入分析,为我国开启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必须争取的外部环境,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态度。

## 四、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构想的当代启示

### (一)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凝聚现代化发展伟力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形成一定的工作方法,其本质就是充分相信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清晰地阐明了如何发挥群众智慧、接受群众意见、形成正确决策的方法路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中国的具体化、应用化。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

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sup>[15]</sup>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意见和呼声,着力为把群众观点上升到党的决策层面扫清障碍,鼓励人民群众大胆实践。譬如,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农民自发探索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做法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粮食产量大幅增长,但也使部分人开始担忧此举是否会冲击集体经济的地位。邓小平认为要用实际成效来检验,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sup>[12]155</sup>。事实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但没有造成经济混乱,反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1982年,政府正式肯定了其“社会主义”性质,人民群众的探索成果在顶层设计层面得到支持。邓小平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sup>[12]252</sup>，“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sup>[12]272</sup>。邓小平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和首创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策调整问题树立了解决范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牢牢把握党的群众路线,重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率先垂范开展调查研究。他强调:“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sup>[16]</sup>习近平关注的领域既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养老等人民群众最关切的核心利益层面,又囊括了审美、休闲、文化、体育等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层面,推动现代化建设“顺民意、得民心”,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收集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呼声树立了榜样。2019年11月,习近平在考察上海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重要概念。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了一条将群众意见、呼声传达至党和国家决策层的通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党尊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一次生动体现和重大进步。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统领着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持续发展,以完善的制度确保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落实,用科技创新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能够不断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为发挥群众智慧、凝聚人民力量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党鼓励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增强了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民主生活的自觉性,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群众中扎根,让人民群众首创精神自立自信地全面迸发。

(二)必须坚持“三个不动摇”,坚守现代化发展方向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sup>[17]</sup>。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之所以坚定前行在正确道路上,就是善于继承和总结历史经验,在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牢牢掌握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的思想精髓。

“三个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奋斗历程中提炼的宝贵经验。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sup>[12]369</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sup>[18]</sup>将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党在长期的现代化建设中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统一性的思想基础,减少了现代化事业中可能遇到的曲折和浪费,保障了党组织在实现自我更新过程中的团结和统一。第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领导保障。邓小平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sup>[11]266</sup>。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领导者和践行者,是维持社会民心稳定的最大压舱石。习近平强调:“党是

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sup>[19]</sup>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是确保现代化事业永葆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服务中国人民的理论根基。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sup>[20]</sup>中国式现代化要在“范式”或“类”的哲学层面上打破西方话语权,就要用自身独特的道路属性和发展成就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和平、能源安全、科学技术等方面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昭示了当代中国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对“现代化”的独特贡献。

(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及时完善现代化发展步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sup>[21]</sup>理论创新,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在思想上大胆创新、经济上大步迈进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理论成果,蕴含其中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需要不断继承传扬。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来看,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党的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纳入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突出位置,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可见,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其内涵随着实践的演进不断丰富。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骤规划来看,及时完善和调整前进步骤是一条以实事求是为哲学基础



的重要经验。邓小平指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sup>[12]113</sup>、“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sup>[12]267</sup>。这种及时调整和“台阶式”发展的思想被党作为重要经验继承下来,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这三个时间段的建设任务作出了部署,形成了“小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又对两个百年交汇期后30年发展规划进行了调整,把前15年的奋斗目标定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邓小平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刻洞察国情世情而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雄心壮志,又充分彰显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敢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风谲云诡的全球局势,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完善和调整现代化发展战略,增强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在认识上不断完善党的现代化理论体系,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理论篇章。

邓小平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代命题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理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坚定不移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57.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8.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63.
-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2.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53.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9]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5.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 [16]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43.
-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3.
-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6.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72.
- [2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7.
- [2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8.

责任编辑:何文钜

# 我国党外人才培养:特点、机理和规律(下)

——中国共产党党外人才工作研究系列之三

祝远娟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党外人才培养优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党外人才培养工作中,逐步构建了以共识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引领机制、以“五大能力”为重点的能力素质培养机制、以政策制度文件为主体的有效保障机制,并在实践中探索了思想政治引导贯穿党外人才工作始终、评价体系与发现培养选拔使用管理相配套、多渠道多层次多模式培养体系相辅相成、党内党外人才工作统筹协调配合等规律,推动新时代党外人才培养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外人才培养;机理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8

[中图分类号]D613;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66-11

党外人才的培养有自身的显著特点、独特机理,也必然要求构建一套相应的培养机制,探索符合党外人才培养的规律。为了培养一支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素质党外人才队伍,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党外人才培养制度机制,探索出了党外人才培养的规律。

## 一、党外人才培养机制构建分析

党外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依赖一整套相互协调配合的机制发生作用。党外人才培养机制主要包括以共识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引领机制、以“五种能力”为重点的能力素养培养机制、以政策制度文件为主体的有效保障机制等,以上机制互

相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 (一)以共识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引领机制

党外人才的培养,思想政治引领非常关键。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给被领导者以政治教育<sup>[1]</sup>。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牢牢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sup>[2]</sup>。党外人才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对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

习近平在2021年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对广大的党外人才提出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收稿日期:2024-05-08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课题(20XZZ010)。

作者简介:祝远娟,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非公有制经济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非公有制经济。

悟力、政治执行力,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的明确要求<sup>[3]</sup>。2022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增强各阶层各群体对党的向心力<sup>[4]</sup>。进一步明确了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引领要以共识教育为核心,形成完善的党外人才思想政治引领机制。

党外人士以共识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引领机制,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政治、价值观和事业引领机制以及思想动态分析引导机制等。

1.建立完善以共识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夯实党内党外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加强共识教育。共识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政治培训的要求,也是党外人士自身建设和成长的需求。周恩来认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sup>[5]</sup>。1953年,中共中央对全国高等学校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作出指示,全国高等学校教师的理论学习,不仅需要建立经常的学习制度,规定适当的学习内容,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还要学习时事政策、与业务相关的理论知识<sup>[6]</sup>。1954年中共中央明确对于科学家的“思想教育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的”<sup>[7]</sup>。为了有效开展对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以共识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明确了共识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主体、教育平台和教学保障等,这套机制包括政治理论培训制度、传达学习文件和学习制度、征求意见和情况通报制度、交友谈心 and 专访慰问制度等,其中政治理论培训制度是最重要的。

政治理论培训制度方面。2023年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统一战线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工作规划明确要根据党外干部的特点开展相应的政治理论教育<sup>[8]</sup>,统一战线成员的培训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培训首课主课、加强“六史”

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集中培训、网络培训等方式,加强对党外人才的政治理论培训,不断增进共识,引导他们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传达学习文件和学习制度方面。194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委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种相关文件要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sup>[9]</sup>。同时,中共中央多次安排领导干部向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作报告。由此,向党外人士传达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会议精神逐步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这使广大党外人才能及时了解党的创新理论、了解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部署,更好地凝聚起广大党外人才的智慧和力量。

征求意见和情况通报制度方面。在1942年3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提出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sup>[9]</sup>。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从提升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高度,在召开重大的会议和作出重要决策部署前,都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在会议和文件颁布后,均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

交友谈心制度。联谊交友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对广大党外人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制。200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要发挥联谊交友的引导作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党外代表人士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党的主张。

2.建立政治引领、价值观引领、事业引领机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各类人才的重要作用,在把一部分优秀人才吸纳入党内的同时注重通过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级人大、政协及统战团体、社会组织推荐优秀人才,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发挥作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指出知识分子要“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始终坚守正道、追求真理”<sup>[10]</sup>。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活动的通知》，以爱国奋斗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引导广大知识分子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在 2022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以凝聚共识为根本，以爱国奋斗为目的，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积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施展才华和抱负<sup>[46]</sup>。

3.构建思想动态分析引导机制。思想动态分析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党外人才范围领域层次广泛而复杂。加强党外人才培养，必须对各个群体的党外人才进行思想动态分析，建立分析引导机制。首先，建立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人士制度。通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定期与党外人才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政治动态。其次，建立统战部门周期性“双走访”制度。走访党外人才及其所在单位，及时了解党外人才各方面情况，及时做好总结和信息反馈。再次，对有困难的党外人才建立专访慰问制度，了解他们的需求。在及时了解党外人才思想动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思想政治引导的措施。此外，要加强对党外人才群体的特征、思想状况、价值取向以及培养需求等的调查研究。近年来，中央统战部聚焦党外人士各个群体，整合全国统战系统、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力量，积极开展对党外人士各个群体思想状况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台了针对不同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和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

(二)以“五大能力”为重点的能力素质培养机制  
对于党外人才的能力，除了普遍强调的业务能

力以外，中共中央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针对党外人士特别是党外代表人士从“四种能力”到“五种能力”的能力建设要求。为此，需要以“五大能力”为重点不断建立完善对党外人才的能力素质培养机制，并贯穿于发现储备、教育培养、选拔推荐和管理监督各个环节。

1.能力素质培养的主要内容。以提升政治把握能力为前提，以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为重点，以提升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为保障。首先，以提升政治把握能力为重要前提。对于党外人才而言，提升政治把握能力是他们身在党外，但能与党同心、共同团结奋斗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对党外人才政治把握能力的培养。其次，以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为重点。党外人才要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作用，除了发挥专业优势外，要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发挥他们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方面的作用，需要提升相应的能力素质。再次，以提升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为保障，培养党外人才积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能力水平。

2.建立和完善能力素质培养机制。能力素质培养有三方面主体：一是党外人才自身，二是以社会主义学院为主阵地的党外人才教育培训资源，三是各级党委、相关部门及用人单位。因此，需要三方面主体同向发力，相互协调配合，不断推动党外人才能力素质的培养提升(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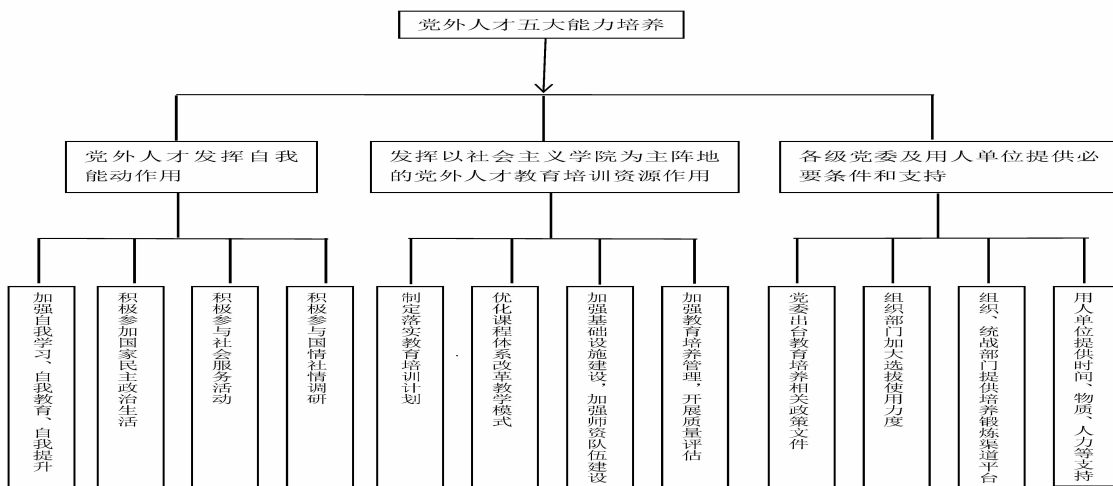


图 1 党外人才能力素质培养机制

第一,党外人才发挥自我能动作用,自觉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党外人才首先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自觉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了解世情、国情、党情,自觉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进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其次,要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各项活动,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提升各方面素质。再次,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加智力支边、智力下乡等社会服务活动;最后,要积极开展国情和社情的调查研究。

第二,发挥以社会主义学院为主阵地的党外人才教育培训资源作用。党外人才教育是社会主义学院的主责主业,必须制定落实各方面党外人才的教育培训计划,不断拓展党外人才教育培训的覆盖范围,合理设置培训班次,规范学制,积极开展分类分级培训;根据党外人才的组织培训需求、岗位培训需求和个人培训需求,规范完善课程体系,不断优化和更新教学内容,构建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布局。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根据党外学员的阶层多元、职业多元、需求多元、思想多元的实际,运用座谈、访谈、问卷等方式,及时掌握学员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确立不同群体的教学重点,探索更适合体制内外的党外人才培训需求和规律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各级社会主义学院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学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严格教育培训过程管理,开展教育培训质量评估。

第三,为党外人才能力素质培养提升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外人才队伍建设的研究,制定出台教育培训相关政策文件,为党外人才能力素质培养提供政策文件依据。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大对党外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推荐使用的力度,使更多的党外人才进入组织培养视野和范围;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要拓展培养锻炼的平台和渠道,支持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扩大培训规模,鼓励支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院校以及高等院校等加大对党外人才的培训,拓展各级党外人士实践锻炼基地,深化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有效提升党外人

才的能力素质。此外,各用人单位要为党外人才集中培训、挂职锻炼、社会服务、调查研究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条件支持。

### (三)以政策制度文件为主体的有效保障机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统战工作尤为重要<sup>[1]</sup>。协调关系要用政策,增进共识要用政策,安排人事要讲政策,联谊交友也要把政策贯穿始终。党外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具体的工作要求作为有效的保障。

1.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体系。关于党外人才的培养,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出台了不少的法律法规文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明确“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sup>[2]</sup>。2018年宪法修正案序言中明确统一战线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在总纲中明确了培养各类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发挥作用的要求,为党外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规划及统一战线教育培训方面的规划,对党外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开展统战工作、推进党外人才队伍建设中的职责,明确了党外代表人才培养的渠道载体和内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明确了社会主义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包括党外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明确了党外人才培训的范围、内容和形式等,是党外人才培养的主要党内法规,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遵循,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体系。

2.以覆盖各领域党外人才范围的政策文件为具体工作依据。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外人才的培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工作的意见》等，对党外人才的培养作了总体要求，针对各领域的党外人才工作作出具体的规定。从党外人才的类别来说，关于民主党派人才，2018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规划（2018—2027年）》，2023年出台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相关文件；关于党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2019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民族宗教界人才，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出台《宗教事务条例》，召开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明确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界人才的工作政策；关于民营经济领域人才，1995年出台《关于民营科技企业人员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2018年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20年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2023年出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工商联工作的意见》等；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才，2017年召开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下发了会议文件；关于港澳台和海外人才，中央也召开会议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地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从党外人才的行业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各行业的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文件相继出台，如《关于加强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统战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院所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受聘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统战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统战工作的意见》等。可以说，政策文件覆盖了各领域党外人才的培养，为做好广大党外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了工作依据。

3.明确工作机构人员、工作职责以及相应的工作机制。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了各方培养主体在党外人才培养工作中的职责。条例还从工作机构和人员编制等方面对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建设作出了规定。新时代，党明确了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工商联、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等在党外人才工作中的职责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统战部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战部，根据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拓展，相应设置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等工作部门。同时，为了更好地开展党外人才各项工作，从中央至地方，还相应建立了各种工作协调机构，如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等，并建立健全了党外知识分子联席会议制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制度、海外统战工作协调机制等工作机制，有效保障了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 二、党外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

习近平指出：“人才的培养、开发和使用是一门科学，我们要注重把握其客观性，避免片面性和随意性，注重在实践中认识和把握规律、遵循和使用规律。”<sup>[13]</sup>在建党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了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一般规律。

### （一）思想政治引导贯穿党外人才工作始终

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目的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要把党的理论政策主张有效地转化为党外人才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工作方针在原有的“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基础上拓展为“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体现了增加的思想政治引导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重要性。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新征程上，我

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sup>[14]</sup>,明确了在党外人才工作中要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加强思想政治引导要贯穿党外人才工作始终。

1.加强思想政治引导以确保人才工作的正确方向。如何保证人才效应的正向发挥?中国共产党给出了答案,即加强思想政治引导。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重视思想政治引导。毛泽东曾说过,“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sup>[15]</sup><sup>[35]</sup>,只有保证思想政治的正确性才能保证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他还提出:“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sup>[15]</sup><sup>[226]</sup>邓小平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了,要有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状态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我们共产党人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在思想上解决问题”<sup>[16]</sup>。江泽民提出,我们从事的事业是空前广大的,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政治必须合格,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具备所从事工作的专长<sup>[7]</sup>。胡锦涛指出:“人才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必须把促进人才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sup>[18]</sup>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sup>[9]</sup>。在党的一百多年奋斗历程中,党始终重视对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引导,并使其贯穿党外人才工作始终。新时代应遵循这一工作规律,加强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引导工作。

2.思想政治引导工作要做到党外人才各领域全过程全覆盖。“政治引导是统战工作的灵魂。”<sup>[20]</sup>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任务<sup>[43]</sup>。做好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做好思想政治引导工作,引导广大党外人才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凝聚和传递正能量。《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于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党外人才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在党外人才

的物色发现、教育培养、选拔使用和管理监督过程中,要坚持政治引领、价值观引领、事业引领,以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方向,引导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积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施展才华和抱负。要突出政治培训,积极开展主题教育,引导党外人才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要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日常工作之中,突出管理重点,及时准确了解党外人才的政治表现、思想状况、岗位履职情况和廉政表现,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引导,帮助党外人才增进政治共识,提高政治能力,树立党外人才的良好社会形象。对于党外人才中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和行动,要进行批评和教育。

3.对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引导要做到分类施策。党外人才群体既具有共性特征,又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开展对党外人才的思想政治引导不能搞一刀切、一个模板。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改善思想政治教育<sup>[21]</sup>。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现在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需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sup>[22]</sup>。要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结合不同群体的情况和特点精准施策,充分运用联谊交友、民主协商、照顾同盟者利益等统一战线的特殊方式方法,抓住党外人才中的重点人群,突破一点、带动一片。实践工作中,浙江省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方面,率先提出分众统战概念,细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各个群体,根据各个群体的特征进行分类和精准施策,总结出组织、引导、服务、培训四方面分类的“四分法”,提升了思想政治引导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二)评价体系与发现培养选拔使用管理相配套

人才的发现培养选拔使用管理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过程。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才,应该发现培养选拔使用管理什么的人才?如何衡量人才培养工作的成效质量?这些都涉及对人才的评价问题。党在不同时期,对党外人才有不同的评价标

准,并以此作为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鲜明导向、重要依据和衡量标准。

1.确立党外代表人士的标准作为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鲜明导向。党和国家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必须树立鲜明的导向。中国共产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在党外人才培养工作过程中,明确了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三项基本的标准,并把“政治坚定”这一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邓小平曾指出,“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要确定重用专家人才的政治标准,即能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sup>[23]</sup>。2010年2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明确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同心同德作为参政党人才队伍建设和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提供充足人才保证”<sup>[24]</sup>。《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大陆范围的党外代表人士和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的“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主要内涵。“政治坚定”方面,大陆范围的党外代表人士主要为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目标上和行动上保持同向一致;而港澳台海外代表人主要强调他们的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和行动<sup>[25]</sup><sup>811-812</sup>。“业绩突出”即在本领域本行业中造诣较深、贡献较大,主要明确的是党外代表人士在专业领域方面的能力水平和贡献。“群众认同”指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强调党外代表人士能够团结所联系的群众并用自己的言行起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党外代表人士标准的确立为广大党外人才的培养成长明确了方向,树立了标杆。

2.建立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为党外人才各个环节工作提供重要依据。综合评价是做好党外代表人士人选资格审查的重要关口,也是代表人士推荐使用与重要评选表彰的基础性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各地积极探索各领域党外人才的评价体系,为党外人才各个环节工作提供重要依据。2005年以

来,中央统战部开展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工作,从试点、全面试行到深入推动,使综合评价成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代表人士工作各个环节的重要依据,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做好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选拔、培养和政治安排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之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港澳台海外等各个方面的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办法也相应出台。为了更好地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建立党外代表人士的以政治素质、专业成就和群众基础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为选拔人才和推荐使用的客观依据和必经环节<sup>[25]</sup><sup>813</sup>。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党外人才各环节工作,各地积极探索具体的评价体系。如2015年,上海推行市管党外干部社会履职综合评价试点工作;2018年以来,广西统战部门对各领域、各层级党外代表人士的资格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3.健全完善的培养质量评估体系以衡量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与成效。邓小平指出:“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sup>[26]</sup>新时代党外人才的培养质量效果如何,需要有一套科学完善的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来衡量。在这方面,部分地方作了有益尝试,如甘肃省2017年起引进第三方评估,聘请科研院所和高校专家为专家组成员,从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学实效、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有效推动党外人才教育培训质量的提升。但从整体来看,当前衡量评估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突破。

### (三)多渠道、多层次、多模式培养相辅相成

习近平指出:“领导能力是要经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历练而成的。这是干部成长的规律,党内党外概莫能外。”<sup>[27]</sup>教育培训工作是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基础,“只有把培训工作做扎实了,选拔高层次党外人才才能水到渠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才能脱颖而出”<sup>[28]</sup><sup>183</sup>。统一战线有组织有计划地进



行人才培养,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学院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sup>[9]</sup>。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坚持将党外人才教育培养作为党外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环节,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对党外人才开展了有计划、分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培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已建立起一套多渠道、多层次、多模式相辅相成的培养锻炼体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有机结合。理论培训主要解决的是提升广大党外人才的政治能力、增进共识的问题,而实践锻炼有助于帮助党外人才丰富阅历、提升能力,弥补党外人才的行政管理和组织领导等能力的不足。习近平指出,事实证明,党外人士担任过实职后再到党派机关工作,各方面的能力会有很大提高<sup>[29]</sup>。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党外人才的培训以政治培训为主,要加强对党外人才的理论培训和实践锻炼。实践锻炼包括考察调研、社会服务、挂职锻炼等。广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组织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取得了积极成效,后逐步在全国推广。2011年首批全国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在上海、贵州、甘肃三省(直辖市)试点,一大批党外人才由组织安排到基地挂职锻炼。通过锻炼,党外人才的工作阅历、组织领导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目前,全国共有7个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开始建立各个层级的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此外,各地还推出交流任职、下挂锻炼、上挂锻炼、横向挂职、基地挂职、专题性挂职锻炼、项目挂职等实践锻炼方式,工作体系基本形成,规模效应初步显现。

2.组织培养与自我提升相统一。党外人才的成长“只有建立在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和自我觉悟之上,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sup>[30]</sup>。因此,在扩大组织培养范围和规模的同时,党也注重引导党外人才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中,形成了“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三自”方针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原则,是党对党外人才培养方法的重大创新,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

统。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发扬统一战线优良传统,鼓励支持广大党外人才自我教育、自我提升。1986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的通知中明确要协助民主党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自我教育<sup>[31]</sup>。1993年,在第18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瑞环指出,坚持“三自”“三不”的方针是搞好统一战线思想教育的关键所在<sup>[32]</sup>。另外,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支持党派内部开展对于成员的经常性培训。《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发挥党外代表人士所在党派和团体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通过组织培养与党外人才的自我教育提升,党外人才的培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注重利用主题教育、宣传表彰等其他培养方式。主题教育活动是人才培养锻炼的一个有效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统战系统及时跟进各个时期党中央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在统一战线领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学习宣传教育等。同时根据统一战线各领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如20世纪50年代起在各族群众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各民主党派中央20世纪90年代起持续开展政治交接主题教育活动等。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各领域主题教育广泛开展。如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统战部联合各部门相继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政治交接主题教育活动、“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活动;在统一战线相关领域开展“凝心铸魂强根基、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等;在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学党史、跟党走等主题教育;在宗教界开展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活动;2013年起在民营经济人士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持续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活动等。通过丰富多样的主题教育,广泛凝聚共识,提升党外人才素质。宣传党外人才的典型和先进人物,也是人才培养的有效载体。

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广泛宣传表彰爱国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才中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党委要把统一战线工作纳入宣传工作计划。对于党外人才的典型和先进人物的宣传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李维汉就向党中央建议,表彰党外人才中的先进生产者 and 先进工作者,以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sup>[33]</sup>。改革开放以来,在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十大杰出青年等评选活动中,涌现出一批知名度高、代表性强的优秀党外人才。党和国家除了大力宣传表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以外,还针对党外人才的各类群体,开展各类专项表彰。如1985年10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召开。2004年起,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单位联合开展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活动,至今已举办五届。2006年和2011年,中央统战部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了两次“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评选表彰活动”。2021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中共中央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贡献评选表彰大会。2022年举办了首届全国宗教界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对激励宗教界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统战部门还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暨关爱员工实现双赢等表彰活动。这些表彰激励活动,在党外人才领域产生了良好反响,党外人才深受鼓舞。

#### (四)党内党外人才工作统筹协调

人才成长靠个人努力,更靠组织培养。党外人才成长轨迹一般经过自我成长、纳入组织培养视野,加速成长几个阶段。因此,组织培养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sup>[34]</sup>。坚持党内党外人才工作统筹协调配合,是党的人才工作的经验,也是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一般规律。

1.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人才培养成长良好环境。党内党外人才,都是党的人才。人才工作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必须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党从提升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认识人才的重要作用,谋划人才战略布局,不断推动党的人才工作制度的健全完善。一方面,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是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管人才原则是在党管干部原则基础上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好各类人才,包括数量庞大的党外人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是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保证,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党管人才是党外代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原则,2012年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党管人才的专门文件明确了党管人才原则的落实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管人才原则在制度和工作机制、环境营造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形成了全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氛围和局面,地方各级党委也都成立相应的人才工作领导机构,形成了党管人才的大人才工作格局。另一方面,不断健全完善党的人才工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关于人才工作的制度相继颁布实施,人才改革系统集成能力不断提升。2021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第一次设专章对党的人才工作作出规定,明确了党管人才的体制机制。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23年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作出修订,形成了中国特色人才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在地方层面,2018年广西制定了《关于各领域各层级党外代表人士基本条件和基本资格的意见》,明确了党外代表人士的确认、培养、使用、管理四项制度;2021年河南省出台《加强党外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工作暂行办法》,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的专门针对党外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制度性文件,明确规定建立由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党外青年人才培养举荐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2.构建党内党外人才工作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加大对党外人才的组织培养力度。人才是党的重要工作,需要党内党外一起统筹协调,构建党内党外人

才工作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在第17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明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并提议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成立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有关部门参加,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统战部负责<sup>[35]</sup>。之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多次联合举办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领导人专题学习研究班,效果显著。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立,成员单位有20多个,积极出台全国人才工作和队伍建设的规划,开展政策研究,对全国的人才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协调党内外的人才工作。为了加强对统一战线各领域人才工作的统筹协调,2006年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体制。会议明确统战部与组织部要加强沟通以及与有关部门的会商,做好党外人才的培养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逐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多渠道推荐考察党外干部后备干部机制,与民主党派协商党外干部培养工作机制,严格监督及强化教育培训机制,定期召开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经验交流会或专题研讨会。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加大了党内党外人才工作的统筹协调力度。2021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对党外干部开展联合培养,共同举办党外干部专题培训班,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有关党外干部开展联合调训,联合开展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工作,共同选派党外干部赴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挂任省级政府部门或市级政府领导班子副职,推动党外干部围绕服务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和重点任务,到基层一线、吃劲岗位锻炼砥砺,进一步加大了组织培养力度,树立了积极示范导向。

3.坚持“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的政策,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涵养水源。坚持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有利于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一项政策,是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涵养水源<sup>[28][38]</sup>。与党内人才成长

规律不同,党外人才一般是成才后才纳入党外人才工作的视野。各级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统筹谋划,抓好源头合理分流,有意识地将一部分优秀的人才留在党外培养,对党外人才队伍按政治面貌、行业、领域等进行细分。要加强整体规划,注意留在党外的人才的代表性,保证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党外代表人士成长都有充足的“水源”。

### 结语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纳天下英才,培养造就了一支与党同心同德、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秀党外人才队伍,探索了规律,积累了经验,彰显了制度优势。党外人才是我国最大的人才队伍,党外人才培养是党外人才工作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要充分认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守正创新,遵循培养的机理和规律,推动党外人才培养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高质量的人才支撑。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2.
-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3(1).
- [3]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EB/OL].(2021-02-02)[2024-04-02].[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2/02/c\\_139715509.htm](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2/02/c_139715509.htm).
- [4]本书编写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佟言实,周志华.党外人士称谓的由来[J].中国统一战线,2008(9).
-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5年5月):第1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5年5月):第15册[M].北

- 京:人民出版社,2013:372.
- [8]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12.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0]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74.
- [11]杨卫敏.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时代内涵:新变化、新趋势、新布局[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5).
-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741-742.
- [13]中国人才研究会.聚天下英才而用之[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26.
- [1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6.
- [1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 [16]王兆国同志在全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J].中国统一战线,1995(8).
- [17]江泽民.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7-17(1).
- [18]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0.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4.
- [20]薛明扬,王小林.高校统战与高校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90.
-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5.
-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人才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1.
- [23]吕薇.建设创新型国家:38年创新体系演进[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694-698.
- [24]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 胡锦涛致新春祝福[EB/OL].(2010-02-10)[2024-04-02].[http://news.cntv.cn/china/20100210/108847\\_1.shtml](http://news.cntv.cn/china/20100210/108847_1.shtml).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3.
- [27]杨卫敏.新时代统一战线概论[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13.
- [28]中共中央统战部.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 [29]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浙江统一战线年鉴:2007年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419-421.
- [30]刘延东.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2).
- [31]杜青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242.
- [32]本书编写组.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29.
- [33]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纪念集》编写组.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42.
- [34]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28.
-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19-520.

责任编辑:刘菊香

#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创新研究

陶贤都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网红群体对粉丝、网络生态、社会格局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已成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有利于提升统战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推动互联网空间治理以及粉丝文化的治理。目前,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还不完善,面临着网红群体思想政治素养差异明显,少数网红群体主体责任意识缺乏,个别地方对网红群体统战工作重视不够、针对性不足等困难和问题。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创新需要根据网红群体特征与统战需求,进一步健全领导机制,明确网红群体主体责任意识,与时俱进更新引领理念、创新引领方式,建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队伍,更好地发挥网红群体的积极作用,助推网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网红群体;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创新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09

[中图分类号]G206;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77-06

新媒体时代,网红群体在经历了传播主体、传播载体、传播内容等方面的发展与演变后,已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网红群体的构成复杂,其传播内容涉及面广但质量良莠不齐,影响力大小不一。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思想政治引领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性、方向性、全局性和先导性。让网红群体成为积极力量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事关网红群体、网红经济的健康发

展,事关中国互联网空间的健康发展,事关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发挥。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研究。有学者指出网红可以传播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可以成为弘扬主旋律的一个端口<sup>[1]</sup>。二是关于网红群体统战工作的措施。有学者以网红“李子柒”为例,分析其对做好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启示<sup>[2]</sup>。三是关于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有学者强调思想政治引领是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工作,也是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前提,要高度重视网红

收稿日期:2024-07-27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24T20203);湖南省2024年度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课题(TZLX2024025)。

作者简介:陶贤都,男,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研究。

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sup>[3]</sup>。总的来说,目前关于统战工作中如何对网红群体进行思想政治引领,还缺少专门的研究文献。本文立足网红群体的独特性,通过调查和分析当前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现状及问题,提出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创新策略,以期为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提供借鉴。

### 一、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重要意义

网红是“依靠网络平台积聚起个人影响力,并且在各自领域内受到粉丝追捧的一类群体”<sup>[4]</sup>,是红人自身、媒介环境、背后推手以及受众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sup>[5]</sup>。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关于网红的定义,基于对网红群体现状的考察,笔者认为网红群体,即网络红人群体,泛指因某些特定事件或行为在互联网中受到广泛关注和追捧的一类人群。思想政治引领是指党从思想政治层面引导、带领和指引广大群众,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统战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引领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网红群体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和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互联网空间的舆论走向,甚至可能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然而,当前部分网红群体缺少与这种话语权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内容生产中容易出现价值观错位等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加强对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是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团结网红群体参与统战工作的重要举措。

#### (一)有利于提升统战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和大联合,人心和力量问题是统战工作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网红群体的统战工作得到持续加强。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从战略高度提出做好新媒体代表性人士工作的新要求,其中网络意见人士作为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被纳入我国统战工作的对象<sup>[6]</sup>。网红群体构成相对复杂且有一定的社群影响力,因而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不仅要与统一战线本质相契合,还要与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升广度和深度、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内在要求相一致。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sup>[7]</sup>,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的活动空间,网络统战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网红群体产生于互联网,是网络意见人士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是网民,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普通网民所没有的话语权以及影响力,是网络统战需要重视和团结的对象。针对网红群体建立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有助于合理利用并引导网红群体所携“流量”往正向发展,使得不同背景的网红能够增进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

#### (二)有利于推动互联网空间治理

思想政治引领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引领,更是价值观的引领。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发布门槛的降低,互联网成为各种声音、主张以及价值观念的汇聚地。在流量经济的驱使下,开放的互联网空间容易出现谣言兴起、色情低俗内容泛滥、不良价值观传播等问题,严重者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如果思想政治引领缺位,容易导致个别网红成为这些不良信息的传播者。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互联网在丰富人民生活的同时也为美西方等反华势力的渗透活动提供温床;少数网红也因政治素养不足而出现问题,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对网红群体进行思想政治引领,让互联网空间风清气正,是党凝聚共识和掌握网络工作领导权的内在要求。

#### (三)有利于粉丝文化的治理

网红群体特定的社群互动使得粉丝与网红之间建立起忠诚的社交关系,在粉丝滤镜下网红的某些积极特质被放大。网红群体对粉丝的影响呈现出日益深刻且长久的趋势。但是,网红群体素质参差不齐,个别网红的不良言论容易造成网民意识在微观圈层内的极化和宏观社会里的复杂化,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传统媒体与网红群体一样,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是,媒体作为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组织,其影响的人群更多被称之为受众而非粉丝,影响力大多停留信息告知层面,难以有效塑造网民的深层价值观。网红群体背景性格各异,但他们能够得到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网民关注,其依靠的多是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对长期关注的粉丝产生影响。通过建立网红群体

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引领网红群体健康发展,进而引领网红粉丝社群健康发展,是当下更容易得到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认可的思想政治引领方式。

## 二、当前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网红群体随着互联网发展而成长,以往研究多从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承载媒介的演变出发,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和宽屏时代<sup>①</sup>,未能完全体现网红群体成长的现状。为了更好地了解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现状,笔者对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为主,文献调查和案例分析为辅。在深度访谈部分,聚焦网红群体内容创作、价值导向、思想动态等方面,对来自不同内容领域、有一定粉丝基础和影响力的网红进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部分主要面向粉丝群体开展,内容涉及网红接触了解、信息质量、信任感知、情感共鸣、信息传播行为、价值判断、价值认同、网红行为评价等方面,重点关注粉丝对网红传播内容与思想政治状况的感知与评价、网红传播内容与思想政治状况对其粉丝的影响等。问卷经由网络平台发放,开展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24年1月1—30日,共收回问卷552份,其中有效问卷为514份。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加强网络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十分必要。在调查问卷中,对“网红及其信息内容需要得到一定的规范与管理”这一题目,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的调查对象分别为42.41%和46.89%,这表明网络群体作为互联网生态中不可忽视的传播力量,应当加强对其的思想政治引领与管理。在“目前对于网红及其信息内容的管理是科学到位的”这一题目中,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调查对象比例达51.36%。由此可知,目前在推进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网红群体思想政治素养差异明显,增加了统战工作的难度

网红群体来源复杂,部分网红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思想政治素养有待提升,存在对思想政治引领理解不够到位的情况。本文以哔哩哔哩网站(以下简称“B站”)粉丝数排名前10的网红作为观察对象,

粉丝总量数据获取时间截止到2024年7月14日,除去官方账号、品牌号之后整理得出总粉丝数量前10的个人UP主,分别是:罗翔说刑法(3110.6w)、老番茄(1924.9w)、木鱼水心(1364.6w)、小潮院长(1250.8w)、帕梅拉PameilaReif(1262.6w)、老师我叫何同学(1162.7w)、绵羊料理(1141.5w)、周六野Zoey(1024.7w)、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980.9w)、敬汉卿(948.4w)。以上10位UP主中,既有草根出身的UP主敬汉卿,也有知名法学教授出身的UP主罗翔。前者主要以发起各种挑战为噱头吸引网络用户的关注,后者则致力于科普宣传法律知识。网红受教育程度不一,定位不同,网络投稿内容也大不相同。以上10位UP主主要以发布所在分区的视频内容为主,他们所制作的内容主要为中性,大多UP主自身形象也偏中性。但是,他们一旦有违法行为或不当言行出现,其网红形象便会受到影响。

网红群体具有一般网民所不具备的影响力,能够在粉丝群体中产生较大影响。在调查中,超出八成的网友认为,网红应对粉丝起到正向引导作用。同时,超出七成的网友认为,目前一些网红及其发布的信息内容会对网民的价值观念产生负面影响,容易导致社会不良行为。

网红及其内容传播对粉丝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明显的引导作用。部分网红作品中拜金、猎奇、低俗的内容容易误导粉丝群体,一些危险出格的特殊行为甚至会引发网民尤其是未成年群体模仿。但是部分网红群体对这类现象及其影响缺乏足够重视。部分网红将娱乐性和休闲性视为作品的核心,将点击率和热度视为作品的目标,从而容易忽略作品的思想政治导向。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素养良莠不齐,且对粉丝的影响明显。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应针对不同的网红采取不同的方法,具体工作难度较大且繁杂。

(二)少数网红群体主体责任意识缺乏,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

调查显示,网红普遍拥有思想政治底线意识。在信息内容点击量、信息内容道德质量与价值观方面,

多数受访网红表示价值观与道德质量是内容作品传播的底线。如网红 B 表示:“我们会考虑点击量,但我们会把道德质量和价值观放在点击量前面,博点击蹭热度的事情做不出来。”但也有少数网红思想政治基础较为薄弱,对思想政治了解与学习不够,容易在作品和行为中产生差错,导致负面事件发生。

在当前的网络传播中,网红群体与粉丝之间的联系大多以兴趣、情感、互动为纽带,网红群体对其粉丝有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据调查显示,有近 80%的网民认为,网红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义务,其中对此表示“非常同意”的占 29.38%,对此表示不同意与非常不同意的比例仅占 1.75%与 0.58%。但在现实中,个别网红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作用,轻视甚至忽略思想与内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少数网红对思想政治学习与参与思想政治活动积极性不高,个别网红甚至对思想政治内容有抵触心理和抵触行为。如访谈对象 C 表示:“我不讨论政治,我的内容应该和政治搭不上边,我只是分享我每天干了什么,我不输出观点,不分享想法。”

在网红行为评价方面,针对“网红在国家公祭日时进行转发、支持、呼吁等行为”一项,74.9%的网友表示“赞同支持,这是网红应该做的”。这表明,大多数的网友希望网红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义务,以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基础,积极参与思想政治传播,正确引导粉丝群体。

由于对自我责任和影响力缺乏正确认知,部分网红自身定位偏向生活娱乐,难以摆脱公众对其的刻板印象。部分网红思想政治修养不足,其所传播的导向错误、价值观扭曲的内容对粉丝与广大网友造成不良影响。部分网红出现思想政治上的偏差,其行为和传播内容与主流价值观不相符合,甚至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些现象亟需通过进一步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予以纠正。

(三)个别地方对网红群体统战工作重视不够,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不足

网红群体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个别地方的统战工作对他们的思想动态关注较少。比如,一些搞

笑领域、萌宠领域、生活领域的网红群体,很少有机会与统一战线工作部门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交流。

网红群体的社会来源广泛,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利益取向呈现出复杂性、差异性与多样性,自媒体的传播特征也使得网红群体看重自我意识和自身权利。对网红群体情况和特征的准确把握是做好思想政治引领的前提和基础。但以往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网络意见人士、新媒体代表人士等宏观群体,对网红群体的独特性重视不够。部分统战工作人员对网红群体的认识呈现出表面化、浅层化和简单化的倾向,个别统战工作人员甚至将冷漠施压和“只堵不疏”作为网红统战工作的常规方法,导致网红群体对思想政治引领的态度趋向回避和排斥。

个别地方对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主要集中在线下开展,很少组织网红群体参加线上活动。有的地方对网络统战的意义认识不足,简单将网络统战理解为借助网络平台将线下工作搬到线上,还未意识到网络统战作为一个全新领域的价值所在<sup>[9]</sup>。个别地方相关部门组织分工不够明确,对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引导缺少协同和沟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影响了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效果。

### 三、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创新策略

当前,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的工作机制逐步建立,相关领域的法律及政策的施行取得了明显效果。为进一步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奠定了基础。当前,应聚焦建立健全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使网红群体的积极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让网红群体自身所携带的“流量”转化为统战工作的“正能量”,通过团结网红群体来团结该群体所联系和影响的网民,助推网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 (一)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机制,为常态化开展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提供制度保障。以大统战的视野建立由党委领导,统战部门协调,网络信息安全、宣传、新闻出版、文化、互联网公司运营、监管、司法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协同



工作机制,整合统一战线领域资源,明确各部门的工作内容与职责,建立沟通协调联动机制,实现各部门通力合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常态化开展的工作。在实践中,统一战线工作部门要加强与网红群体的沟通交流,及时掌握网红群体的思想动态、价值观念、利益诉求;要注重网红群体政治素养、专业素养、责任意识、媒介素养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将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在日常;要持续对网红群体及其传播内容的追踪与监管,及时有效地规避、发现、处理网红群体的负面事件和影响;要完善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的相关政策法规,为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 (二)强化网红群体主体责任意识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的着力重点,要坚持思想政治引领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进一步提高网红群体政治修养、培养责任意识、加强综合素养。

一是着力提高网红群体思想政治修养,引导和鼓励网红群体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根据不同领域网红群体的网络传播习惯和网络技术特性,有针对性地对政治理论学习内容形式进行创新,如创新网络直播、在线课程、教育短视频等培训方式,不断提高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二是着力培养网红群体责任意识,发挥正向力量。以具体数据、生动事例等方式使网红群体对其在净化网络空间和弘扬正能量中的角色和作用有清晰感知,树立网红群体的主体责任意识。引导网红群体积极参与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实践,鼓励和帮助他们生产优质内容,使其成为聚合网络正能量、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三是加强网红群体综合素养,帮助网红群体持续进步。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应以发展的眼光提高网红群体的技术能力、专业水平等,使网红群体将自身能力发展与统战工作目标相结合,帮助网红群体健康成长。

#### (三)更新思想政治引领理念,注重双向沟通

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要更新理念。一是充分认识网红群体在推动统一战线工作、互联网空

间治理、网民思想政治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二是坚持以平等的态度,与网红群体进行交流和引导;三是树立主动联系的工作理念,强化统战工作服务意识,加强与网红沟通联络。

要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是改进统战工作方式的鲜明方向。网红群体生发于网络,依赖于网络。要通过搭建思想沙龙、研讨会、学习班、新闻发布会等各种沟通互动平台筑牢思想政治引领的网络“阵地”,畅通微信、微博、论坛等网络新媒体互动渠道,主动加强与网红群体的联系,主动关注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动态,广泛收集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 (四)创新引领方式,广泛凝聚共识

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防止“一刀切”。要坚持凝聚共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做到兼顾全体、细致入微。探索建立网红群体基本情况数据库,根据网红传播内容领域、思想政治情况等进行分类,并做好动态管理、及时更新,为做好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提供支撑。

在一致性方面,一是要实现网红群体思想引领工作全覆盖,重视各个领域不同网红的的影响力和引领价值。二是充分发扬民主,畅通与网红群体的沟通渠道,鼓励其积极为党和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

在多样性方面,一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尊重包容网红群体的差异性。二是协调网红群体多元利益。照顾同盟者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和原则<sup>[10]</sup>。要从网红群体现实利益诉求入手,关注网红群体的困难与现实关切,将协调关系、理顺利益、化解矛盾作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重要环节。

#### (五)建强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队伍

网络统战工作是“互联网+统战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互联网化<sup>[11]</sup>。互联网是网红开展活动的主要场域,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要将互联网作为主阵地,抓住网络统战的主导权,契合互联网传播的时代要求,以创新发展的眼光和先进的技术方法等

满足工作需要。

构建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网络阵地,队伍建设是关键。要加快组建胜任网络统战工作的工作队伍。首先,网络统战工作队伍必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政治素养,这既是面对复杂网络环境和多样引领对象挑战的需要,也能增强其在网红群体思想政治引领中的引导力和感染力。其次,加强对统战工作人员互联网技术的培训,提升其驾驭新媒体的能力与水平。同时,统战工作人员要提高对网络统战工作的认识,主动了解网红群体的基本情况、思想观点、话语体系,以平等的交流姿态、真诚的服务意识、高超的引导艺术赢得网红群体的信任和支持,实现顺畅高效的沟通。

### 结语

在新的网络传播格局中,网红群体已成为引导网民群体、影响网络舆论、构建网络生态的一支重要力量。重视对网红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是更好发挥网红群体积极作用、适应网络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统战工作要充分把握网红群体的特点,以适应网络统战工作需要的新观念、新机制,引导网红群体更好地发挥作用,助推网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田恬,米金升.网红也能唱响主旋律——“中国奇迹之旅”的自媒体传播探索实践[J].新媒体研究,2017(13).
- [2]王正,贺鹏芳,李旭.“李子柒现象”对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启示[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
- [3]李芬,宋哲,刘银松.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统一战线中的思想政治引领问题研究[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2).
- [4]敖鹏.网红为什么这样红?——基于网红现象的解读和思考[J].当代传播,2016(4).
- [5]沈霄,王国华,杨腾飞,等.我国网红现象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与治理对策[J].情报杂志,2016(11).
- [6]李大棚.同心圆理论视角下网络意见人士的分类

与精准统战研究[J].理论月刊,2019(7).

[7]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J].传媒论坛,2024(6).

[8]许祥云,张茜.“网红”的发展逻辑及其负面效应的规避[J].湖北社会科学,2019(5).

[9]刘海波,陈奇琦.新媒体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研究[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3).

[10]姚俭建.思想政治引领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探究——兼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统一战线的凝聚力[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

[11]陈喜庆.关于加强网络统战工作的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

责任编辑:祝远娟

# 鼓楼:汉侗建筑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碑

——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系列之六

覃彩銮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28)

**摘要:**鼓楼是侗族特有的一种木构建筑,是侗族文化的载体、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侗族地区的每一个村寨里,都耸立着挺拔的鼓楼。鼓楼是侗族人民在借鉴和吸收汉式宝塔结构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社会生活需要,运用独具匠心的营造工艺构建的一种风格独特的木构建筑形式。鼓楼既是侗族村寨的标志,也是汉侗民族建筑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铸成的历史丰碑,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木构建筑成就与面貌。

**关键词:**侗族;鼓楼;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西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10

[中图分类号]TU-8;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83-05

侗族是我国南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湖南三省(自治区)交界地区。广西是侗族的重要聚居地,集中居住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形成大聚居小分散的分布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侗族人民创造了以鼓楼为核心,由风雨桥、戏台和干栏式民居组成的木构建筑体系,其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多重的社会功能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我国丰富多彩、成就卓著的民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侗族地区的每一个村寨中,都耸立着挺拔的鼓楼。鼓楼是侗族村寨的重要标志。通过对侗族鼓楼的起源、发展、营造工艺、建筑结构及其包含的汉族建筑文化元素的分析,揭示侗族鼓楼对汉式宝塔建筑的借鉴、交融与独具匠心的创造,可以增进对广

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认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 一、鼓楼:侗族建筑文化的标识

鼓楼,因楼内悬挂一面椭圆形牛皮鼓而得名,是侗族特有的一种木构建筑形式。每一个侗族村寨中都建有鼓楼,数量不等。鼓楼以其独特的造型、巧妙的结构、精湛的工艺、多重的社会功能和显著成就,成为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据不完全统计,广西侗族聚居区有 300 多座鼓楼,集中分布在三江、龙胜两县,其中三江 230 多座,主要分布在林溪、独峒、八江、斗江等乡镇;龙胜有 120 多座,集中分布在平等、乐江、瓢里等侗族聚居的乡镇。融水滚贝侗族乡的侗族村寨也建有鼓楼,故民间有“无寨不鼓楼”之说。

收稿日期:2024-05-29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

鼓楼为木质结构,选用具有良好抗震性和耐用性的干爽杉木为材料,通常由全寨各家投工献料,再由木匠师傅加工成各种规整的木构件,采用榫卯结构、穿斗和抬梁式营造方法建成。鼓楼形态多样,有宝塔式、亭阁式、宫殿式、干栏式等。底层呈四方形,楼顶造型有四边形、六边形或八边形等;流行单数密檐式,有三、五、七、九、十一层不等,顶部呈古塔状。建造时没有设计的图样,全凭木匠师傅长期积累的构建经验。通常以四根粗大挺拔的杉木为主承柱,四周立有六至八根衬柱,采用榫卯构造和穿斗式及抬梁式构建工艺,在立柱上有序地开凿纵横的方形卯眼,将加工规整的枋木和檩条有序地插入卯眼中;在枋木之上设立瓜柱,柱顶再卯入枋条,逐层抬高、收缩,形成阶梯状密檐式斜坡形塔式楼顶,层距0.8—1米。鼓楼内立柱高大挺拔,从地面直达楼顶,枋木和檩条纵横交错,不用一钉一铆,全凭榫卯构合形成结构严密牢固的鼓楼木骨架。楼顶上用小青瓦覆盖;顶尖塑以寓意吉祥的宝葫芦或鹤鸟形;每层楼檐末端微微上翘,塑成仰首的鹤鸟形象。檐口封板上,饰以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或侗乡风情的彩塑或绘画。楼顶上的檐脊、檐口处,全部使用灰白沙灰封勒。这既可以起到固定瓦垄,防止风吹震动移位的作用,又具有装饰效果,显示出鼓楼线条的清晰与美感。鼓楼内的梁架上,悬挂一面椭圆形牛皮鼓。若村寨中遇到紧急事项,便以击鼓为集众的号令。鼓楼下层四周拼板为墙,正中板壁上立有供奉本寨祖先的神台,周边设有长木凳,中间设有火塘。鼓楼外有平坦、宽敞的地坪,供节日迎客、赛芦笙、踩歌堂、跳多耶舞等文娱活动。鼓楼集楼、阁、亭、厅堂为一体,融建筑、造型、绘画、雕塑、工艺于一炉,堪称侗族木构建筑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侗族鼓楼的形态,主要有阁式和塔式两种类型。阁式鼓楼,形似阁楼,平面略呈长方形,形体较为宽大;高度则较矮,通常有5—9层,高15米左右。流行以四根大型挺拔的杉木为基柱,采用榫卯穿斗构造工艺,以枋条承载瓜柱,逐层抬高、收缩,直至楼顶,形成密檐式塔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江侗族自

治县八江镇马胖村的马胖鼓楼。该鼓楼建于1928年,1943年重建。其平面为正方形,边宽12米,高约20米,为九层重檐式,小青瓦楼顶,四角檐脊微上翘,末端塑饰灰白色的立鹤形象。楼中四根粗大笔直的杉木柱从地面直通楼顶,利用逐层内收的梁枋、瓜柱支撑层层挑出的楼檐。所有木构件都采用榫卯穿斗构造相互衔接,环环相扣,联结成一个紧密稳固的整体。在主要木构件上,或雕刻或绘有生动精美的花纹图案;各层封檐板上亦绘有侗族特色的卷草花纹;楼内顶层悬挂一面长柱形牛皮鼓。因其年代古老,风格独特,结构精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1963年2月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塔式鼓楼,形似古塔,形体修长,檐层多且密集,高度多在20米以上,是广西侗族聚居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鼓楼。其结构与阁式鼓楼大同小异,平面呈正方形,楼体为厅堂,高四至五米。上部各层为密檐式,间距较小。以四根粗大挺拔的杉木为主承柱,柱体上开凿的卯眼插入枋木,通过枋木承托瓜柱与檩条,逐层抬高和收缩,直至楼顶,形成密檐式古塔形。顶部盖小青瓦。这体现出侗族鼓楼的独特造型、巧妙结构、装饰风格及木构建筑成就。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侗族人民在继承传统鼓楼结构的基础上,以创新思维和开创精神,对鼓楼结构进行改进与创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其中以独柱鼓楼、鼓楼与戏台合一、鼓楼高度之最这三座鼓楼最具代表性。

独柱鼓楼: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高定村吴氏家族的独柱鼓楼,始建于1921年,1988年重建。其独特之处是鼓楼中心以一根粗大挺拔的杉木为主承柱,主承柱四周设6根衬柱,以榫卯和穿斗构合工艺,插入枋条和梁檩木,将衬柱与主承柱相连,沿主柱纵横延伸的枋条承托的瓜柱,逐层抬上,形成高19米的密檐及六角攒尖顶构架。顶上盖小青瓦,尖顶塑有连体宝葫芦。每层檐脊敷以灰白色沙料,末端塑成翘首的鹤鸟。底层为宽大的方形楼厅,大门开于楼的南面。因该鼓楼台开启了独柱之先,工艺精湛,独树一帜,2001年1月列为三江侗族自治县文物保护

单位。

鼓楼与戏台合一: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村耸立着一座鼓楼与戏台合为一体的建筑。底部为宽大的长方形,四周用青砖和石料砌成矮墙,上面铺设木板,形成戏台;台后建有化妆间或休息室。戏台上方四角各有一根粗大木柱,以檩条和枋木卯合相连,逐层收缩而上,形成三檐六角形塔式鼓楼。其上部保留了鼓楼的特征与功能;下部的宽大方形戏台,可供节日进行戏剧演出。其巧妙的构思,既节约了建筑用地,也节省了建筑用材,开创了鼓楼与戏台合为一体之先,反映出侗族人民的创造精神。

鼓楼高度之最:2002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多耶广场修建了一座高大雄伟的鼓楼,为27层密檐式瓦檐,高42.6米,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鼓楼体量大,高度高,结构极为复杂,从鼓楼的结构、空间布局到装饰和应用功能等,均需要精心设计,而且用材精良。工匠们取传统鼓楼之长,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和旅游观光的需要而创新。楼内立1根雷公柱,4根主承柱、12根檐柱,寓意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其中四根主承柱直径达70厘米以上,而第一主柱直径达85厘米,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工匠们采用穿斗构造法,通过主承柱连接四周衬柱,利用杠杆原理,以枋木和檩条承托瓜柱,逐层抬高,形成古塔式攒尖顶。纵横交错的枋木与檩条紧密扣合,形成一个稳定的木构骨架。与传统鼓楼的结构不同的是从第二层至第二十五层都设有楼层,并且建四层宽大的观礼台。通过宽敞楼梯拾级而上,可以观赏周边的秀美风光。楼底外部四周,镶嵌有雕刻工匠建造鼓楼的典型工艺形象。因此,该鼓楼是目前我国层数最多、高度最高、结构最复杂、工艺最精湛的鼓楼,创下了侗族鼓楼高度之最。

长期以来,鼓楼在侗族生活中有着多重社会功能。首先,鼓楼是侗族群众集会议事的中心、应对紧急情况时的指挥所。如果遇到匪盗侵扰,即刻击鼓集众,组织青壮年男子抗击。其次,鼓楼是寨老处理或调解民事纠纷、裁定是非曲直之所。其三,鼓楼是接待宾客、举行文娱活动的场所。每逢重要节日,各村寨的群众都在鼓楼欢聚一堂,赛芦笙、踩歌堂、跳多耶舞。其四,鼓楼是人们休息、聊天的重要场所。进入

新时代,鼓楼又成为开展文化教育、文明传播和非遗传承的重要场所。因此,鼓楼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鼓楼文化已深深融入侗族人民的生活中,成为其民族认同的标志、团结凝聚力的象征、心灵安全的依托和情感联系的纽带。

关于侗族鼓楼的起源,史料缺乏明确记载。明代邝露《赤雅》上卷“罗汉楼”条云:“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尺,烧无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矣。扳男子歌唱、饮瞰,夜缘宿其上,以此自豪。”该记载被认为是鼓楼的最早记述。清代至民国年间的方志中对鼓楼的记载渐多。目前最古老的侗族鼓楼,是贵州黎平县述洞下寨的独柱鼓楼,建于明崇祯九年(1636)。广西侗族鼓楼的建造年代多为清代至民国年间,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高友大寨鼓楼,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寨上的盘高鼓楼、吴氏鼓楼,分别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和清光绪九年(1883);马胖鼓楼建于1928年。因此可推,侗族鼓楼产生于明代,清至民国时期开始兴旺发展,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从文化发生学的规律看,一种文化及其载体的产生,都有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需要密切相关。根据民俗学资料,早期鼓楼应是基于保障村寨安全而修建的一种具有瞭望警戒匪情功能的“哨楼”,以防范匪盗对村寨的袭扰和抢掠。依据侗族民间传说,很久以前,地处偏僻山区的侗族村寨时常受到匪盗的抢劫,严重危及侗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寨老”就召集寨中德高望重者共商防匪防盗之策,最后决定在寨旁或寨中地形较高处建造一个瞭望塔,派人轮流放哨观察,一旦发现匪情,立即发出警示信号,让村民做好准备,共同抵御来犯之敌<sup>①</sup>。此后,凡是村寨中的大事,人们就聚集到哨楼下商议。久而久之,哨楼便成为侗族群众议事、娱乐或聊天之地。后来,哨楼逐渐演变成鼓楼,并在楼内悬挂一面牛皮长鼓。村寨里如有重大事项,即登楼击鼓,或召众商议,或共同御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鼓楼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鼓楼体量、结构还是功能,都有了新的发展与创新。由于社会的安定,鼓楼的防匪盗、保安全

的社会功能已经退化,但鼓楼内依然悬挂着一面椭圆形牛皮鼓,保持了楼与鼓紧密结合的传统风貌,反映了侗族鼓楼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 二、侗族鼓楼中的中原建筑文化元素

侗族与壮族同源,源于先秦时期的西瓯、骆越。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青铜器通过湘桂走廊,传入岭南各地,促进了壮、侗等民族先民——瓯骆青铜文化的产生。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郡县,留兵戍守、徙民南居,开启了岭南越人与中原民族直接交往交流交融之先河。随着大批中原人的南迁,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及其文化随之传入岭南,对岭南瓯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东汉至隋唐时期,瓯骆人逐步演变为乌浒、俚或僚人。唐宋时期,侗人逐步从乌浒、俚、僚人中分化出来,并向广西中北部地区山区迁移。因长期居住在山区溪河两畔的平洞间,故以“洞”为族称,后定为侗族。秦代以来,侗族及其先民一直与中原民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学习和吸收中原汉族文化,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

文化的交流互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侗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与汉族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始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鼓楼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侗族人民学习、借鉴和吸收中原塔式建筑的结果。因此,鼓楼的造型、结构形态和构造技术,都包含着中原汉族建筑文化的元素,并且与中原地区佛教及佛塔南传的社会人文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佛教源于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相继出现,驰名中外的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等,都于北魏时期开凿。唐代是佛教本土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兴起了修建寺庙、宝塔之风,并且与中国本土的建筑风格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塔,专门用于安放高僧的舍利、佛经,供奉佛像。唐代以来,建塔之风逐步向岭南地区传播。广西年代最早的宝塔——桂林漓江畔的木龙塔,就是唐代兴建的。据初步统计,自唐代以来,广西各地共建有 140 多座宝

塔,留存至今的有 80 多座,其中以明清时期修建的宝塔居多。由于广西各少数民族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多流行自然崇拜,如雷神、水神、土地神、花神等。因经济生活方式和传统信仰差异,广西少数民族中的佛教信众较少。正因为如此,原本属于佛教文化的佛塔,传入广西后其功能发生了变异,即广西各地修建的宝塔主要是为了镇邪、增补风水景观或彰显人文蔚起的意象。因此,宝塔多建于城镇附近的坡顶或河畔上。然而,正是中原地区宝塔建筑的传入,对侗族鼓楼建筑的形态与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深刻影响。

侗族鼓楼上的中原建筑文化元素,首先表现在对佛塔造型的借鉴与吸收。鼓楼下层呈长方形,层高约 3 米,平面布局与功能保持着传统干栏的厅堂格式。厅堂中有四根高大的杉木柱,柱间开凿纵横的长方形卯眼,插入枋木,通过瓜柱承托梁檩条,逐层抬高且收缩为四或六边形密檐式,外伸檐末微翘,顶尖塑有寓意吉祥的宝葫芦或鹤鸟形象,远观形似宝塔。这是侗族工匠借鉴汉式宝塔形态,运用于建造鼓楼的结果。侗族工匠在建造鼓楼时,并非完全照搬佛塔样式,而是借鉴其形态,将塔层距离缩短成密檐式,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鼓楼。这种参照或借鉴汉式佛塔之形、注入自身民族文化之核的方式,体现了侗族人民对中原建筑文化的借鉴与创新。

其次,整座鼓楼木构架的建造方法和营造工艺,深受中原木构建筑的榫卯结构和穿斗、抬梁式营造方法的影响。榫卯结构和穿斗、抬梁式构建技术,是中国独特的木构建造方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享誉世界,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秦汉时期该技术日臻成熟,秦朝修建的阿房宫、汉朝修建的长安城,其木构建筑皆已采用榫卯结构和穿斗、抬梁式构建方法,并且对后来历代宫殿、寺院等木构建筑产生深远影响。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的湖北武汉黄鹤楼、唐代于江西南昌修建的滕王阁、辽代修建的山西应县木塔,分别是中国木构楼、阁和塔式建筑的代表。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和徙民南迁,中原地区的榫卯结构和穿斗、抬梁式构建技术也随之南传。在与南迁的中原人接触、交往和交流过程

中,侗族先民逐步掌握了榫卯构造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干栏住屋的建造。明代以来,随着建筑营造经验的积累和构建技术的提高,侗族工匠将榫卯构造技术运用于鼓楼建造,在此过程中穿斗和抬梁式构建方法得到了巧妙运用和充分发挥。根据建筑形态与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早期的鼓楼应是在干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增加干栏的层数与高度,使之具有远眺或瞭望敌情的功能。因此,现存的鼓楼中仍可见干栏式的遗风。龙胜的龙坪红军鼓楼和平等鼓楼,就是形态古老的干栏阁式鼓楼,其特点是形体较为宽大、层数较少、高度较低。清至民国年间,塔形鼓楼开始在侗族聚居区流行,其主要特征是高度提升,密檐扩展到了七至十一层。鼓楼的整体木构架全部采用榫卯结构和抬梁式构造法。四根高大的主承柱直达楼顶,穿枋、梁檩纵横交错。侗族工匠将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和穿斗、抬梁式构建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鼓楼的建造中,建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鼓楼建筑。

侗族鼓楼中的中原文化元素,还表现在建筑文化观念中,包括鼓楼的层数及其朝向等方面。侗族鼓楼的层数流行奇数,即三、五、七、九、十一层;中原地区的佛塔塔层也流行奇数。对于奇数的崇尚观念,源起于中原。在西周时期,中原人创制了“太极”、阴阳说和六十四卦推衍法,集中汇集于《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是易经的精髓。简言之,就是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活着的人为阳,死者为阴;给人住的建筑称为阳宅;埋葬死人的坟墓称为阴宅。所以视奇数为吉数<sup>[2]</sup>。这种阴阳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深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随着大批中原人南迁,阴阳观念也传入岭南,为侗族及其先民所认同。为此,当地所建鼓楼的楼层皆为奇数,楼梯也是奇数。另一方面,鼓楼朝向通常为坐北朝南,同样是受中原易理影响的结果。自古以来,中原地区无论是古代皇宫、殿堂、庙宇,还是普通百姓的住屋,皆倾向于取坐北朝南。这是古代人民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对大自然规律以及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认知和经验总结的结果。即建筑坐北朝南,与阳光照射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地处北半球,阳光主要从南边照射,这种布局能确保生产和居住空间享有充足的日照。各类建筑坐北朝南,既有利于建筑内的采光和通风,达到藏风纳气的效果,又可以避免来自北面寒风的吹袭,保证居住的舒适性。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便形成了“坐北朝南”的观念。侗族鼓楼流行的“坐北朝南”取向,应是受此观念影响的结果。侗族鼓楼的装饰,也包含汉族文化元素,如楼顶和檐尾雕塑的葫芦、立鹤造型,亦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 结语

侗族人民在修建鼓楼的过程中,一方面学习、借鉴和吸收中原汉族构建技术,用于鼓楼的建造。这不仅使鼓楼的结构更为紧密稳固,而且有效扩大了鼓楼空间,提升了鼓楼高度。另一方面,侗族工匠并未完全照搬汉式建筑形式与结构,而是根据鼓楼的社会功能需要和审美情趣进行改造。无论是塔式鼓楼还是亭阁式鼓楼,都是借汉式宝塔之形,行鼓楼之实,即鼓楼外部四或六面构成密檐式,保持了塔层的形式和风格;而楼内的主承柱直达楼顶,不设楼层,实现了鼓楼结构的创新与发展。其中,榫卯和抬梁式构造法在鼓楼构建中的运用更为精妙。这些方法以主承柱为支点,通过纵横交错的榫卯构合和抬梁的荷载,逐层抬升,使鼓楼木构架紧密稳固,浑然一体;而独柱鼓楼的构架,把榫卯构合和抬梁方式发挥到极致。正是汉、侗民族建筑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侗族鼓楼文化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建筑文化,展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魅力与风采。

### [参考文献]

- [1]杨通山,等.侗乡风情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211
- [2]刘金明.太极图是怎样画出来的[J].宗教学研究,2001(3).

责任编辑:许立坤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宋家麒

(海军航空大学,山东济南 255041)

**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二者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追求和共同精神财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构筑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和民族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开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空间。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大趋势、坚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断走深走实。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主体性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11

[中图分类号]G12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88-07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回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为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团结进步凝心、聚魂、固本的一项重大工程。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并将其载入党章。2021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定位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要求所有工作向此聚焦<sup>①</sup>。目前,国内学术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出场背景、思想

渊源、理论意涵以及内在逻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sup>②</sup>,生成于各族人民社会化实践的过程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出场”<sup>③</sup>。也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各民族“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主体地位”,是人们在认知、认同、评价和情感等层面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心理活动的总和<sup>④</sup>。学者们结合当下所处的时代方位,提出通过数字经济增强情感和价值认同<sup>⑤</sup>、维

收稿日期:2024-0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KS086)。

作者简介:宋家麒,男,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政治理论教研室助教,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护各民族数字权利<sup>[6]</sup>、加强网络空间统一战线建设<sup>[7]</sup>等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只有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综合施策、系统联动,才能将‘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落地见效”的观点逐渐成为学界共识<sup>[8]</sup>。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开了创新空间。在历史演进的漫漫长路上,各民族彼此支持、互相激荡,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最深层次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核<sup>[9]</sup>。纵览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将文化逻辑引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研究当中。有学者指出,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统一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疆域、历史、文化与精神上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中华文明的包容涵养和规范引导是各民族共生互融的关键所在<sup>[10]</sup>。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共同性可以有效缩短心理距离,进而促进形成民族间紧密联结的心理认知<sup>[11]</sup>。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与“和合”文化,“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从古至今的民族观都贯通着“大一统”思想的脉络<sup>[12]</sup>;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合”文化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性传承价值,可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提供正确的价值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sup>[13]</sup>。

概言之,学界已经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并从文化之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适时地在文化逻辑的基础上引入更为宏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角。党的二十大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sup>[14]</sup>。本文根据党的二十大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学术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进行

探讨。

## 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统一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双向互动、协同共进的过程,二者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使命<sup>[15]</sup>,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然是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和中华民族近代文明相比较而言的<sup>[16]</sup>,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内容。我们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所创造的文明,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包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体性文明。在党的统一战线语境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文化、心理和思想等层面共同行为习惯的总体性认识。

###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追求和共同精神财富

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是同向并行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共同组成的文明有机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两个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项全新事业,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然踏上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也意味着历经千年的中华文明将在新时代展现出蓬勃生机。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sup>[15]</sup>中华文明不具有排他性,不主张用某一民族的单一文化同化、代替其他民族的多元文化,而是倡导由各民族灿烂多元的文化汇聚而成的共同文化。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论”、中华文明发展“多元一体模式”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彰显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突出包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是各民族的共同责任,这种责任感和使命

感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上,更要体现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继承与创新之中。只有当我们共同拥有先进文化、共同享有文化成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具体利益的有机结合和集中体现。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民族牢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挥。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形成和发展的源泉。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民族,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都来自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代表全体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态,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更需要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持续推进,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作用的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的鲜明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承担起主体性责任。以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从根本上将各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整体性框架之内,有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创新活力。守正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坚持守正创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原则,“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sup>[15]</sup>。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筑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在“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中巩固和壮大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共同体基础。

(三)二者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生

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将很难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谈不上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引领,更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无论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要以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基础。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关键,民族认同是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毛泽东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sup>[17]</sup>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即“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sup>[18]</sup>。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和坚持温和改良的戊戌维新都未能挽救当时的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才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方向。中华民族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决“亡国灭种”的危机,其理论逻辑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在于中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接纳<sup>[19]</sup>。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各民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与各国的现代化紧密相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各民族文明融通互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过去,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书写了灿烂辉煌的历史,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都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将秉持并积极倡

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立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进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和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引领者和组织者,无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成败关键。

一方面,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保证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民族层面的宏观概念,必定是要建立在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实体认同和价值认同之上的。然而,传统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社会基础。古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根据血缘关系和地域划分的封建宗法体系之上的,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家族中的成员通过祭拜祖先和家族纪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宗法体系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为封建统治提供社会基础,但对于家族成员来说,往往难以察觉对家族之外的事物,更意识不到宏观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因此,古代的中华民族只能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sup>[20]</sup>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各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和反抗国内封建压迫的过程中萌发了现代的民族意识,有识之士们开始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踏上了追求民族独立的正道和实现民族复兴大道。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各类社会组织,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社会的组织程度,冲破了封建社会组织体系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唤醒了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有效地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到反抗“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中。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针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体,不仅包括大陆各族同胞,还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这样一来,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之中,便产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制度认同差异之间的矛盾。对此,必须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避免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制度认同之间的矛盾,协调好爱国、爱民族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关系。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目标,引导和增进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解和认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认同,进而协调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

#### (二) 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多元一体”是理解中华文化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关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条件。新时代发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巨大优势,关键是要将民族团结摆在首

位,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中。

首先,要坚持民族平等。既要坚决抵制大汉族主义和“汉族中国论”,又要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要避免机械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同于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的专利,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我国内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的。一致性不是同质性、单一性,多样性也不是离散性、割裂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是要将不同民族的个性同质化,而是要在保留民族个性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各民族优势与特点,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最大公约数”把各民族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等最大限度包容进来,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生命有机体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提供最广泛的力量支持。为此,必须坚决克服扩大和忽略民族差异性的倾向,前者容易导致我们罔顾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不利于民族团结;后者则容易导致我们忽略当前各民族的发展存在差异和差距的事实,不利于民族平等。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戮力同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努力,是各民族应当承担的共同责任。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民族靠互融互通而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靠各民族共同铸牢,不能只靠少数民族单向铸牢<sup>[21]</sup>。各民族应当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契机,创新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多角度的交往交流交融。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深入挖掘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记忆,在共同记忆中凝练总结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并将这些内容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有机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中。此外,应充分发挥广大社会组织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和公益类、经济类、环保类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在援助困难群体、保护生态环境、带动经济发展等

方面发挥作用。

最后,要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无论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抑或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sup>[22]</sup>。精神的富足比物质的堆积更加宝贵,但脱离物质基础的精神只是空谈无补。共同富裕是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sup>[23]</sup><sup>[87]</sup>,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涵<sup>[24]</sup>,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方面的富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通过现代化建设“富口袋”,又要通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富脑袋”,二者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也要看到,一些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必须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推动实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共同富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 (三)坚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巩固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辅而行、辩证统一的,只有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真正巩固文化主体性<sup>[25]</sup>。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中华文明的强大涵化力和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的精神财富<sup>[23]</sup><sup>[93-94]</sup>。通过文化传统这一独特的集体性特征,人们可以把“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在论述“民族认同”时总结了五大特征,其中就包括“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和“共同的大众性公共文化”<sup>[26]</sup>。近代以降,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与滞后是中国无法有效应对外来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指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sup>[27]</sup>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推动文化多元化发展,更要巩固文化的主体性地

位。只有中华文化“根深干壮”,各民族文化才能“枝繁叶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入脑入心”。

一要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层动力。文化的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坚定的文化自信可以增强民族精神的独立性,进而夯实文化的主体性。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活的灵魂”<sup>[28]</sup>,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15]</sup>。与工具器物等象征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文明相比,文化是更具流动性、灵活性的动态存在,它总是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人们的灵魂。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脱离中华文明的天外来物,而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底蕴的涵养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文明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身份标识。要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主动与实践自觉。

二要秉持开放包容。中华文明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它不仅集合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结晶,同时也吸收了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许倬云指出,中国文化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通化四邻,而是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sup>[29]</sup>。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不仅是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重要密码,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绽放生机活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华文化聚异为同的强大涵化力作用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历久弥新,塑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而不同的精神特质。因此,必须充分激发开放包容这一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立足“两个结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三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守正,守的是方向、原则和立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根脉”的主体地位和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指导地位;创新,创的是动力、机制和方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厚底蕴。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其中有精华,亦有糟粕。必须在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时代要求甄选和吸取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以古鉴今而非以古非今,古为今用而不厚古薄今,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结语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二者都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当中。从理论视角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引入文明视角,既提升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价值,又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内涵。从实践视角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旨归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指南内在契合,二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相辅相成。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正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辩证关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大趋势、坚持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树立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确保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1).

- [2]麻国庆.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西北民族研究,2022(1).
- [3]苏泽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逻辑机制与实践进路[J].云南社会科学,2023(1).
- [4]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4).
- [5]吴本健,罗玲.数字经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 [6]田钊平,张耀.大数据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族际关系治理转型为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7).
- [7]陈联俊,夏泉.网络空间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2).
- [8]沈桂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以民族理论和政策话语重构为例[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1).
- [9]高永久,冯辉.从“一条主线”到“一线两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导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5).
- [10]李鹏博,朱军.哲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实体性与历史演进[J].民族论坛,2023(2).
- [11]陈立鹏,薛璐璐,范航.和而不同:民族交融态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J].民族学刊,2023(4).
- [12]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5).
- [13]方盛举,杨睿哲.和合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理论与改革,2023(4).
-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40.
- [1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16]商志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6).
- [1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4.
- [1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72.
- [19]许忠明,刘双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动性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4).
- [2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21]纳日碧力戈.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
-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3.
- [23]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 [24]何星亮.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9).
- [25]包俊洪.巩固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8-31(1).
- [26][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M].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21.
- [2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9-09-28(1).
- [28]曹一飞.从新文化到新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建设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
- [29]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序V.

责任编辑:许立坤

# 壮族“唐皇调”：缘起、流变及其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启示

滕志朋, 黄 瑛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3)

**摘要:**壮族“唐皇调”发源于宋元时期的《唱唐皇》,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以《唱唐皇》为蓝本,壮族人民在历史上还创编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唱文隆》等一系列“唐皇调”歌谣。明清时期的《唱瓦氏夫人》,表明“唐皇调”从先前的“汉事壮音”发展演变为“中华情/唐皇调”,是壮、汉等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唐皇调”的历史启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扩大和加深民族文化艺术的交往交流交融,高度重视内容上的故事性、形式上的娱乐性和风格上的俚俗性。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壮族“唐皇调”;《唱唐皇》;宣传教育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12

[中图分类号]I207.2;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095-06

在广西田阳、田东、田林、平果、德保、凌云、东兰、巴马等地,传承着一种由当地群众独创的名为“唐皇调”的说唱曲艺<sup>[1]</sup>。考察“唐皇调”产生及相关唱本的衍生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 一、壮族“唐皇调”发源于《唱唐皇》

广西壮学学会副秘书长、田阳县布洛陀文化研究会会长黄明标研究员认为,“唐皇调”大约始于宋元时期,盛行于清至民国,其首创作品是叙事长歌

《唱唐皇》<sup>[2]</sup>。

目前,《唱唐皇》公开出版的唯一版本是1998年由广西田东县文化馆民间艺人李少庆提供的家族手抄歌本,由子义、马龙、苏珊、杏云等人整理、翻译,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印的《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该版本的《唱唐皇》共4704行,是一首长篇叙事歌谣。歌谣从“以前杨坚当皇帝,天下百姓很高兴”开始讲述<sup>[3]73</sup>,一直讲到“唐朝始末是这样,著书立说给后人”<sup>[3]297</sup>。所叙历史横跨隋唐两朝,涉及的皇帝有杨坚、杨广以及李渊、李世民、李治、李显、李旦等。故事

收稿日期:2024-06-28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FZS006);“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立项项目(2021QGRW048)。

作者简介:滕志朋,男,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艺术史论;黄瑛,女,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影视传播。

主角是唐睿宗李旦,以他和凤娇的爱情为枢机,详细讲述了他们历经磨难报家仇、安天下的曲折过程。歌本题名《唱唐皇》,唐皇主要指李旦。

可见,《唱唐皇》故事取材于汉族历史,但又已经“民间化”“本土化”了。按《旧唐书》所云:“中宗大和圣昭孝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讳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旧唐书·本纪第七·中宗睿宗》)”。即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都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所生。但在《唱唐皇》中,李旦的母亲变成了汉阳李开芳之女,被武则天陷害,死于狱中。这样,武则天就变成了李旦杀母仇人。因为武则天征讨汉阳,李旦做乞丐流落到壮族聚居的“东州”当佣人,长大后与胡登之女凤娇结为夫妻。之后,李旦得薛刚所助,领兵打进京城,将武则天、武三思斩首。李旦登基即位后,封凤娇为东宫。第4 647行至4 654行唱道<sup>[3294]</sup>:

李旦把仇人杀了,封凤娇为东宫娘。  
又封杜回为父亲,以前他救我一命。  
芦宗皇帝他封赏,封给薛家护中朝。  
再封王钦和曹彪,让他为将保天朝。

李旦杀了亲生母亲,封壮地女子凤娇为皇后,“封”救命恩人为父亲,这样的故事情节,显然是壮族人民加工改造的结果。其中把李旦称为“芦宗皇”,正是由于“睿宗”的壮语发音。

壮族人民传唱中原民族历史故事,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代。自秦始皇开凿灵渠、统一岭南之后,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力度进一步加强。共同的历史文化成了当地各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唱唐皇》正是中原文化融入岭南各民族生活的标志性文本。

《唱唐皇》的故事情节虽然主要是中原汉族的,但音乐形式主要是壮族的。

其一,《唱唐皇》音乐曲式结构是上下两句体,曲调为五声徵调式<sup>[4]</sup>。《唱唐皇》歌词不分段,4 704句一直排下来。但从演唱来看,《唱唐皇》属于分节歌,整首歌都是同样的上下两句体旋律反复演唱。另外,乐句终止音和半终止音都落在徵音,同时两句体乐句结尾都有一拍休止。

有专门研究壮族高腔民歌的学者指出:“壮族民歌中的高腔大多带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衬字歌头。起着稳定声音,为后面推出高腔作准备,也是为重唱起协同步调的作用。”<sup>[5]</sup>添加衬字的情况,在《唱唐皇》中更为突出。《唱唐皇》往往在每一个上下两句体的上句结尾,以及下句第一第二小节结尾处都添加一个“啊”,作为调整和起步(见图1)<sup>[4]</sup>。



图 1

图1也可以这样表示:“杨坚为王心正(啊)直(啊),做得二十(啊)四(啊)年(啊)皇。”即有五处都添加了“啊”。每个歌师都会加衬字,除了上句尾一般都加之外,其他什么地方加、加多少,则根据歌词以及演唱者的不同而不同。总之,加衬字是《唱唐皇》的一个突出特点。

其二,“依腔行调”,唱词的发音决定旋律音。壮语的发音和汉语不同,而且有六个调值。这样,壮族人民用壮语演唱《唱唐皇》,除了主音不变,每一个乐句结束都会落在徵音之外,其他小节尤其是前两节的乐音,会根据对应的壮语词的音调发生变化(见图2)<sup>[4]</sup>。



图 2

可以看到,图2中上一行“他当隋朝皇帝时,天下百姓都太平”里的“他”“当”“皇”“天下”“百姓”“太”,与下一行“杨坚为王握政权,人人高兴他做皇”中对应的“杨”“坚”“握”“人人”“高兴”“做”,乐音都不同,这就是“依腔行调”。

《唱唐皇》“依腔行调”的特点,应与壮族传统民歌是由壮族语言衍生发展出来的娱乐形式,同时歌词在壮族传统民歌中具有中心地位这些特点有很大关系。另外,壮族人民热爱唱歌,经常即兴



演唱。即使唱的都是《唱唐皇》，不同歌师的唱词也可能不同。例如，上面图一中的第一行是“他当隋朝皇帝时，天下百姓都太平”，但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印的《唱唐皇》对应地方的歌词是“以前杨坚当皇帝，天下百姓很高兴”。意思相差无几，但文字上有明显区别。这样，歌词的变化所引发的语言声调变化，会给一首歌带来音高走向的变化，甚至影响节奏的变化<sup>[6]</sup>。

同时，由于不同地区各有特点，同样的东西，相邻村屯的唱法也可能不一样；或者同样的字词，不同村屯的发言和音调也不一定相同。因此，不同的歌师唱《唱唐皇》，旋律中的某些乐音音高也可能不同。另外，《唱唐皇》在流传过程中，受传承形式是口传心授还是用歌本来教唱、歌本记音或表意用什么词，都会出现各种“异文”，“依腔行调”演唱出来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版本的《唱唐皇》都属于五声徵调壮族歌谣。

其三，清唱为主，偶用敲击竹类器物或吹奏草木叶进行伴奏。《唱唐皇》为单声部歌曲，音域不宽，主要是小字组和小字一组之间，壮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形式可以是独唱，也可以是多人合唱，站着、坐着都可以唱；不讲究时间和场合，农闲、歌圩、节庆都可以唱；可以即兴，也可以登台表演。

壮族地区大多植被茂密，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经常用竹做成各种工具或用具，比如竹篮、竹筒、竹桶等。壮族人民演唱《唱唐皇》时，有时会拿竹筒、竹桶来敲击节奏；有时会随手摘取身边草木的叶片放到嘴里吹，或是用其他器具进行简单伴奏。

综上所述，壮族《唱唐皇》是一种“汉事壮音”<sup>[4]</sup>的曲艺形式，是一个汉族历史题材与壮族表演形式交往交流交融的范本。它表明岭南各民族很早就开始了与中原民族在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正是《唱唐皇》这样的交往交流交融形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壮族文化以其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融合着汉族文化，并以新的形式形成了壮汉文化融合的新文化区”<sup>[7]</sup>。

## 二、以《唱唐皇》为蓝本衍生出的各种“唐皇调”演唱文本

《田阳县志》有言：“唐皇，说唱形式，唱词以七言

为主，押腰脚韵，用本地壮语演唱。形成于宋朝年间，其内容主要是咏唱唐朝宫廷内讧史实及唐明皇，因而得名，后发展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传统曲目有《文龙与俏尼》《梁山伯与祝英台》《武松打虎》《李旦与凤娇》。解放后创编《赞书记》《种子迷》等节目。”<sup>[8]</sup>其中，将《唱唐皇》的主角说成唐明皇，这是不准确的。但这段话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在《唱唐皇》之后，出现了许多曲目，都被称为“唐皇”<sup>[9]</sup>。

明明每个曲目都有名称，为什么都叫“唐皇”？有研究者指出，《唱唐皇》开头一句是“今日闲着没事做，唱首唐皇来解闷”，而唱《文龙与俏尼》《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就换成“今日闲着没事做，唱首文龙来解闷”“今日闲着没事做，唱首英台来解闷”。有这样标志性的开头，而且也《唱唐皇》一样是五声徵调式，因而“依腔行调”演唱也叫“唐皇调”，即“唐皇”或“壮族唐皇”<sup>[9]</sup>。

这就是说，壮族人民创作《唱唐皇》之后，继续用这个曲调演唱各种故事。这一系列的曲目，都被称为“唐皇调”或“唐皇”。从不同研究者的列举来看，曲目有同有异，这说明“唐皇调”的唱本应该有很多。至于大多数人提到的《唱文隆》《梁山伯与祝英台》，则仍然属于“从汉族引进来，用汉族的故事内容，套以壮族民歌的艺术形式，形成了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sup>[10]</sup>。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印的《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中的《唱文隆》开头几句这样唱<sup>[13]</sup>：

闲着没有故事讲，唱段文隆来解闷。

五月初五会亲友，河中龙船闹哄哄。

唐朝有一青年仔，名字叫做文隆君。

文隆父母生独子，聪明伶俐过别人。

手脚白嫩似公子，嘴红秀俊似神仙。

在家父母很中意，外出人人赞不绝。

文隆年纪十一二，父母为他讨媳妇。

讨个蓝氏为妻子，此人秀俊有礼貌。

歌词中的文隆，是唐朝的青年，可能是汉族。而他娶的蓝姓妻子，可能是广西的壮族或瑶族女子（广西蓝姓以瑶族、壮族为多）。这里有与《唱唐皇》相似之处，就是歌词都写了中原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恋爱婚姻。其不同在于，《唱唐皇》中的凤娇是虚构的，

故事也是虚构的,但唐睿宗李旦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到了《唱文隆》,文隆和蓝氏都是虚构的人物。文隆上京赶考,十五年才转回;蓝氏在家苦等,不同意公婆为她招婿,最终等回了文隆,夫妻俩坚贞不渝的爱情得以画上圆满句号。这个故事没有任何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或参照,显然是壮族人民自己的“艺术创作”。虽然是民间的产物,但这个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人物性格丰满,故事曲折生动,而且叙述流畅,不拖沓,实属难得。

歌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唐皇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原汉族的产物,既有民间版本,也有文人落墨,所以“唐皇调”《梁山伯与祝英台》或《唱英台》内容上源于汉族的文学艺术。这既区别于《唱唐皇》取材于汉族历史,又区别于《唱文隆》属于壮族群众的自我创造。当然,从中也能明显看到“本土化”的影子:梁山伯是“柳州府”人氏,祝英台是“祝州县”人氏,都成了广西人。

另外,从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印的《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唱本的故事结局来看,也带有更多的民间思想感情。文人雅士写梁山伯与祝英台,写到他们双双化蝶就结束了。以“生不同床死同穴”体现至死不渝的爱情。但是乡间田头的普通人不愿看到这种悲惨结局,他们更希望好人有好报、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唱英台》后面写梁山伯、祝英台以及马文才死后到了玉皇大帝面前,由玉皇大帝判决。梁山伯与祝英台前世有缘,于是玉皇大帝让二人都重返人间,梁山伯与祝英台终成眷属。马文才的买卖婚姻落了空,但也没了怨恨。这样的故事结局可谓皆大欢喜。民间百姓的善良淳朴,以及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在“唐皇调”《唱英台》《唱文隆》里,都得到了真实和热烈的表达。

在各种“唐皇调”唱本中,《唱瓦氏夫人》值得特别关注。因为瓦氏夫人“不仅是壮族的爱国主义女英雄,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sup>[14]</sup>。广西壮族人民更是为自己民族有这样一位巾帼英雄而无比自豪,认为瓦氏夫人不愧为壮族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第一位民族女英雄、女

将军,是壮族历史上永远的骄傲<sup>[12]</sup>。花木兰、杨门女等女性英雄形象虽然广为人知,但通常被认为是不见于真实历史的文学形象。瓦氏夫人则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人物,一个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功勋的女英雄!

瓦氏夫人的英雄事迹和杰出贡献,早在明代就被“四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写成了杂剧《雌木兰》,并成为他的代表作。《雌木兰》使古乐府《木兰辞》中的木兰有了姓,“花木兰”成了美貌与英气并存的女英雄名字,其原形正是瓦氏夫人<sup>[13]</sup>。

文人墨客以他们擅长的形式表达对瓦氏夫人的崇敬,广大群众则是热情高歌和深切怀念自己的女英雄,这就是“唐皇调”《唱瓦氏夫人》之所以产生的深厚思想底蕴和情感基石。

从“唐皇调”演变的角度看,《唱瓦氏夫人》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都非常值得重视。就艺术形式而言,黄明标认为《唱瓦氏夫人》比起其他“唐皇调”唱本有三个突破。一是突破了平铺直叙的旧模式,开场以对比的方式让人充满期待,即一开头介绍了瓦氏夫人读书、练武、绣花之后,就马上把她和花木兰、杨门女将对比,说“她们不够我们夫人”,调动了听众的兴趣。二是运用穿插倒叙的手法,使情节更加波澜起伏。三是长于心理描写,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完整<sup>[15-9]</sup>。

从思想内容说,《唱瓦氏夫人》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唐皇调”唱本通常都有壮族女性的美好形象,但大多局限于爱情生活、家庭生活层面。《唱文隆》中的蓝氏以及《唱英台》中的祝英台是壮族人民美好品质的形象化表达,也是中华民族道德伦理和精神理念的象征。《唱瓦氏夫人》中的瓦氏夫人,则不再局限于爱情、家庭这种个人化的空间,跃升到了家和国的层次,将私人情感与民族情感、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融为一体,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sup>[14]</sup>。《唱瓦氏夫人》寄寓这种伟大民族精神,表明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形成。这也是“唐皇调”一直流传至今且创编出《深山虎影》《田东芒果香天下》《福地林逢》等新“唐皇调”的逻辑前因,体现了广西

民族团结进步的深厚历史基础。

### 三、“唐皇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启示

我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艺术层面的。就文艺这个层面而言,“唐皇调”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扩大和加深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其一,内容上具有故事性。民族间容易实现的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往往是那些具有故事性的类型或文本。不管取自真实历史,还是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果有丰富的情节,就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引人入胜,代代相传。“唐皇调”《唱英台》中主角死而复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曲折而离奇故事情节容易打动受众。《唱唐皇》篇幅相当大,除李旦和凤娇的故事之外,还有杨坚、杨广、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杜回、薛仁贵、薛刚、胡发、马迪等角色,壮族群众将其串在一起,世代传唱。

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认为:“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sup>[15]24</sup> 文艺作品所讲述的,也可以看成是“别人的故事”。看别人的故事的意义,正如福斯特说:“不管哪种日常生活,其实都是由两种生活,即由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构成的……故事叙述的是时间生活,但小说呢——如果是好小说——则要同时包含价值生活。”<sup>[15]25</sup>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悲剧时也说过,悲剧的目的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即摹仿人的行动、生活、幸福,因为“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sup>[16]21</sup>。写悲剧中人物的幸福与不幸,使观众“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sup>[16]19</sup>。亚里士多德和福斯特的意思无非是说,故事不仅讲述了事件,其中还蕴含着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读者通过听取和了解别人的故事,能让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懂得怎么做才是对的、好的。故事总是蕴含道德的要素,它使人获得启发、受到教育,这就是人们喜欢听故事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间能够实现交

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

其二,形式上具有娱乐性。“唐皇调”其实很短很“简单”,就上下两个乐句,音域不宽,男女老少都能唱。2012年,一则报道田东县“唐皇”文化节的新闻写到:“当日,在林逢镇文化广场上,人们在一起唱唐皇,你方唱罢我登场,诙谐滑稽的口吻,唱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身边事,逗得周围的观众笑声不断。”<sup>[17]</sup>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严肃性,但可以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工作。事实证明,黄钟大吕固然不可替代、不可或缺,但通过讲故事、唱歌等和风细雨、轻松愉快的方式,同样能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从《唱唐皇》到《唱瓦氏夫人》,就是从“汉事壮音”演变成为“中华情/唐皇调”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在壮族人民心里扎根。

其三,风格上具有俚俗性。从《唱唐皇》到《唱瓦氏夫人》乃至《田东芒果香天下》,历史上所有“唐皇调”歌谣都是由壮族人民创造的,也为他们所喜欢,因而得以传承。

壮族人民平日里编歌唱歌是随时随地即兴而为。正如上文所提到,“唐皇调”是单声部,曲调短小、音域不宽,清唱为主,采取什么伴奏也很随意;唱的时候可以随壮语发音而调整音高,还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加衬词。这种方式与职业音乐人作曲时的严谨和规范是大相径庭的,自由度很高,这就是俚俗性。音乐上如此,文字语言上也充满乡风土味,如图3所示<sup>[3]2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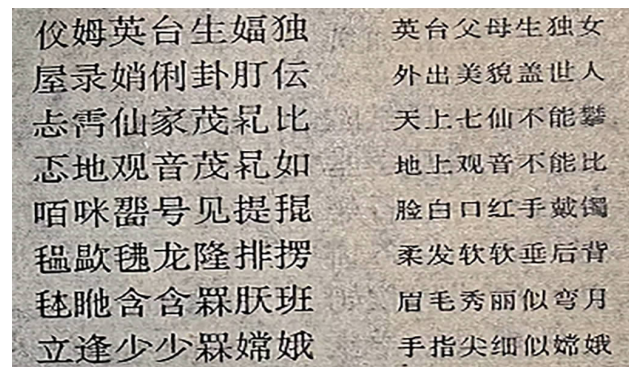


图3

左边是《唱英台》中描述祝英台美貌的“壮语文字”。其中有汉字,也有壮族人民借用汉字及汉字偏

旁“生造”的土俗字。这些土俗字有时表音,有时表意。正是由于来自民间,盛行于民间,决定了“唐皇调”的俚俗风格特征。换一种角度看,这种俚俗性,其实就是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或者说“人民性”的表征。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sup>[18][20]</sup>恩格斯也曾指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sup>[18][30]</sup>在中国,耕田种地的农民、放羊放马的牧人、撒网捕鱼的渔夫就是各民族中的绝大多数,就是中国人民的基本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sup>[19]</sup>。扩大和加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要让交往交流交融覆盖最大数目的人民群众。层面最广的人民群众认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有了最深厚的基础和保证。

总而言之,深入探究壮族“唐皇调”传承机制并把握其内在机理,正确看待其俚俗性、高度重视其人民性,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参考文献]

- [1]《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76.
- [2]黄明标.瓦氏夫人抗倭故事歌影印译注[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22:前言.
- [3]广西民族古籍办公室.唱文隆·唱英台·唱唐皇[M].南宁:广西新闻出版局,1998.
- [4]农伟培.壮族曲艺“唐皇”及其教育传承研究——以广西田东地区为例[D].广西师范大学,2018.
- [5]万丁一.壮族高腔民歌的演唱特色[J].中国音乐,1990(2).
- [6]曹昆,黄晓娴.论壮语声调对壮族民歌旋律的影响[J].歌海,2017(1).
- [7]颜频.浅论广西壮族民歌主导音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89(4).
- [8]田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田阳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693.
- [9]农伟培.论壮族曲艺“唐皇”的音乐文化变迁[J].民

族音乐,2017(4).

- [10]黄革.广西壮族民歌概略[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1).
- [11]李干芬.明代壮族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学术讨论会在广西田阳召开[J].民族研究,1985(4).
- [12]黄明标.瓦氏夫人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8:209.
- [13]徐志华.瓦氏夫人与花木兰[J].广西民族研究,1995(3).
- [14]韦梦琦.从壮族女性英雄看壮民族的家国情怀[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4).
- [15][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 [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7]田东县举行“唐皇”文化节[EB/OL].(2012-12-03)[2024-05-07].<http://gx.travel.cntv.cn/20121203/105800.shtml>.
-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20.
- [19]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党建,2021(4).

责任编辑:潘宏纹

# 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意义、优势与路径

潘宏纹,刘秋妍,韦梦琦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有助于推动广西宗教界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增进宗教界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发挥宗教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具有丰富的义理资源、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一定数量的宣教人才以及积极的参与意愿等优势。应进一步推动广西宗教界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重要意义,构建现代教义教规体系,有效落实各项任务,搭建各种平台载体,更好地发挥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宗教界;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广西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13

[中图分类号]D633;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101-06

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三个共同愿景”之一,并纳入建设壮美广西“1+1+4+3+N”目标任务体系。近年来,广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发挥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作用,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应充分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不断深化宗教界人士、信教群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积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我国宗教中国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相促进。

## 一、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sup>[1]</sup>。2023年12月,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sup>[2]</sup>广西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推动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既是新时代广西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广西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2024-04-08

基金项目:2023年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一部一题”研究计划(GXSYYBYT202308)。

作者简介:潘宏纹,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宗教理论与政策、基层宗教治理;刘秋妍,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历史;韦梦琦,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

(一)理论意义:有助于推动广西宗教界加强思想文化建设

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是推动广西宗教界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构建现代教义体系的重要契机,是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宗教中国化不是遏制宗教也不是改造宗教,而是镜鉴古今中外宗教变迁的规律,引导宗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中国化的关键是宗教理论的中国化,即在核心教义框架下,及时吸收当代中国发展的一切有益成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思想理论。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需要讲清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涵、理论逻辑与宗教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内在的联系,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这将加快宗教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为宗教中国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实践场景,有助于完善宗教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推动“宗教在中国”向“中国宗教”的转化。

(二)文化意义:有助于增进宗教界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强调,文化的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sup>[4]</sup>。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各宗教的传承发展都不同程度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同时,宗教也对一些民族的社会生活等具有重要影响。推动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有助于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夯实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思想根基。同时,宗教界自觉发挥宗教的文化功能,加深不同民族的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广泛交往,促进各民族在文化上、精神上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三)时代意义:有助于宗教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以来,宗教界根

植于当下社会,进行自我调适,在思想和行动上积极融入当代中国社会,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引导信教群众接受、适应现代化生活,共同走向现代化。当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虽然不断加深,但是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因素依然存在。广西宗教界投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引导信教群众抵制破坏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的不当言行,自觉守边护边、固边兴边,不仅是宗教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体现,也是宗教界家国情、民族情的体现。

## 二、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独特优势

宗教问题具有群众性、民族性等特征,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情感的工作”<sup>[4]</sup>。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群众的重大任务,离不开广大信教群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广西宗教历史底蕴深厚,分布地域较广。妥善处理宗教关系,充分调动宗教界的积极作用,是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客观要求。宗教界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具有资源丰富的文化优势、较为完整的组织优势、一定数量的人才优势和参与意愿积极的实践优势。

(一)文化优势:有丰富的义理资源

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宗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特别是宗教教理教义,蕴含并产生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各大宗教文化中有着深刻的“共同体”理念,注重内部的团结和谐。例如,佛教倡导的“自他相依,缘起共生”<sup>[5]</sup>,道教主张的“并力同心,共成一家”<sup>[6]</sup>,伊斯兰教奉行的“接续骨肉近亲,善待亲缘”“慈骨肉之善,慈同教之善,慈外教之善”<sup>[7]</sup>,天主教和基督教强调的“同心合意,相爱如弟兄”(圣经·彼得前书)“彼此接纳,彼此和睦”(圣经·罗马书)等价值追求,强调了个体与他人、教内与教外手足相亲、心灵相依的亲密关系。广西宗教界在这些

基本教理教义的基础上,从区情民情需要出发,在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广西实践中把“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深化。例如,利用广西历史人文典故讲爱国,利用广西地方风俗和节日促团结、利用民族艺术增进认同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丰富的教理教义可以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益资源。可以组织广西宗教界赋予这些文化资源以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讲经讲道、宣传学习,鼓励广西宗教教职人员做好“共同体”的教理研究,不断挖掘各自教理教义中的“共同体”思想,尤其是注意对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的贯通阐释,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理研究,把共同体理念融入宗教活动场所的日常宣教,进一步发挥教理教义在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中的积极作用。

#### (二)组织优势:有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

宗教界的突出群体属性是组织性强、忠诚度高。在宗教内部,基于共同的信仰,信教群众间对彼此有着较高的身份认同,对宗教组织持有较强的归属感,形成了以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民主管理组织和义工骨干队伍为主体的组织单元。这些组织单元内部结构要素相对完备,规章制度较为健全,功能作用发挥有效,是一个具有较强团队协作力的社会实体,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的载体。党的宗教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纽带,具有“向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政治职能<sup>⑧</sup>。寺观教堂“应当在宗教活动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引导信教公民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sup>⑨</sup>。《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宗教界在新时代肩负的新任务、新使命。在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广西宗教组织单元

的聚合作用,将其打造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阵,形成群体效应。此外,宗教有较为完善的律法体系,素有“以律为师、以诚为法”的传统,对宗教内部成员有着良好的规范引导作用。可以把宗教的律法戒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担当相结合,提升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示范区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 (三)人才优势:有一定数量的宣教人才

在我国,宗教界代表人士既是从事宗教教务活动、服务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精神导师,也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做好信教群众沟通协调的得力帮手。宗教界代表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一支力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抓住宗教界代表人士这个“关键少数”,发挥他们在信教群众中的“头雁效应”,在广西宗教界中形成强大合力。近年来,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广西宗教界代表人士都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重大事件处理上当表率、作示范,表现出了“政治上靠得住,关键时起作用”的政治担当。因此,可在广西宗教界教职人员的考核考评制度中进一步明确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的职责任务,加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宗教界代表人士培训、选拔、考评中的权重,进一步压实宗教界代表人士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鼓励引导广西宗教界代表人士结合各自宗教的禀赋特点,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范本,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的质量和水平,帮助信教群众正信正行,完整准确全面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真正做到宣讲过程与宣教效果的统一,提升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成效。

#### (四)实践优势:有积极的参与意愿

宗教不仅具有向内而求的自我完善追求,也有向外表达,投身社会实践,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社会认可的价值需求,强调修与行、虚与实、悟与证的统

一。这种向外的社会表达体现为乐善好施、益世利人、护国辅政等具体社会实践。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宗教界形成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广西宗教界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参与,在服务大局上主动融入,积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寻找各自的结合点。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广西宗教界以“五个认同”为核心,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宗教活动场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经讲道、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交流、争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模范等系列活动。通过创新活动载体和形式,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在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中,应调动广西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参与热情,激发宗教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让宗教界在建设中感受主人翁的参与感,享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来的荣誉感,赋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广西实践新内涵。

### 三、推动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推动广西宗教界聚焦党委中心工作,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在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中找准着力点,贡献出彩点,成为闪光点,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宗教界的力量与智慧。

(一)加强学习,深刻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要推动广西宗教界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从世情、国情、区情、教情四个角度深刻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现实意义。从世界形势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是筑起祖国南疆安全屏障的需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角逐进入了胶着期,美西方利用“民族觉醒、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等分裂流毒挑起争端、

瓦解竞争对手的图谋在西亚、中亚、北非等地区屡试不爽,给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带来了挑战。广西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是抵御和防范境外宗教渗透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广西各族人民必须心连心、手拉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维护祖国南疆安全稳定,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中稳步向前。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地域广、人口多,民族构成复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事关全局。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sup>[10]</sup>。全国各族人民更需要加强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贡献力量。广西宗教界要深刻认识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上不掉队,与全区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当好示范、走在前列。从区情看,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通衢东南亚,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民族、宗教工作任务重,承担着守边固疆的重要职责。宗教界与其他社会各领域一样,有固边戍边、建设安宁南疆的责任义务。从宗教自身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广西宗教界内部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有些突出问题影响了宗教的社会公共形象,制约了宗教的健康传承发展。对此,宗教界应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防范化解各种宗教风险隐患,维护宗教界和谐稳定。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深化研究,构建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现代教义教规体系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在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要求,对教理教义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阐释,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义教规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提出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之问等重要命题。对于广西宗教界来说,也要从社会历史的纵深视野思考自身的方位与使命问题。当前,加快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广西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也是深



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的重要内容。宗教界要立足当前和长远,继续注重现代化的教理教义体系建设,在现有的爱国爱教、崇法重规等经学体系基础上,及时以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作为新的解经注经导向,深入挖掘各宗教中的“共同体”“共有精神家园”等方面的义理,把“五个家园”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入教义教规的研究阐释,解决广大信教群众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的“信仰之惑”,从思想认识上帮助信教群众建立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仰根基,增强信教群众致力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信心,使之沿着中国化方向,在正确宗教观的引导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作贡献。

(三)积极行动,有效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各项任务

对标对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决策部署,广西宗教界应该善为、有为,成为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有生力量。一是坚决拥护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引导各族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持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正确理解和把握民族团结是福、民族分裂是祸的道理。二是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如疏解心理压力、提升道德素养、促进民族团结、增进社会和谐、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加经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祖国统一、开展民间外交等,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其中,促进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宗教和顺。三是做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宣传,学习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让广大信教群众多层面了解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精神,让全区信教群众把宗教情感升华到民族情感,与不信教群众建立“肢体”“手足”“亲缘”等情感认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植信教群众内心,在宗教界营造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良好社会

氛围。四是引导广西宗教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原则,自觉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守护祖国南疆安全。五是克服等靠要思想,发展自养事业,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造福各族群众。六是积极发挥社会整合、道德教化、人文关怀、社会服务等作用,从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意义,有效落实各项任务。

(四)勇于创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创建各种载体平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做到有形有感有效。广西宗教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要求,发挥宗教界优势作用,积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搭建各种平台载体。一是搭建宣讲平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设专题宣传专栏,举办讲经交流活动,召开座谈会、学术研讨会,举办专题研修班。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为重点,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选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员。二是创建实践平台,充分利用民族团结进步进寺观教堂活动,在宗教活动场所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基地,发挥广西宗教界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三是搭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荣誉平台,选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典型事例、代表人物,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业绩突出、成效显著、社会效益反映良好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充分调动他们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积极性。四是搭建社会整合平台,利用公益慈善项目或活动,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五是创建特色平台,从各宗教自身实际出发,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色平台。如佛教可以着重在与东南亚佛教人文交往中做好广西民族团结事业外宣工作,伊斯兰教可以在服务联系西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方面扩大影响,道教可以在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方面打造精品,天主教和基督教可以在本土化等方面深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23(7).
- [2]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J].当代广西,2023(24).
- [3]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国宗教,2021(3).
- [4]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 [5]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宣言[J].法音,2015(11).
- [6]俞理明.太平经正读[M].成都:巴蜀书社,2001:129.

(上接第49页)组织优势,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底气,坚定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跟中国共产党一起团结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65.
- [3]戴圣.礼记[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142.
- [4]孟轲.孟子:附孟子圣迹图[M].扬州:广陵出版社,2018:86.
- [5]徐锋,高国升.正谊明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为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24.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 [7][清]马注.清真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211.
- [8]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团体管理办法[J].中国穆斯林,2021(5).
- [9]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24).
- [10]王俊生,秦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J].红旗文稿,2019(7).

责任编辑:许立坤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8.
- [8]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0.
- [9]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3.
-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3.
- [1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蔡奇主持[J].旗帜,2023(6).
- [13]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2).
- [14]祝奉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1).

责任编辑:刘菊香

# 越南汉文小说对民心相通建设的作用及启示

##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视域

范忆澜

(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摘要:**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越南汉文小说是中越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越南汉文小说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体现了思想文化传播力、艺术文化感染力、中华文明吸引力。新时代民心相通建设应当选择群众接受度较高的文化交流载体,尊重所在国特色并与其文化共鸣,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心灵契合。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民心相通;中华文化;越南汉文小说;中越命运共同体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4.014

[中图分类号]I333.07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4-0107-06

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sup>[1]</sup>。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继续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在此过程中,推动民心相通建设见行见效,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必由之路。

### 一、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民心相通建设的内涵及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重视各国的文化交流,倡导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借鉴。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

发,民心相通建设内涵丰富、与时俱进,因此,选择合适的文化交流载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特点和优势,对助力民心相通建设,推进互联互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一)文明交流互鉴的特征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sup>[2]</sup>。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并予以施行。其中“文明”泛指一切文明成果,“交流互鉴”意为不同文明应当彼此沟通、相互借鉴。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综合、宏大、深远,既道明了文明多元、平等、包容的本质,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积极作用<sup>[3]</sup>。

收稿日期:2024-06-20

作者简介:范忆澜,女,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教师,浙江省统一战线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交流与传播、域外汉文学。

人类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sup>[4]</sup>。文明交流互鉴不仅可以使文明永葆青春,还能让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百花齐放。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互动融合,完成了中国化历程。同时,佛教又从中土传至汉文化圈并进行衍变。又如,茶起源于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朝鲜、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区后,逐渐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再如,瓷器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欧洲后受到欢迎,带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中国风的审美特征对洛可可艺术的诞生产生了历史影响。可以说,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史。当下,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坚持平等互尊,秉持开放包容,践行互学互鉴,追求合作共赢,让不同文化的交流成为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的一剂良药,是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sup>[5]</sup>。

### (二)民心相通建设的构成

文明交流互鉴的实现需要载体。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曾是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的纽带。今天的“一带一路”贯通古今,成为各国互联互通的“快车道”。可以说,“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sup>[6][7]</sup>。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指数”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sup>[7]</sup>,是实现其他流通的“润滑剂”。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主要涵盖文化、学术、人才、媒体、民间交往、服务等领域<sup>[8]</sup>,明确了民心相通建设的地位和范畴。概括来说,民心相通具有“国相交,民相亲,心相通”三个层次,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交往发展模式、世界人民交往的社会网络、各国文化价值观与国民心灵情感的沟通<sup>[9]</sup>。

从现实意义看,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指导。民心相通建设有助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民造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实践。二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后者是

前者的出发点,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各国民心相通的必要条件,对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意义深远。因此,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分析以往的人文交流案例,对更好推进新时代中华文化交流,完善民心相通建设,绘制“一带一路”的“工笔画”大有裨益。

### (三)越南汉文小说对当代民心相通建设的意义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中华文化以文艺作品为载体,通过时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的友好交流,越南汉文小说即个中翘楚。在今天,将越南汉文小说作为文化交流媒介进行分析探讨,仍具有一定价值。

宏观上看,首先,中国和越南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双方既为邻国,又有相近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两国均有耦合之处。“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正是中越人民友谊的体现。其次,中越双方存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越南为东盟成员国,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越南所属的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中越加强合作对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重大<sup>[10]</sup>。再次,中越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回顾历史,双方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情厚谊。展望未来,中越合作必将更为密切,双方亦将并肩前行,共创繁荣。

微观方面,越南汉文小说种类丰富,不乏名篇佳作,其中一些作品更是影响深远,迄今仍有余响。例如,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传至越南后,被越南作家阮攸改编,成为越南本土文学经典并广泛传播。据统计,《金云翘传》先后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并进入影视、音乐等领域,成为越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sup>[11]</sup>。此外,越南汉文小说文化意蕴丰富,作品中包含的思想文化几经流衍,至今仍在越南思想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高台教作为越南的新兴宗教,教义中反映着儒释道三教在越南融合的历史<sup>[12]</sup>。越南汉文小说作者笔下的各类神灵,今天依然被供奉在越南各大地市的神祠庙堂之中,为众多香客游人所瞻仰。

可以看出,越南汉文小说历久弥新,是中越文化沟通的一座桥梁。分析其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表现形式,有益于夯实中越友好交往的文化基座,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的有效思路。

## 二、越南汉文小说作为民心相通载体的优势

越南汉文小说,是指由长期深受中国文化濡染的越南人民用汉字创作的,主要反映越南民族精神和风土人情的小说作品<sup>[13]</sup>。跨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交流,是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动力<sup>[14]</sup>。在众多域外文学作品中,越南汉文小说以多样的题材、完善的结构、绮丽的言辞,造就了作为民心相通载体的优势,构成了跨文化交流的链条。

### (一)促进两国人民思想文化传播

越南汉文小说不仅有较完备的种类,还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蕴含的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在增进小说可读性与人文价值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体现着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程度。

一是促进中国儒家文化在越南的流传。儒家文化于公元前 207 年至公元 111 年传入越南并迅速传播,在当地被称为“儒教”。在传播过程中,儒家的思想、礼仪逐渐与当地社会融合<sup>[15]</sup>。越南汉文小说为士子用汉字书写,自然而然地包蕴着儒家文化,是中越文化交流的范本。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点的影响,儒家思想家存在一定的重文倾向,这在越南汉文小说作品中也有显示。《老窗粗策·圣宗淳皇帝》里记载书生陈渊喜好诗书,志向高远,立志要以生花妙笔获取功名,认为文才惊世可抵万物。此诗折射出当时越南社会“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观念。同时,越南汉文小说里常有反映科举制度的作品。阮朝作家张国用在《公暇记闻》中即提到了贡士的设置<sup>[16]</sup>,儒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演变于此可见一斑。

二是促进中国佛教文化在越南的流传。公元前,佛教从中国经海道向越南传播,1 世纪末至 2 世纪初,赢楼成为汉地三大佛教中心之一<sup>[17]</sup>。越南汉文小说作品中有直接论说佛法的部分。如《传奇漫录·陶氏业冤记》记载了乐女陶氏在佛寺讲经说偈,有少年为其书写榜文的故事<sup>[18]63</sup>。此外,文本中乐女陶氏

寄居净庵的情节,也侧面说明了当时佛教在越南民间的普及。越南汉文小说里还有僧侣参与政治生活的情节。《岭南摭怪列传·徐道行阮明空传》写高僧徐道行参加僧科入仕<sup>[19]</sup>,是当时三教并行政策的体现。

三是促进中国道教文化在越南的流传。道教于 2 世纪末至 3 世纪初传入越南<sup>[20]</sup>。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对越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越南汉文小说里时有道教人物的出现。《天南云录·何乌雷传》就是一个道教故事,“乌雷出游,逢一人,形神秀异,自称吕洞宾,谓乌雷曰:‘郎好儿,欲何求?’……乃引口唾入,使自吞之,洞宾忽而不见。自是乌雷精神觉爽,虽不识字,而辨敏过人,词章吟咏,无不精丽”<sup>[21]</sup>。吕洞宾出现在越南,用言语和法术来点化主人公,这既符合道教点化用言语启发人、使其悟道的方式,又有道法传承的意味。

### (二)促进两国人民艺术文化交流

中华传统艺术是越南汉文小说的重要表现对象。一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或抚琴弈棋,或墨笔丹青,俨然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寄寓了文人士大夫高雅脱俗、卓尔不群的心态。例如,《金云翘录》中记载士子金重赞美歌女翠翘的琴艺:“娘之琴似伯牙之琴,然有萧骚之曲,使人带得愁思。”<sup>[22]162</sup>金重用诗句说歌女的琴音似有幽怨孤清之意,并以琴声观其心绪。

又如,《传奇漫录·那山樵对录》中一首《爱棋歌》写出象棋在越南古代社会的流传状况<sup>[18]106</sup>,表明越南士子深受中华文化浸润,折射出越南文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书画方面,越南汉文小说里的人物也多有所涉猎。有隐士精通书法:“其语意类元、白嘲放,其字体仿籀、斯篆隶。”<sup>[16]112</sup>这里“籀”指大篆,“隶”为隶书。这说明不少越南文人熟知书法字体,中国书法已经进入越南文化领域,成为文人间赏文析诗的媒介。《越甸幽灵集全编·天祖地主社稷帝君》中的士子“喜诙谐,善图画”<sup>[23]</sup>;《金云翘录》里的人物擅画松木,有“毫端翠弄,笔下春生”之美<sup>[16]161</sup>。这些都说明越南的才子佳人多才多艺,侧面显示出丹青技艺在越南影响之广泛,表现了中越文化交流的高度。

### (三)表达对文明繁荣发展的向往

中华民族在朝代更替过程中形成了多个古都,这些古都大多为当时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一些更是成为当时举世闻名的大都市。作为中华文明的高峰,中国古都蜚声海外,也进入越南汉文小说之中。越南文人通过描绘中国古都的繁盛,寄托了本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是来自长安的“红娘”和“花妖”。长安作为古都,其声名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知晓。在越南汉文小说作者笔下,一些人物或来自长安,或曾游历长安。如《桃花梦记——续断肠新声·桃花梦》中的妇人即为长安人士,旅居在寺庙前开茶铺度日<sup>[16]204</sup>。这位来自中国的“红娘”口齿伶俐,乐于为男女主人公牵线搭桥,反映出中越地理的相连和文化的相通。又如《传奇漫录·西垣奇遇记》描述了士子何仁赴长安求学时遇到花妖幻化之女的故事<sup>[16]42</sup>。小说中的“曲江坊”为长安街市地名。篇中何仁因眷恋花妖而多次往返长安,可见这是一篇以越南士子为主人公,以长安城为空间叙事中心的作品。

二是杭州的“西湖美景”和“梁祝墓冢”。杭州曾为吴越与南宋的都城,其文化影响力亦传至海外,进入域外文学作品中。越南汉文小说中即有《西湖诗》一首<sup>[24]3</sup>。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所咏西湖并非杭州西湖,而是位于越南的河内西湖。其为河内最大的湖泊,占地面积500余公顷,在李朝定都河内时已负盛名,因在当时京城以西,故得名西湖<sup>[25]</sup>。诗中写河内西湖秋水共长天一色,历史与古迹交织,风光之秀美可与杭州西湖并肩,不愧为京都第一名胜。全诗以杭州西湖作比,表达了诗人对河内西湖的赞叹,显示出中越文化交流的密切。除却西湖,杭州名胜古迹不计其数。在越南汉文小说里,黎朝进士丁完出使中国,途经杭州时写下燕行诗:“手拂新苔认旧碑,吁嗟大义世间希。雪门受业坚交契,花下缔盟约唱随。任历风波心不转。若名教死但奚辞,香魂一对今何在?时见双双燕子飞。”<sup>[18]112</sup>丁完在杭州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墓冢,心有所感,遂写诗怀古。小说中杭州为使者北上的途经之地,越南使臣在古都写下的燕行诗也成为

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 三、越南汉文小说对新时代民心相通建设的启示

越南汉文小说深受中华文化陶染,其中体现的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等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越南汉文小说作为文化交流的研究案例,既符合文明交流互鉴的要义,又为推进新时代民心相通建设提供了借鉴。

#### (一)选择群众接受度较高的文化交流载体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小说以适中的篇幅、曲折的情节、丰富的内容、通俗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由于小说的可读性较高,传播速度相当可观,越南文人通过创作汉文小说来叙事写人,为越南人民所喜闻乐见。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应当选择群众接受度较高的交流载体。比如,可以通过两国人民喜爱的网络小说进行文化交流。如今,中国网络小说逐渐成为一种“特产”,在多个国家迅速传播,其中也包括越南。中国网络小说受到广大越南青年读者的欢迎<sup>[26]</sup>,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因此,在开展文化交流工作时,可以考虑支持作家创作以弘扬中越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小说作品,构思吸引青年读者的故事情节。选择一批带有民心相通特色的作品投放互联网文学市场,并加强宣传,开展互动,实现不同文化的柔性交流。

同时还可以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2023年12月11日,《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越文版)在越南电视台和各个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节目选取引用的中国古籍和经典名句,展示了习近平的文化底蕴和深厚情怀,为阐释新时代中华文化写下生动注脚。文化交流应当善乘外交友好之东风,做好文化“走出去”工作。可以选择一批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当代价值的优秀栏目,支持其进入国际市场,并在广播电视台和新媒体平台上同步推广,扩大知名度。

#### (二)尊重所在国特色并与其文化共鸣

越南汉文小说虽然用汉字书写,但并未照搬中华文化,而是用汉字来展现越南的风土人情,用汉语来讲述越南故事,这是越南汉文小说为当时主流社会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做法可以让受众更好地

接受汉文小说作品,培养越南人民的跨文化能力,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进而促进民心相通。这与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不谋而合<sup>[10][270]</sup>。

因此,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应当尊重所在国特色并与其文化共鸣。一方面,应当坚持求同存异,发掘中外文明之间的共同点。例如,中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越南数字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联通中越》栏目,用越南语介绍了中越合作信息以及中国新闻,可供借鉴。未来,可以考虑梳理中国与外国文化的契合之处,并将其制作成系列节目,使用双语播放,以培养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移情能力,厚植文化交流的土壤。另一方面,应当在尊重所在国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文学习交流活动。同时,语言文字是人类沟通的工具,要想进一步拉近两国关系,提升外国人民对中文的接受程度,就应当换位思考,讲究方式方法。例如,可以组织专业人员用中文翻译一批他国民间故事,并制作成生动有趣的动画片、短视频、漫画作品,力求用精品打动人心,通过故事增进理解,让中文适用性强、兼容并包的特征深入人心。

### (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促进心灵契合

越南很多汉文小说包含了中国的神话传说、历史演义、传奇、笔记、寓言、笑话等,可谓包罗万象。文本里的诗歌在丰富作品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积厚流光和越南文人的文化底蕴。越南汉文小说将各种文化元素相融合,并在融合中实现“融活”。该做法不仅深谙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指引。

首先,可以进一步发挥对外友好组织的作用。如越南越中友好协会以推动民间外交为己任,提出越南中人民论坛倡议,积极举办各类友好活动。未来可以加强与中外友好组织的沟通交流,共同制定友好倡议,拓宽友好活动的范围,增加民间外交的内容。其次,应当加强中外交往尤其是青年的交流合作。近年来,中越青年友好会见、中越边民大联欢等活动日益受到欢迎,应当在此基础上深化合作机制。可以依托中国文化中心等平台,与对外友好组织深度合作,发

挥文化机构的知识储备和友好组织的人力资源优势,共同举办一批高质量、大范围、广传播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中国与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在文化交流中加深感情,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再次,应当让文化交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力。例如,2023年1—10月,中国赴越游客超过130万人次<sup>[27]</sup>。相关部门应当把握机遇,深化中外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并与设计、电商等公司合作,设计研发、推广销售一批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让无言的文化资源成为闪耀的文化资本。此外,可开展以文塑旅活动,与友好协会合作,在旅游过程中加入文化讲解项目,让更多的外国游客在游览华夏胜景时体味中华文化之美。

### 结语

作为中华文化与越南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晶,越南汉文小说展示了广博精微的中华文明,表现了中华文化对古代越南社会的深远影响,对做好新时代中华文化交流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习近平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sup>[65][10]</sup>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分析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案例,化之于思,成之于悟,见之于行,进一步领会文化交流媒介中蕴含的中华文化,总结经验,与时俱进,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不断“走出去”,着力扩大“一带一路”的朋友圈,画好画大“民心相通”的“同心圆”。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3-10-19(1).
-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3:468.
- [3]王学斌.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历程论纲[J].长白学刊,2024(2).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58-259.
- [5]王茜.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入推进

-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J].社科纵横,2024(1).
-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7]通民心、达民意、惠民生[N].光明日报,2023-10-29(7).
- [8]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N].人民日报,2015-03-29(4).
- [9]国相交 民相亲 心相通[EB/OL].(2019-09-02)[2024-05-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3552890485299696&wfr=spider&for=pc>.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11]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举办“《金云翘传》在越南的传播与流行”讲座[EB/OL].(2021-12-01)[2024-05-20].<https://sfl.pku.edu.cn/kygl/kydt/133631.htm>.
- [12]谢昂.儒释道融合在越南——从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角度[J].世界宗教文化,2023(5).
- [13]任明华.越南汉文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
- [14]崔婷.全球化与当代中国跨文化交流[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1-2.
- [15]杨健.交融与内聚——越南文化流变的多维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3.
- [16]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
- [17] [越]释清决.世界佛教通史:第1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35.
- [18]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9]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6.
- [20]宇汝松.道教南传越南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7:61.
- [21]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72.
- [22]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3]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3.
- [24]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5]金良浚.越南[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50.
- [26]范明俊.中国网络言情小说在越南的传播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 [27]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12-12(1).

责任编辑:许立坤